

中国
梦

峥嵘岁月 初心不忘
永远跟党走

2025-07-01

建党节

Party's
Day



★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 ★

1921—2025



福州党校学报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FUZHOU

主管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

主办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编辑委员会

主 任：童桂荣

常务副主任：王 斌

副主任：纪浩鹏

编 委：李永杰 刘兴旺 魏少辉 丁 飞

吴碧英 张曙婷 林淑周 欧 敏

赵咏梅 钟 诚 曹敏华

主 编：王 斌

副主编：林淑周

编 辑：丁春华 兰丰丰 陈琴容 郑梅钦 魏璐珂

福州党校学报

双月刊

2025年第3期(总第214期)

· 目次 ·

主管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

主办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4-107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1204/C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业

出版日期：

2025年6月20日

国内定价：

10.00元

印刷单位：

福建东印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5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引领高质量党建

王斌

11 从中央八项规定入手抓作风建设的价值意蕴、内在要求
及经验启示

闫红果

17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践创新
及经验启示

李志亮 刘永波

新时代新思想研究

2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治理价值阐释

杨蓉

3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的
理论特征、价值意蕴与实践要求

杨雪玲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36 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牟娟

版 权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 (CNKI) 期刊数据库, 维普、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 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 请在投稿时声明, 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 45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思想及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付佳伟

治理研究

- 52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点思考

陈丽华

- 58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困境与推进路径
——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

林晶晶

- 66 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筑牢乡村振兴坚强战斗堡垒
——南平市开展农村“党建体检”的探索实践

潘 婷

- 74 深化地方立法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武超凡

文化研究

- 80 书评三则

- 87 一种反“独”促统的出版理念与实践

——以陈映真及其《人间》杂志为中心

刘 韬 阎立峰

编辑出版:

《福州党校学报》

编辑部

主 编: 王 斌

副主编: 林淑周

地 址:

福建省福州市

福马路 990 号

邮 编:

350014

电 话:

0591-88199355

电子邮箱:

fzdxxb@163.com

网 址:

<http://fzswdx.gov.cn>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FUZHOU

The Main Contents

NO.3, 2025

General NO.214

05 The spirit of the Central "Eight-point Decision" leads high-quality Party building
Wang Bin

11 The Value Implication, Internal Requirements and Enlightenment of Grasping
Style Construction Starting from the Central "Eight-point Decision"
Yan Hongguo

17 The Practical Innovations and Empirical Insigh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Central "Eight-point Decision" in the New Era
Li Zhiliang, Liu Yongbo

23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Yang Rong

31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ought on Talent Work in the New Era
Yang Xueling

36 On Marx's Theory of Metabolism Rift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Mou Juan

45 The Thought of "Realistic Individual" in The German Ideology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Developing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Fu Jiawei

52 Some Thoughts on Constructing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Chen Lihua

58 The Practical Logic, Dilemmas, and Promotion Paths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the Commun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Lin Jingjing

66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Build a Strong Battle Fortres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Pan Ting

74 Deepen Local Legislative Reform and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u Chaofan

80 Three Book Reviews

87 An Publishing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Opposing "Independence" and Promoting
Reunification
LiuTao, Yan Lifeng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引领高质量党建

王 斌^{1,2}

(1.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014; 2.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中央八项规定由上向下进行纪律垂范, 旗帜鲜明地纠治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问题, 树起新时代党建质量标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全党的严格落实, 开创性地改变政治生态和社会风貌, 党的优良作风在新时代的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升华。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镜子, 时刻观照党员干部, 防止脱离群众的“四风”反弹, 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四风”问题本质, 尤其要明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什么”, 再找准“怎么办”, 通过明确斗争对象, 采取合理斗争方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指向党建质量基础, 将通过思想引领和制度强化持续构建群众满意的政治生态。

关键词: 习近平; 高质量党建; 密切联系群众;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中图分类号: D2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3-005-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主题。人民的美好生活, 需要社会高质量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同样需要社会高质量发展。引领社会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是一个高质量的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执政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必须牢记, 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1]44-45}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水平, 是党检验自身建设质量的标准, 脱离人民群众是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风险。^{[2]66} 2012年12月4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由上向下进行纪律垂范, 旗帜鲜明地纠治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即“四风”。中央八项规定体现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 成为一个标注新时代高质量党建的词汇, 日益深入党心民心, 深刻改变着党的作风和中国社会。^[3]

一、中央八项规定树立新时代党建质量标尺

随着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建质量提升也永远在路上。党领导一切, 对人民群众全面负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 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4]82} 全面从严治党是为了充分实现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 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4]78} 党执政后党的群众路线仍受到权术观、特权观、私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研究”(18BKS08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斌, 博士,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副校长,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哲学与社会发展。

利观、享乐观等传统政治流弊的干扰。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些党员干部工作浮夸、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待民傲慢、以权谋私、拉帮结派、买官卖官、贪污受贿、生活奢靡,这些党员干部的行为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执政形象,破坏正常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背离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党建质量标尺,全党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现纪律检查常态化,持续纠治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问题。为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党的十九大之前,中共中央出台或修订了近80部党内法规,使全面从严治党有规可循、有据可依。^[5]

在召开党的十九大之前,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4万起,处理党员干部25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6万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领导干部中有20人是省部级干部。^[6]一些曾经见惯不怪的特权现象诸如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公款送礼等,被广泛破除。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化反腐,维护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执政形象。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映照廉洁自律是确保党建质量的首步,为彰显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坚决态度,2015年3月26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首次启动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至召开党的十九大前,“天网行动”累计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3339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628人,“百名红通人员”44人,追回赃款93.6亿元,^[6]海外不再是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指出,“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1]8}。

正确的问题导向是“解决难题”的前提,中央八项规定以新时代党建质量提升从哪里入手、怎么抓为问题导向,通过顶层制度设计,以上率下,层

层传导解题方法。在具体实践中,中央八项规定从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这八个方面,明确细致地指出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刚性规定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政开局破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地要按照这个规定的精神,结合实际就改进工作作风采取有力举措,全党上下共同努力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7]中央政治局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7],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全党实现高质量贯彻落实,开创性地改变政治生态和社会风貌。

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升华党的优良传统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共产党建设规律的历史回响,这一规律呈现于党百年的优良传统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依据党史提炼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优良作风有机统一,在新时代的八项规定精神中得到集中体现。中央八项规定从合理制定到严格执行,体现知行合一,合理性源于密切联系群众,执行力则体现为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回顾中国王朝更迭史,没有一个王朝超过300年,旧王朝在极端不公的社会中覆灭,新王朝在推行相对公平的社会秩序中建立,周而复始,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率。1945年7月黄炎培来到延安,请教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何跳出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本质上是党以人民民主的方式实现密切联系群众。人民民主的直观形式是人

民群众的意见表达,这也是集体智慧形成的重要方式,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民主,“谁说了都算”也意味着“谁说了都不算”。民主的目标是找到最大公约数,而不是陷入无序的民粹主义。党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集思广益基础上的责任担当,社会主义民主体系中的最大公约数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据此进行决策的同时承担执政责任。新时代党的决策权与执政责任统一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美好生活要求更高的发展质量,党的领导质量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质量,党长期执政,必须根据时代发展要求不断自我完善和革新,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针对历史周期率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4]324}

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2]25},基于党自身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同构相联关系,“社会革命”本身是顺应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发展变化,无论主观上是否促进“社会革命”,这种发展变化终将出现。党的自我革命与这种客观发展趋势保持一致,证明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先进力量,否则,执政党可能会“被革命”。党的百年历程是党领导中华民族历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进程,与这三次飞跃相对应,党的指导思想先实现飞跃,思想飞跃引领社会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指引中华民族强起来。由富渐强,富起来时经济高速发展的副产品,诸如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道德失范和价值观混乱现象,以及与之相关党内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影响党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凝聚力。党中央以八项规定为自我革命的突破口,引领民风社风转变,增强了新时代党的社会凝聚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

题,勇于自我革命。”^{[2]325}自我革命不是彻底的自我否定,而是扬优去弊,呈现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在自我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党的领导地位不会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会变,以人民为中心不会变。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自我革命,恰是为革除脱离群众的作风,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充分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形成民族复兴的社会合力。党自身的团结是党产生强大社会凝聚力的前提,党只有先实现自身的团结,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现在拥有9900多万名党员,如果不团结,9900多万只是数字,并不代表政治实力,反而浪费组织成本。代表全党共同利益的党纪是全党团结一致的重要制度基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僭越共同利益的特权被消除,有效增强了全党的纪律认同。

纪律认同越强,党的组织体系就越稳定。党自上而下稳定的组织构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历经变革而保持有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密的党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8]560}党组织的稳定在于团结。回顾党的建设史,无数事实一再证明,党的团结奋斗是实现攻坚克难的关键,而严格的纪律约束是团结的制度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9]在为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解决了阻碍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一个首要难题:使一个分裂的国家完成主体上的统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军阀混战时期,1928年以“东北易帜”为标志,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中国,但各路军阀只是名义上服从国民党执掌的中央政府,实质上仍在地方把控军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个人声望最高时,国民党内部依然是山头林立,如此不团结的一个所谓执政党不可能领导国家

走向统一。与此迥然不同，中国共产党通过严格的纪律约束，将自身建设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以严明的纪律执行赢得群众的广泛信任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党能够在敌后广泛开辟农村根据地，在农村最基层建立党支部，充分组织和动员人数众多的贫苦老百姓，离不开自律赢得的民心。严明的纪律执行是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鲜明体现，不断提升风纪使党组织能够整合广大乡村，至解放战争时期，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赢得政权，统一祖国大陆。所以，没有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革命，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自身的纪律建设质量关系团结群众的规模，实现党的纪律建设质量与领导规模相统一，是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政治保证。如今，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树立共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平等参与机制，党首先应以自身更高质量的纪律建设做示范。党纪质量关乎细节，革命时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中央八项规定则具体约束到“管住一顿饭”“规范一次出行”。现代智能网络技术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上而下的传导落实，提供了更为精准的手段，诸如公车的实时定位以及行程的大数据统计，公务招待、差旅费的全流程电子监控。这些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具体举措，规范了各级党员干部的职务消费行为，彻底扭转管党治党宽松软现象。

三、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指向党建质量基础

全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展现出强大的制度效能，但全面从严治党没有休止符，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十年不够就二十年，二十年不够就三十年，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7]制度效能的最大化需要广

大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上的主动自觉。党中央决定，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这次学习教育不仅继续强化制度效能，更是对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端正态度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雨依然生机盎然，始终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产业工人应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但按照革命时期中国作为农业国的国情，工人阶级并不占人口多数，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党一方面需要吸纳农民入党以扩大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又面临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性的党建质量问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用无产阶级意识改造非无产阶级党员思想的党建原则，既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思想统一，同时使党组织不断壮大，实现党的建设质量和组织规模同步增长。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党与时俱进地坚持用无产阶级意识改造非无产阶级党员思想的党建原则。党的十六大对党章第一章第一条中关于入党对象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将“其他革命分子”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这表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进程中，不再以革命不革命来划分社会群体，而以社会成员的政治先进性为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生的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家、民营科技企业创业者等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新生阶层，自愿接受党的先进思想，都可按照党的要求，申请入党，党组织的社会辐射面随之扩大。党建创新既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思想统一，党在中华民族富起来时实现自身建设质量与团结群众的统一。各行各业的党员要贯彻密切联系群众的理想信念，必须有统一的制度规范，纪律约束是思想建设质量的基本制度保证。通过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一方面从思想上解决密切联系群众的“不想腐”问题，另一方面强化“不能腐”的纪律约束。

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镜子，时刻观照党员干部，防止脱离群众的“四风”反弹，是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自我革命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现在看，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不时抬头，顶风违纪现象仍有发生，隐形变异行为潜滋暗长。”^[10]之所以存在此类现象，还是因为有些党员干部没有从思想深处解决“不想腐”的问题。相对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更难根除。作为斗争对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首先面临如何界定的问题，诸如形式主义如何与必要仪式相区分的问题，都需要从本质上去分析判断。

只有从本质上明确“是什么”，才能真正搞清楚“怎么办”，没有明确的斗争对象就不可能有合理的斗争方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广大党员干部应首先深入问题本质，认清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什么”，从而找准思想深处的自我革命对象。官僚主义不等于领导强调自己的主张，任何单位有序运行都需要领导担当负责任的有效决策，反对官僚主义绝不是简单对抗领导权。领导是“关键少数”，领导层级越高，其下属层级和人数就越多，领导对下属具有指挥权的同时，也与下属存在合作关系。合作是相互负责，指挥是合作基础上领导向下属负责，不合作的单向指挥，表现出不汲群策的权力自负、权力任性，权力与责任失配，会出现权力本身注解权力合法的悖论。权力大于责任是官僚主义的基本表象，权力与责任的反比越大，官僚主义就越严重，超出责任的权力是特权，官僚主义越严重，特权就越多。因此，反对官僚主义必然反对特权现象，两者一体两面。针对中央八项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督查党员、干部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7]

特权是不负责任的权力，追求特权，领导就变成了官僚。领导对下属的态度是领导对人民的态度缩影，不向下属负责的领导，更不可能真正遵从群

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要求下属不是对下属颐指气使的任性指挥，而是督导其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规律充分实现工作效能。以人民为中心是领导具有制度权威和人格权威的公信力基础，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向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交上人民满意的工作答卷，也就是说，对人民负责任是工作内容。官僚主义恰是以私人权欲为中心的行为动机和方式，责任缺失意味着工作没有真正内容，为了掩饰权力不合法，官僚主义者必然会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因此，官僚主义必然带来形式主义。

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形式主义作风，使客观必要的程序和仪式演变为官僚主观夸大设计的“障眼法”，官僚主义思维逻辑是形式主义出现的主观根源。官僚主义的思维逻辑原点是官本位的人生价值取向。官本位思想是将权力作为人生终极价值归宿的观念，但权力不具有永恒性，其无法化解人向死而生所带来的虚无感。官僚主义者内在的虚无感会投射于行动，为填补精神空虚，他们用特权享受满足具身欲望、用培植亲信或变相权力世袭预防己权旁落、用增加工作花样制造无效的工作繁忙，等等。可见，官僚主义滋生享乐主义、团团伙伙、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症结归根结底还是精神上“缺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8]547}理想信念是超越个体具身局限性的人生价值归宿。

具身欲望所得终究会随身而去，追求人类文明传承的共同理想才具有永恒性。人天生不完美，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完美的事物，但完美却可以出现于每个人的思想理念，就如几何学中描述的绝对直线、绝对圆形、绝对平面等，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天然存在，再先进的工程技术也制作不出来，但我们每个人脑海里却都能想象出这种绝对的图形。我们还会根据这种绝对图形及其之间的关系逻辑去改造现实世界，为追求美好未来创造现实基础。可见，

人类追求完美具有共识,并能由此形成共通的理想逻辑,去改变现实的不完美。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8]549}所以,在全球党员数量最多之上保持团结统一的质量优势,“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8]548}。

思想的凝聚力源自共同理想带来共同利益。理想永远高于现实,这是人类赓续奋斗的动力,赋予有限个体之于群体的永恒使命意义,使追求共同理想成为我们超越个体局限性的价值归宿。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舍弃个人利益,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事业,马克思凭借个人才华,完全可以安逸生活,但他却选择伟大理想事业而得罪资本主义势力,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11]。马克思的理想信念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由此引发的斗争是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斗争,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也是反对特权的斗争。特权阻碍共同利益的实现,官僚主义背离共同理想,官僚主义在思想根源上就有悖于党的团结。

保持团结奋斗的质量优势,要求广大党员筑牢理想信念,但理想信念教育的成果不能仅根据学习笔记和思想表达来评定,“沉默”的官僚主义思想也只能通过行为危害被发现。面对言行不一、知行不一的“两面人”,思想建设必须结合制度建设,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官僚主义思想才能失去行为机会。通过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充分激发广大党员应有的平等政治权利意识,形成监督和制约职权越界的广泛合力,广大党员与自身权利对应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才会随之被充分激发,自觉与破坏党的形象、党的威望、党的团结、党的声誉的“四风”行为做斗争,也自然成为一个个更加密切联系群众的先锋分子,从而以共建高质

量党内政治文化带动社会政治生态进步。针对此次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看一个地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水平高不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政治生态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作风正派、公道处事,以自身模范行动推动政治生态持续净化。”^[7]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将通过思想引领和制度强化持续构建群众满意的政治生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3] 中央八项规定:从徙木立信到化风为俗[J].求是,2025(10):17-22.
- [4]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
- [5] 廖政军,等.使命在肩,保持战略定力——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共党的建设新要求(下)[N].人民日报,2017-11-16(21).
-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的十八大以来大事记[N].人民日报,2017-10-16(01).
- [7] 习近平.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J].求是,2025(10):4-16.
-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9]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4.
- [10]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72.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

责任编辑:丁春华

从中央八项规定入手抓作风建设的 价值意蕴、内在要求及经验启示

闫红果

(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4)

摘要: 中央八项规定作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突破口,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八项规定强调坚持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实行风腐同查同治,统筹推进党性党风党纪建设,聚焦抓好重点群体的作风建设,注重纠“四风”与树新风并举,彰显了系统的、科学的管党治党观。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党员干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从党规党纪关、理想信念关、廉洁自律关、艰苦奋斗关、家风家教关五个方面自觉加强作风建设。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中央八项规定; 党规党纪; 作风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3-011-06

准确把握党的作风建设需要“正本清源”,需要原原本本地学习、领悟习近平同志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大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关于作风建设的报告、讲话、指示精神为依据,探讨新时代狠抓作风建设的价值意蕴和内在要求,分析党员干部自觉加强作风建设的经验启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中央八项规定入手抓作风建设的价值意蕴

中央八项规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管党治党的“破题”之举。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铁规矩和硬杠杠,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着力点,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中巩固了执政基础,为中

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 中央八项规定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着力点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战略部署;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在政治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力。作风问题作为外在的表现,直接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持续纯洁党风政风始终是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推动了党员干部的作风向上向好。整体而言,实干、担当、清廉等风气在全党扩散开来。但是,“四风”问题仍然长期存在、具有反复性,

基金项目: 2025年湖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从中央八项规定入手抓作风建设的价值意蕴、内在要求及启示”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闫红果,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党建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特别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两大“顽疾”在基层屡禁不止，且衍生出一些“变种”。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本着地方利益至上、部门利益至上的原则，“替换性”“选择性”“附加性”地执行和落实中央出台的制度政策。再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往往通过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政策落实政策的方式执行和落实中央出台的制度政策，耗费了时间、浪费了资源、加重了基层负担。中央八项规定从调查研究、会议会风、文件文风、出访活动、警卫工作、新闻报道、文稿发表、勤俭节约等具体工作入手，从根本上灭绝了歪风邪气，为地方和部门执行和落实中央出台的制度政策提供了抓手，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

（二）中央八项规定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中巩固了执政基础

作风建设与党群干群关系紧密相关，关乎党的执政基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1]从党的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那一刻开始，就十分注重无产阶级立场，致力于获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确了人民军队的立场，从思想上解决了“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的问题。延安整风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对主观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的党风、八股式的文风进行了猛烈批判，塑造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思想，向党员干部发出了切勿沾染官僚主义的警醒。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出台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

风建设的决定》等文件，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提出了带头严格作风建设的具体要求。正是由于持续加强作风建设，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执政基础持续得到巩固。中央八项规定作为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对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巩固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央八项规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该论断强调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性。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党的二十大所规定的全党的中心任务。完成这项任务，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因此，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精神状态、认知倾向、担当精神、作风状况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进程。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动员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时所言：“各级党组织要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党员、干部增强定力、养成习惯，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3]为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必须锻造一支作风过硬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二、从中央八项规定入手抓作风建设的内在要求

抓作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坚持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实行风腐同查同治，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聚焦抓好重点群体的作风建设，坚持纠“四风”与树新风等举措协同发力。

（一）必须坚持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习近平同志强调：“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4]¹⁵⁸这一重要指示表明，党的作风建设

是一项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事业,党的作风建设是常抓不懈的事业。从“常态化”“长效化”的内涵来看,前者要求将作风建设融入工作、生活之中,通过持续的思想淬炼、党性锻炼和实践磨砺,让优良作风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自觉行为和习惯;后者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主张从体制机制层面破解作风顽疾,通过完善监督制度和优化考核体系等举措,形成靠制度机制实现规范化的长期效应。虽然两者各有侧重,但彼此之间密不可分,“常态化”是“长效化”的实践基础,“长效化”是“常态化”的制度保障。坚持两者的结合,才有可能将作风建设的“阶段性整治”推向“深层次治理”,为持续优化党风政风提供不竭动力。同时,需要看到,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形式的作风问题均具有“反复性”和“长期性”的特征,稍有松懈便会“反弹”。因此,面对作风问题这块顽疾,必须常抓不懈。

(二) 必须实行风腐同查同治

就严格意义上而言,作风问题与腐败问题各有侧重,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实践中,“风”与“腐”互为肌理,往往是一个整体。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时所言:“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不正之风滋生掩藏腐败,腐败行为助长加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4]122}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查处的违规违纪案件来看,享乐奢靡之风往往与“节日腐败”相勾连,这是由风及腐的典型体现。而腐败行为的发生,又带坏了社会风气,如个别党员干部甘于“被围猎”,助长了社会上的歪风邪气。现实生活中的违规违纪案例警示我们,无论是抓作风建设,还是惩治腐败行为,绝对不能单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坚持联系的观点、辩证的方法,将作风问题与腐败行为共同纠

治。“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4]126}

(三) 必须统筹抓党性党风党纪

如何辩证看待党性党风党纪彼此间的区别和联系?习近平同志曾在纪念乔石同志10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强调:“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5]这一论述表明,三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锤炼党性、端正党风、严格党纪,同样需要在统筹协调中推进。其一,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在日常工作和现实生活中,党员干部所展现出来的形象如何、素质怎样,是其党性状况的外在体现。其二,党员干部作风的优与劣,体现着这个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了解、掌握和遵循的程度。其三,在优良作风形成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起保障性作用的是党规党纪。因此,涵养党员干部的优良作风,既需要补足精神之钙,坚定理想信念,不断锤炼和生成过硬的党性,也需要严守党规党纪的红线、底线和高压线,从而在立根固本上下足功夫,进而防止歪风邪气的袭扰。

(四) 必须聚焦重点群体的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建设的成败,在于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于重点领域重点群体的榜样示范作用。在现实生活中,重点群体的言行举止和作风状况,广受社会关注,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代表性和广泛的示范引领性。聚焦重点群体的作风建设包括两层内涵,即“关键少数”的作风建设和重点领域里重点人群的作风建设。毋庸讳言,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己不正,焉能正人”。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同志为全党带了一个好头,早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6]87}他主张作为主

官的领导干部必须善于以身作则、勇于担当作为。在201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抓落实,一把手是关键,要把责任扛在肩上,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善于接最烫的山芋,把分管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7]。在作风建设的过程中,领导干部不仅要严于律己,也要妥善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防止“枕边风”,不能“护短”,在严格家教家风建设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从重点领域里重点人群的作风建设来看,像教育、医疗、就业、养老、金融、烟草、国企、能源、建设工程、招投标等领域,由于涉及领域的公共属性比较突出,关乎国计民生,因而备受人民群众的关注和重视,应有针对性地重点加强相关公职人员的作风建设。

(五) 必须坚持纠“四风”与树新风并举

众所周知,我们党抓作风建设意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严格作风建设,既是对党员干部的“严管”,也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党员干部的“厚爱”。在严格作风建设的实践中,反对什么,倡导什么,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习近平同志强调:“在严厉惩治不正之风的同时,开展时代新风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8]192}一方面,要以解决“四风”问题为重点任务和重要抓手,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学风文风会风等方面进行对照检查,纠风治弊,净化空气,使歪风邪气没有立足之地和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应引导全体党员干部重温并弘扬中共党史上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等优良作风,充分借鉴党的历史上作风建设的宝贵经验,使纯洁的党风政风在全党充盈起来。尤其是针对近些年来出现的个别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的现象剖析背后的成因,加大问责力度的同时,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制定容

错纠错机制,为能担当、能干事的干部撑腰和鼓劲,积极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导向和氛围。

三、党员干部自觉加强作风建设的经验启示

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背景下,党员干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过好党规党纪关、理想信念关、廉洁自律关、艰苦奋斗关、家风家教关,自觉从严加强作风建设。

(一) 坚决“讲政治”,严守党规党纪关

对党员干部而言,作风建设涉及方方面面,但“讲政治”这个重大原则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8]62}不讲政治或者讲政治不到位,最终结果必然是人心涣散,党和国家的事业呈现凋敝景象。从严加强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必须牢牢把握住“讲政治”这根主线,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首先,在思想层面,党员干部应老实地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自觉地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及时学懂、弄通、悟透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确保与党中央始终保持思想上的统一和方向上的一致。其次,在政治层面,党员干部应深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自己的言行举止始终与党中央的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最后,在行动层面,党员干部应“心中有党”,要不折不扣地贯彻和落实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向党中央做出的承诺说到做到,决不能打折扣、搞变通。

(二) 练好“基本功”,坚守理想信念关

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信念是本,作风是形,本正而形聚,本不正则形必散。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4]19}对领导干

部而言,理想信念作为精神之钙不是天生就有的,它往往来自对思想理论的坚定。因此,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应将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同时,学好以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回答好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只有练好“基本功”,拧紧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党员干部才有可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切实地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进而在干事创业中展现出政治坚定、公私分明、一切从实际出发、清正廉洁等优良作风。

（三）算好“三笔账”，筑牢廉洁自律关

2004年7月15日,在浙江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给当地的党员干部算起了“三笔账”,即经济账、法纪账和良心账,从得与失的角度,引导领导干部形成一种共识:腐败是最愚蠢、最得不偿失的行为。此举对党员干部干净干事产生了强烈的警示效果。在当前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推进的高压态势下,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三笔账”、算好“三笔账”,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在算“经济账”时不难发现,党员干部原本拥有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一旦踩踏“红线”将丧失一切,到头来得不偿失;在算“法纪账”时可见,在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面前,任何一位党员干部都不是“特殊”之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逾越“底线”必将受到惩罚;在算“良心账”时可知,对党员干部而言,任何一次的触碰“高压线”,都是对党组织的辜负,亦无法向亲友“交代”。这种“好干部”与“阶下囚”的鲜明对比,将对党员干部的心理产生震慑效果并引发思想共鸣。从这个角度而言,算好“三笔账”意味着守好三条“警示线”,修砌三道“防火墙”,

对引导党员干部始终筑牢廉洁自律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四）常思“己不足”，把牢艰苦奋斗关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史。正如2022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辽宁考察时所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奋斗,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过上了全面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9]党的红色革命史、辉煌建设史、澎湃改革史都已证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方法论,任何时期都不能丢。当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异常复杂。从外部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繁对华挑起“贸易战”“科技战”,科技“卡脖子”问题依然严峻。从内部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的压力较大。应对国内外一系列难题,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既不能被“局部小胜”的喜悦冲昏头脑,也不能掉入短视功利的陷阱,应时刻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以“刀刀向内”的勇气和“功成不必在我”胸襟艰苦奋斗、接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应有力量。

（五）扎牢“篱笆墙”，守好家风家教关

在现实生活中,党员干部的家风家教无小事。“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6]547}对党员干部而言,家风家教如何,往往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和生活情趣状况。“篱笆墙”是否牢固,决定着党员干部能否过好“家庭关”和“亲情关”。为此,党员干部首先要严于律己,严格按照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要求办事,为家属、子女和身边的亲友树立一个公正无私的榜样,持续涵养讲政治、讲大局、讲正气的家风。同时,党员干部在埋

头工作的同时，也应多注意加强与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沟通和联系，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认知倾向，坚决抵制来自外部的“围猎”，严禁任何形式的特权，以高标准、严要求守护自身家庭健康。此外，真抓敢管家风家教，贵在大公无私和对党忠诚。党员干部在面对自己的亲属涉嫌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时，不能“护短”，更不能“徇私舞弊”，而应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坚持依法处理，在社会上带头树立遵纪守法的形象。

概而述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狠抓作风建设，对遏制“四风”蔓延势头、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重塑党内政治生态以及扭转党风政风社风产生了积极效应，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金色名片”，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重要路径，也为全球政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从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到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这一“徙木立信”之举，将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向善向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567.
- [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6.
- [3]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N]. 人民日报，2025-03-19（01）.
- [4]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158.
- [5] 习近平. 在纪念乔石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4-12-17（02）.
- [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87.
- [7] 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情况为主题进行对照检查[N]. 人民日报，2017-12-27（01）.
- [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5：192.
- [9] 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22-08-19（01）.

责任编辑：陈琴容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践创新及经验启示

李志亮 刘永波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擦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金色名片”。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从“破”到“立”的系统化实践,加强了作风建设;通过从“上”到“下”的全链条实践,确保了责任的层层落实;通过从“点”到“面”的精准化实践,有效整治了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关于新时代作风建设的实践经验和规律性认识。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不断夯实作风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实践创新;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3-017-06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1]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念好‘紧箍咒’,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2]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彰显出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新时代作风建设的鲜明态度,也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意义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仅是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环节。中国共产党通过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效遏制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问题,增强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优化政治生态、提升治理效能提供重要保障,为实现党和国家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成就和经验研究”(24&ZD02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志亮,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

刘永波,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

（一）稳固执政根基：密切党群关系，凝聚民心共识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3]中央八项规定正是从人民所期盼的方向切实改进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强化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作风涣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侵蚀着党的肌体，在此背景下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从进一步改进调查研究、进一步精简会议活动和文件简报、进一步规范出访活动等具体问题切入，中央八项规定用“小切口”撬动作风建设“大变革”，破解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问题。“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为之一新。”^[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落实，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除特权思想和官僚作风，提升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之基。

（二）优化政治生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环境

新时代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优化政治生态的重要举措。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前，公款吃喝等“四风”问题较为普遍，腐败现象也呈发展蔓延态势，严重损害着国家的政治生态。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从规范公务接待、精简会议活动、严格公务用车管理、严控因公出国（境）等具体领域入手，构建起覆盖权力运行全过程的制度约束体系。这一制度性变革不仅划定了党员干部的行为“红线”，更从根本上破解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顽疾，使“四风”问题得到系统性遏制，党员干部作风持续向好，实现了党风政风整体上的优化。中央八项规定实施

十余年来，不仅有效遏制了公款消费等显性问题，更重要的是重塑了党内政治文化。中央政治局以上率下，中央国家机关积极跟进，带动整个政治体系形成以上率下、以下促上的良性互动，促使权力运行更加透明规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权威性得到根本性强化。中央八项规定这项党的自我革命措施，使得“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从制度要求内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自觉，为构建新型政治生态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赋能治理效能：推动作风革新，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中央八项规定能够持之以恒推动作风革新，有效激发治理效能的内生动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作风问题是影响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不良作风往往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的滋生，极大制约着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通过持续纠治“四风”问题，中央八项规定强化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打破传统治理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桎梏，建立起更加注重实际成效的治理模式。党中央还通过建立中央八项规定长效化教育机制、常态化监督体系等，进一步强化了对党员干部的纪律约束，严格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打破了传统治理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运行惯性。这种以制度建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方式，既防范了不良作风反弹回潮，又推动了治理方式的创新和优化。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践创新

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落实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突破口，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实践创新体系。

（一）从“破”到“立”：作风建设的系统化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过程中，始终遵循破立并举的系统思维，破除作风顽疾与建立长效机制双向发力，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在“破”的维度上，中国共产党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除作风顽疾。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5]“四风”问题违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也是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纠正“四风”问题作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突破口，以小切口推动大整治。针对文山会海、调研浮于表面、铺张浪费等具体问题，党中央通过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开展专项行动和常态化监督，逐步改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并破除其影响。在破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方面，中央八项规定通过严格规范公务接待、差旅报销等制度，压缩非必要开支，使勤俭节约成为党政机关的行动原则。

在“立”的维度上，中国共产党着力构建标本兼治的制度体系，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先后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形成以制度巩固作风建设成果的治理格局。党中央始终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将作风建设纳入党内法规，完善述职评议、考核问责等长效机制。同时，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题学习教育，推动全党以钉钉子精神持续纠治“四风”。总之，“破”“立”结合的系统化实践，推动作风建设从阶段性整治向常态化治理跨越，从“徙木立信”到常态长效的制度化跨越。

（二）从“上”到“下”：责任落实的全链条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践中，构建了自上而下、层层传导的责任落实机制，实现了作风建设责任落实上全链条覆盖。一是构建以上率下的领导责任机制。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就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6]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17年10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领导干部办公用房、公务接待、公务用车等具体标准，形成可操作、可追溯的制度规范。这种自上而下的示范效应，促使各级党委（党组）建立主体责任清单，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形成一级带一级的良好局面。二是完善制度体系，构建责任传导闭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相继出台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众多管党治党的规章制度，不断扎紧作风建设制度的笼子，形成涵盖公务接待、会议活动、文件简报等领域的制度系统。同时，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协同党委统筹推进反腐败工作，强化巡视巡察、审计、财会、统计等监督力量的联动机制。党中央还高度重视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作为各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三）从“点”到“面”：问题整治的精准化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突破口，聚焦整治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问题，层层落实主体责任，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实现从局部突破到全局深化的系统性转变。一是精准识别突出问题，聚焦重点领域靶向施治。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党中央坚持从群众反映强烈、长期存在的顽瘴痼疾入手，将公款消费、公车私用、文山会海等突出问题作为切入点，开展专项治理。例如，在公款消费领域，重点锁定违规宴请、超标接待等，严肃查处公款吃喝等问题；在公权使用方面，紧盯公车私用、私车公养等问题，运用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党的二十大以后，党中央进一步将整治重心向基层延伸，围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领域开展专项督查，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最后一公里”落地见效。二是构建长效机制，推动全域覆盖。在重点领域取得阶段性成效后，党中央注重将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固化减负措施，并要求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通过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完善配套制度，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要求落实到监督过程中，逐步形成覆盖“决策—执行—监督”全链条的治理体系。这种管党治党方式推动作风建设从“治标”向“治本”深化，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经验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

在作风建设领域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共产党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过程中，不仅将一些有力举措和成功经验不断转化为制度，更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验启示。

（一）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精准施策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践中始终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系统性纠治与精细化治理相结合，实现标本兼治。新时代推进作风建设，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应以问题导向为根本遵循，把握问题本质，精准施策，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成效。第一，坚持问题导向需强化系统性思维。作风建设面临的问题往往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问题的表现形式还会随地区、行业、阶段发生变化而呈现不同的特点。比如，“四风”问题表面上体现为享乐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但其本质是理想信念弱化、权力观扭曲，其中内含着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因此，深入推进作风建设，既不能停留在具体表象，也不能孤立看待单一问题，而应全面深入细致查找问题并探寻问题根源，抓住问题本质。第二，实施分类化靶向治疗策略，增强施策针对性。作风问题的区域性、行业性差异要求摒弃“一刀切”模式，需依据不同领域、层级的特点分层分类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在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部门，就必须重点防范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对于基层单位，必须着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对群众利益的侵蚀；对于国有企业等单位，必须聚焦享乐奢靡现象背后的管理漏洞。通过“一类一策”精准发力，既解决显性问题，又深挖制度短板，推动治理从“治标”向“治本”延伸，坚持问题导向与精准施策的辩证统一。

（二）坚持以上率下，注重示范引领

中国共产党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形

成以上率下、层层传导的责任闭环,才能实现作风建设的常态长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7]领导机关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机关,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风向标作用。^[8]各级领导干部应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对标,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工作的全方面、各环节。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从责任主体入手,通过建立健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将全面从严治党压力逐级传递至基层末梢。党的各级组织必须明确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既要求“一把手”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部署重要工作、督办重点问题,又强调领导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将作风建设融入业务领域同步推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强化监督职能,紧盯“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对侵害群众利益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严查处,形成强有力的震慑警示效应。通过这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政治高度认识作风问题的本质,自觉将严的标准内化为价值追求,筑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思想防线。

(三) 坚持系统推进,注重长效机制

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整体性、系统性与关联性的特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必须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风腐同查同治、健全制度机制,以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发展。一是持续推进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9]加强党性教育必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固本培元,牢记党的性质宗旨,提高党性

觉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源头上增强政治定力。推进作风建设需要聚焦突出问题,以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为切入口,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顽疾,推动政治生态清朗。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应强化广大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的意识,将纪律规矩内化为日常习惯,外化为刚性准则,全面提高纪律修养。二是必须坚持风腐同查同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享乐奢靡之风可能演变为贪污腐化,形式主义背后常隐藏权力异化。深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既要“由风查腐”,从违规吃喝、收受礼品等“小切口”入手,深挖利益输送、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又要“由腐纠风”,细查腐败背后的享乐奢靡等不正之风。同时,推动廉洁理念向社会渗透,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实现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良性互动。三是必须健全制度机制。深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不断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斩断由风及腐链条;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充分释放基层治理活力。通过健全作风建设的制度机制,不仅能够推动作风建设向制度化规范跃升,而且构建起防范作风顽疾再生的常态长效机制。

(四) 坚持群众路线,注重社会参与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写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新时代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必须将群众路线作为根本导向,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参与机制。一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作风建设的核心在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应坚守人民立场,聚焦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主动倾听群众呼声,精准识别作风问题的具体表现,对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必须坚决惩处。同时,党员干部应坚持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观点，通过常态化走访、蹲点调研等方式，掌握基层真实情况，从根本上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滋生土壤。二是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形成监督合力。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必须构建开放透明的监督体系，畅通群众举报和评价渠道，探索创新监督方式，借助媒体监督、第三方评估等力量，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督网络。三是健全制度保障，实现常态长效。深化作风建设，关键在于建立“四下基层”等常态化联系群众机制，确保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制度化、规范化。同时，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体系，优化群众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工作程序，拓宽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渠道，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当前，我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织的历史节点，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依然存在，特别是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领域深层次矛盾尚未彻底破解。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态势以及党内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新征程上必须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部署为指引，将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持续完善作风建设，在深化标本兼治中提升治理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锻造更为坚强的政治保障。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 2024-07-22(01).
-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5:122.
- [3]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46.
-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1:50.
-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14.
-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205.
-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499.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382.
- [9]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590.

责任编辑：兰丰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治理价值阐释

杨 蓉

(山西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在全球治理面临失灵窘境之际,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源泉, 主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既有的全球治理观和发展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对全球治理理念进行重塑, 同时以规范性原则重构、国际制度创新完善和多边对话机制构建三个层面为着力点,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十余年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一种对建设世界的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 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等维度拓展全球治理实践路径。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 价值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3-023-08

早在 19 世纪中叶, 马克思就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全球性问题, 提出了无产阶级的解决方案, 即建立指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全球治理模式, 构建合乎“真正共同体”原则的世界新秩序。在各类矛盾交织叠加、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的当今世界, 全球治理正面临失灵窘境^[1], 国际社会亟须新理念、新路径来引领全球治理。在这一背景下,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源泉, 主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既有的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观和发展观。中国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社会全方位展示其建设美好世界的中国方案, 遵循不同治理理念, 从不同治理领域, 沿不同治理路径, 与世界各国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为推动全球治理理念重塑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以及更好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新思路。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治理理念重塑

全球治理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球治理进程, 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软约束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揭示了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世界和合共存的客观规律, 为重塑全球治理理念指明了方向。

(一) 以“持久和平”重塑国际关系理念

和平是马克思一贯坚持和不懈追求的理想。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存续下去, 主要凭借各国间的互相残杀和血腥扩张, 这亦是当时国际关系呈现出鲜明冲突特征的重要缘由, 资本主义建立世界秩序的历史, “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2]。马克思呼吁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战争、争取和平, 强调暴力和战争是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依托, 而国际和平则是“自由人联合体”全球治理模式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

作者简介: 杨蓉,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政治学。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主张以西方价值观塑造世界秩序,扭曲了全球治理的公正性、合理性和包容性。西方国际关系理念倾向于认为国际秩序应该是基于规则的,但这种以实力为基础的规则背后潜藏着权力政治的逻辑,因而在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机制运行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受到主导国家影响,导致世界秩序陷入失序状态。^[3]近年来,世界秩序呈现出郑永年所说的“再封建化”现象,和平赤字愈发凸显,国际社会亟须重塑基于规则的国际关系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马克思和平理念为基础,提出以持久和平超越冲突对抗的理念。该理念既回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强调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责任,还主张通过建立基于新规则的国际秩序来减少国际冲突,推动各国间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倡导的是一种超越传统零和博弈思维的国际关系新模式。因此,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也是其对于“21世纪国际关系向何处去”的中国答案。

(二) 以“普遍安全”重塑全球安全治理理念

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也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马克思虽未曾专门提出过“普遍安全”这一概念,但其理论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安全思想,这些思想具体涵盖了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世界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诸领域,成为当前普遍安全理念得以提出的理论源泉。马克思立足战争与和平相互关系视角,剖析了消灭战争根源、谋求世界安全的路径选择,强调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和阶级,“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4]419},世界才会趋于安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安全思想,致力于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主张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习近平强调:“安全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

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5]在世界未有之大变局加剧演进之际,全球议题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泛安全化趋势日显,不断冲击着全球安全治理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普遍安全为核心要义,倡导以共同安全取代绝对安全,以综合安全超越传统安全,为破解人类安全困境贡献了中国智慧。同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并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回应了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冲突战争、谋求安全发展的迫切需要,全方位冲破了西方绝对安全观的排他性桎梏。

(三) 以“共同繁荣”重塑全球经济治理理念

世界共同繁荣发展是全球治理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早就意识到了共同繁荣之于“真正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认为世界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在这种社会中,“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4]308}。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共同繁荣、政治稳定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根据世界财富的累积和分配程度主要呈现出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当世界各国普遍贫穷时,国际政治便会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全球治理也会趋于有序;二是当各国贫富差距悬殊时,政治动荡随之产生,国际秩序也会呈现出无序和混乱状态;三是当世界共同繁荣时,国际政治朝着持续稳定的方向发展,全球治理效能提升,国际秩序也会更加公正合理。

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全球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依旧疲软,目前正面临增长乏力和通胀高企等困境。全球经济治理亟须新的价值理念指引,以确保世界经济的稳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经济治理的思想萌芽为基础,主张以共同繁荣为理念引领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难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旨在与

世界各国携手建设一个繁荣与共、政治稳定、秩序井然的经济共同体。在全球经济治理场域中,中国始终以共同繁荣为初衷,倡导构建金融、贸易投资、能源、发展等四大经济治理格局,在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的同时,与世界各国寻求利益共享,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

(四)以“开放包容”重塑全球文化治理理念

全球治理进程通常伴随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然而,在全球治理实践中,文明之间的交往受资本全球无序扩张的负面影响,时常会陷入对立与冲突的藩篱之中。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资本增殖,以“文明冲突论”为文明范式,倡导“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6]。马克思以批判资本扩张造成的文明交往非正义性为前提,深入剖析了文明交流的历史意义和未来图景,指出唯有实现多元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互联互通,才能以“真正共同体”取代“虚幻共同体”。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的动力源泉。然而,在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笼罩下,文明间的冲突、分裂和对抗时有发生,“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论调仍甚嚣尘上,全球文化治理需要通过一场理念革新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理解与尊重。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层面科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于文明交往的重要思想,主张以开放包容的文明交往理念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通过文明对话和平等交流全面超越“文明冲突论”的西方排他性、对抗性和集团性思维,为打破文明隔阂、化解文明冲突贡献中国智慧,以此汇聚应对全球性挑战与威胁的文化力量。中国始终以仁爱包容、开放进取的心态探索文明共融之道,秉持“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理念,并通过提出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实现从理念到行动方案的飞跃,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五)以“清洁美丽”重塑全球生态治理理念
大工业时代对于人的主体性的颂扬,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随之而来的是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针对资本主义以资源换取利润榨取自然界的无序行为,马克思提出了生态治理思想,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试图通过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物质交换的方式,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马克思全球生态治理思想的引领下,人类开始意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近年来,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类生存和可持续性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强全球生态治理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然而,全球生态治理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之呈现出纯公共产品特质^[8],在治理过程中极易产生不作为的“搭便车”现象,造成生态治理的“责任赤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生态领域吸收借鉴了马克思生态治理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理理念,站在人类永续发展的高度,提出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人人都享受绿水青山”^[9]。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清洁美丽”为价值理念,在国际社会树立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意识,弥补了全球生态治理领域的价值观缺失,为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价值遵循和实践指向。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作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和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坚决维护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提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从结构要素的视角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以规范性原则重构、国际制度创新完善和多边对话机制构建三个层

面为着力点,为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一)秉持新型全球治理观,明确改革的价值导向

全球治理体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建构具有共同价值的规范性原则;该原则需要超越单个国家和集团的利益,具备鲜明的共同利益取向。需要注意的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尚未建构出统一且体现全球治理共同价值的规范性原则。虽然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价值原则在全球治理场域中的认可度较高,但并未形成规范性的价值体系和标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共同性的价值理念^[10],其全球治理观的核心价值在于“共商共建共享”,即倡导治理主体间的协商对话、通力合作和成果共享。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融合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全球共同价值,并将其规范化为联系紧密、共识性强的价值体系,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完善。共商指的是国际事务要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平等协商化解分歧,兼顾各方诉求,统筹各方利益,形成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力。共建意指全球治理体系由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建设,其目的并非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是强调以合作增进互信,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共享则是对全球治理的美好期盼,它立足于全球共同利益,旨在通过利益共享让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换言之,全球治理不仅要使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不断扩大,也要致力于解决发展赤字问题,缩小发展鸿沟,让发展成果能够惠及世界各国,让各国人民享有富足安康。

在地缘冲突和大国博弈不断加剧的百年变局

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亟须以内含共同性的规范性原则为价值导向,为错综复杂的全球治理格局指明前进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为破解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性难题提供了新思路,该原则凝聚了国际共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刻影响,得到了愈发广泛的认可和支持。2017年召开的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将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写入其中。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为凝聚全球治理改革共识提供价值导向,与世界各国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二)推动既有国际制度改革,夯实改革的制度基础

全球治理体系的第二个层面涵盖了各个治理领域的国际制度安排。^[11]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际制度存在新旧制度并存、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型远没有完成的情况。虽然应全球化发展需要,既有国际制度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仍然无法满足现实发展需要。当前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层出不穷,全球性挑战也越来越复杂。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导致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网络空间、数字治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新问题新挑战接踵而至,现有国际制度无法有效回应这些新兴问题,由此在某些领域产生了规则真空,导致全球治理的供需失衡,国际社会亟须对各个治理领域的国际制度进行完善和创新,以适应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推动全球治理的深化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生理念为依托,内在包含了国际制度的合理诉求。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主导国家的意志常常凌驾于全球治理共识之上,国际制度所体现的“共同利益”实际上是对主导国家“个人利益”的美化和包装。^[12]习近平曾明确提出国际制度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

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13]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厚植全人类共同利益,通过建设涵盖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等领域的国际制度,破除全球治理体系对既有国际制度的依赖,夯实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制度基础。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依托制度化的实体组织和实践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全球治理的持续推进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在全球、区域和双边三个维度全方面推进,通过贸易、投资、合作、开放等路径增强共同利益,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框架。十余年来,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先行,通过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与国际制度进行有效对接,又以将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制度化的方式推动国际制度发展、完善全球治理体系。^[14]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再现,在制度建设中坚决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

(三) 构建多边主义对话机制,拓展改革的广度深度

全球治理体系的第三个层面是基于各个领域国际制度之上的决策机制,该机制通过多边主义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其运行管理、规则制定有赖于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多边机制。鉴于全球性挑战的多元化,全球治理在应然状态下是一种全球大多边的治理,即各个层次的治理主体携手解决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与挑战,合力打造出具有全球性、平等性和互惠性的全球公共产品。然而,在当前这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现有多边机制赤字却在不断增加,其所蕴含的“一国主导、西方定

制”的浓厚色彩^[15],无法适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更难以满足国际社会对于全球公共产品的现实需要,使之与全球大多边的治理模式相去甚远,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构建完善多边机制。

中国始终践行多边主义理念和价值,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机制,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多边主义理念,构建完善多边主义对话机制,倡导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通过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与西方国家主导的俱乐部式的、小圈子主义的多边机制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倡的多边机制以平等对话为基础,以国际规则为行为准则,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平等协商为基本原则,支持和践行多边主义。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应该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目标,以维护公平正义、推动互利共赢为宗旨,以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基础,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16]

中国以实际行动增强全球治理的协同性与整体性,积极构建多边主义对话机制。中国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对话机制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上,引领现有多边机制改革。例如,2015年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发达国家总体份额降至57.7%,发展中国家总体份额提高至42.3%,有效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中的参与度和发言权。同时,中国将多边主义理念贯彻到全球治理实践中,积极搭建多样化的多边合作机制,具体涵盖以“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等为代表的多边合作大平台,以及以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为代表的区域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构建完善多边主义对话机制,并使之常态化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路径,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展全球治理实践路径

十余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国倡议逐渐发展为国际共识,从对建设世界的美好愿景日益转化为丰富的全球治理实践,为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中国力量。

(一)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17]。联合国是当前全球范围内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国际组织,也是多边机制的“神经枢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时刻牢记自身肩负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主动参与联合国主导的多边机制和各项国际事务,致力于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将维护联合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核心作用视作一种重要的全球治理路径,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使之成为化解分歧和争端以及凝聚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观念层面面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18],展现的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能力和信心,而联合国作为践行多边主义的核心机制和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对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具有主导性作用。因此,中国在充分尊重联合国作为国际磋商和国际合作主平台和主渠道地位的基础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积极参加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治理行动。例如,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国参与了历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采取有力政策和行动落实国际气候协议,与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进程。中国还支持联合国体系内的合理改革,倡导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提高其权威和效率,增强其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如在人工智能愈发泛化

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讨论人工智能治理,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

(二)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在全球治理遭遇政治化风险和赤字危机的百年变局下,构建怎样的国际关系成为破解全球治理集体行动困境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思想,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旨在为变乱交织的全球治理体系增添稳定性。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公平正义为原则,摒弃传统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不搞“小集团”“小圈子”,试图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之路,促进各国相互理解、和平共处,有效避免国际社会陷入新冷战风险,为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妥善处理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推进全球治理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紧密结合,不断拓展新型国际关系实践。一是加强同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世界和平发展需要协调稳定的大国关系,中国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确保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航向前行,与俄罗斯加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与欧洲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关系,推动欧亚大陆繁荣稳定。二是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中国在同周边国家不断增进同包括东盟在内的周边国家利益交融、民心相通,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与周边各国共同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三是加强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深化同拉美、非洲、阿拉伯国家整体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伙

伴关系。

（三）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各国制度规则互通和政策理念协调，实现“一带一路”共建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的精准对接。^[19]循此出发，“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一种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治理方案，该方案秉持包容、渐进、公正、互惠的理念，在实践层面强调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五大领域的互联互通。“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20]，主张通过对话协商与政策沟通相互协同的方式破除全球治理进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以多元合作机制构建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健康共同体^[21]，为推动全球治理、实现共同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一带一路”建设通过“硬联通”和“软联通”相结合拓展了全球治理的实践路径。“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即通过“硬联通”将其从倡议转化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使之成为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实体性架构。在沿线国家的共同推动下，“一带一路”促成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推动了均衡型价值链分工结构的形成^[22]，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共建“一带一路”还通过规则、制度、机制等“软联通”路径持续深化各国在规则标准领域的合作，提高中国及沿线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国际制度建构和国际机制完善等方面的影响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代表的多边合作平台，目前已对十余个区域合作机制和地区性组织进行了有效整合，有效提高了“一带一路”多边机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

（四）全面落实“三大全球倡议”

在全球治理体系供需不均衡、全球安全风险增

多以及全球地缘冲突不断的国际形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内生动力，通过上述三者的协同联动，破解全球治理困局，弥合全球治理赤字，为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坐标，以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为战略引领，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逐渐改变了“中心—边缘”两极分化的全球治理模式^[23]，明确了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方向。

全球发展倡议着眼于解决全球治理体系的供需失衡问题，为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提供物质之基。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已有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共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全球合作共识和全球发展繁荣得到持续拓展，并以其全球公共产品属性缓解全球治理的赤字危机。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解决全球安全治理欠缺问题，主张世界各国携手实现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中国以全球安全倡议筑牢全球治理和平之基，以共同安全理念引领全球安全治理，为晦暗不明的全球安全困局注入稳定因素。譬如，针对中东乱局，中国持之以恒劝和促谈，于2023年斡旋沙特和伊朗和解，为缓解中东紧张局势、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贡献了和平力量。全球文明倡议意在解决当前世界分裂对抗的紧迫问题，深刻把握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本质属性，主张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为全球治理的持续推进奠定人文基础。中国借助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等机制平台，通过召开亚洲文明对话、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中非文明对话等路径，拉近异质文明间的距离。

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源泉，深刻揭示了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世界和合

共生的客观规律，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指明了方向，蕴含着丰富的全球治理价值。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对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发展，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重塑了全球治理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诸领域的治理理念，为引领全球治理理念完善贡献了中国智慧；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规范性原则重构、国际制度创新完善和多边对话机制构建三个层面着手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以及构建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为路径选择，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 [1] 秦亚青. 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04): 4-18.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820.
- [3] 刘雪莲, 胡语嫣.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 逻辑特征与时代价值[J]. 东北亚论坛, 2023, 32(01): 31-43.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354.
- [6] [美]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29.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926-927.
- [8] 李包庚, 耿可欣.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治理[J]. 治理研究, 2023, 39(01): 28-39.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43.
- [10] 李包庚, 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 破解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案[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9: 5.
- [11]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2.
- [12] 任晓, 金天栋. 当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方式: 一种制度化的视角[J]. 国际观察, 2021(03): 20-60.
- [13]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 人民日报, 2017-01-20(01).
- [14] 王明国.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制度基础[J]. 教学与研究, 2021(05): 75-84.
- [15] 吴志成, 刘培东. 促进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09): 23-44.
- [16] 习近平. 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公开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11-15(01).
- [1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 [18] 康晓. 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 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转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200.
- [19] 巴殿君, 王一然, 左天全. “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的内在逻辑及路径探析[J]. 国际关系研究, 2024(03): 118-134.
- [20] 习近平. 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N]. 人民日报, 2023-10-19(02).
- [21] 刘博, 蔡文成.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建设重要论述[J]. 上海经济研究, 2024(02): 5-16.
- [22] 梁昊光. “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治理: 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J]. 太平洋学报, 2024, 32(01): 17-30.
- [23] 杨鲁慧. 三大全球倡议: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球治理观[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3(05): 18-33.

责任编辑: 丁春华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理论特征、价值意蕴与实践要求

杨雪玲

(福建日报社,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人才工作作出的系列重要论述, 构建起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体系, 深刻揭示了人才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实践路径,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才工作规律性认识达到新高度。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 系统阐释这一理论创新成果的核心要义、理论架构与实践方略,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引与实践遵循。

关键词: 新时代人才工作; 理论内涵; 价值意蕴; 实践要求

中图分类号: C9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3-031-05

千秋基业, 人才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才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 系统全面回答了新时代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为推进新时代人才工作提供了深刻的现实启示。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持”作为专节加以阐述^[1], 将人才工作的重要性提到新高度。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内涵丰富、视野宏大、意境高远, 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从 2021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八个坚持”的工作纲领, 到 2022 年 1 月,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意见》中正式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 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新时代人才工作作出的进一步部署, 鲜明凸显了党中央对人才发展规律认识深度的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 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人才强国、什么是人才强国、怎样建设人才强国等重大问题^[2], 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

1. 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人才强国”, 明确了人才工作的战略意义。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看,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其中, 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而在生产力的发展中, 劳动者起着首要的、能动的作用。因此, 科学

作者简介: 杨雪玲, 福建日报社人事处劳资科科长、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研究方向: 新闻与传媒。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则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3]从新时代人才工作面临的挑战看,国际层面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之间高层次人才、科技制高点争夺日趋激烈,全球竞争进入新格局,迫切要求依靠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内层面上,科技的迅猛发展对人才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才培养使用提出新要求。统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归根到底靠人才,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起着关键支撑作用。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看,当下,我们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必须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

2. 深刻回答了“什么是人才强国”,构建了人才工作的战略布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明确提出“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4],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发展的最终价值导向。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才是真正的新时代人才强国。从人才使用上看,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积极营造尊重关心支持人才的良好环境,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放手使用人才,让大胆创新、包容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既重视创新成功,也宽容创新失败;不拘一格用人才,让各类人才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通过一个个人才事业梦的实现,促进整个中国梦的实现。从人才平台上看,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在一些中心城市建设聚集人才战略支点,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广阔的天地和平台。从人才集聚上看,运用好开放、市场、环境等现实

要素,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在党和国家事业中来。以开放为动力,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引进海外人才,培育国内人才国际化;以市场化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配置优化人才资源,最大限度保护和激发人才活力;以环境为支撑,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发展环境,让广大人才有用武之地,无后顾之忧。

3. 深刻回答了“怎样建设人才强国”,提出了人才工作的战略举措。马克思主义人才观强调,人才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培养和开发。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那他就只能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5]335}人才的成长规律决定了必须依靠社会“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来有效“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6]从组织领导上看,必须坚持党管人才这个根本要求,“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格局”^[7]。从需求导向上看,要以“四个面向”为目标方向,吸引和集聚各方面优秀人才,实现人才与科技、经济、国家、人民的有机融合。从体制机制上看,要根据实际需要,“向改革要动力、用改革增活力,向用人主体授权、积极为人才松绑,真正建立起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8]。要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提速,从完善人才培养、人才流动、人才评价、人才激励等机制入手,在服务、支持、激励上下功夫,破除各种人才体制机制束缚,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历史机遇和时代挑战的战略判断,以国际视野和历史深度,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才工作的实践出发,系统总结了

我党的人才思想,推动了我国人才事业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并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5]571}。因此,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最高目标就是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7],“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10]53}。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提出,彰显了人民性。只有心系人才个人发展,拓宽人才选拔视野,让每一个人都能凭借自己的劳动和能力创造出更多成果,才能实现社会价值与人的发展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提供人人出彩的机会,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

2. 丰富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着眼于国内外人才竞争态势,立足当前又兼顾未来,基于中国又面向世界,深化了新时代中国人才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实现了新时代人才工作的理想构建和实践探索的有机统一,既彰显了其独到的人才视角,又服务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宏观布局 and 战略理念,从人才角度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了战略部署,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路径。

3. 引领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当今中国发展变化对人才工作的现实要求,人才工作必须贯穿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把人才制度优

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以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突出人才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核心支撑作用,创新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统筹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大限度激发人才活力。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实践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才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管人才,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树立“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的人才工作理念,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人才强国。

1. 坚持党管人才,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做好人才工作,关键靠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就是要将党管人才落实到人才工作各环节、全过程,加强人才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完善党管人才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一要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既要吸收先进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入党,也要发挥人才作用,安排人才到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带着感情尊重人才、关爱人才,创新教育方式,引导各类人才增强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服务人民的意识,实现“增人数”和“得人心”的统一。二要完善党管人才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委要统一领导,坚持“一把手”抓“第一资源”,健全党管人才工作格局,推动从人才管理向人才治理转变。压紧压实人才目标责任,以考核传导压力,以压力推动落实。健全人才工作多元化人才投入机制,保障人才工作投入,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三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系统观念,加强统筹谋划,积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改革举

措。坚持问题导向,向用人主体授权,真授权、授到位,积极为人才松绑,完善人才评价体系,把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坚持产学研合作,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让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坚持真心爱才,营造“四个尊重”社会风尚。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11]30}。“四个尊重”明确了营造良好环境的着力点,为我们构建让人才“无后顾之忧”的发展生态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要善于从宏观、中观、微观上营造环境、优化环境,构建“近悦远来”人才发展环境促进人才发展。宏观上,营造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大科技奖励力度,推广“人才日”“人才月”“人才公园”等做法,切实增强人才的荣誉感、自豪感。整合宣传资源、聚焦宣传重点,加大宣传力度,宣传典型,弘扬正能量,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中观上,营造公正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坚持对体制内外的人才一视同仁,进一步健全人才政策法规,发挥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和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更好发挥党委、政府作用,努力营造、完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建立健全高校院所等事业单位人才优胜劣汰机制,完善职务科研成果权益分享机制,进一步激发人才活力。微观上,营造待遇适当、保障有力的工作生活环境。在人才聚集区周边配套齐配优医疗教育、便利交通、休闲商圈等服务资源,布点建设人才创新创业服务综合体,提供人才发展“全生命周期”服务。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人才住房制度,采用集中建设、商品房配建、改造等方式筹集房源,着力解决人才“安家”需求。

3. 坚持悉心育才,完善人才队伍“战略布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11]30},“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11]30}。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

人才自主培养机制”^{[12]29}。聚焦建设战略人才力量,坚持走人才自主培育之路,更大力度培养造就一大批人才,增强“高精尖缺”人才储备,厚积人才资源优势。一要造就战略科学家。战略科学家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中的“塔尖”,要以超前视野谋划遴选培养战略科学家。当年,美国极力阻挠钱学森回国,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美国海军陆战师。要坚持实践标准,从科技创新主战场中发现、培养、使用更多后备战略科学家,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二要培养领军人才。围绕“四个面向”目标,加快集聚、支持一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加速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注重构建完整的科技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优化领军人才发现机制,遴选培养一大批科技领军人才。三要储备基础人才。青年人才是人才队伍中的有生力量。在人才政策、培养支持上向青年人才倾斜,给予更多信任、更多帮助。大力培养技能人才、卓越工程师,前移培养关口,加强产学研合作,为重大产业布局提供战略人才储备。

4. 坚持倾心引才,构建人才聚集“比较优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 and 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11]30}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12]17}。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两个大局”,紧紧抓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充分发挥人才引领驱动作用,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对标世界一流水平,加快推进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吸引全球创新要素,着力提升在全国范围配置人才的能力,持续涌现大量前瞻性原创成果,能够在重要领域引领全球产业发展,致力于成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坚持全国一盘棋,打造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协同发

展的人才集聚平台。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特色,着力集聚高端人才、创新资源,在若干战略领域和高端产业形成独特优势,成为区域人才中心。坚持试点先行,改革牵引,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实现差异化、互补式联动发展。规范引才行为,引导各地区、各部门立足实际做好引才工作。以全球视野大力引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抓住全球人才流动新机遇,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加强政策、要素、服务供给,更大力度、更加精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5. 坚持精心用才,以用为本引领转型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1]30},“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1]30}。积极引导人才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依靠人才驱动创新,依靠人才引领发展。一要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引领发展。着力破解人才资源配置不平衡、作用发挥不充分的问题,统筹配置人才资源,把各类人才引导到国家战略平台去建功立业。二要完善科研任务“揭榜挂帅”制度。鼓励科技领军人才挂帅出征,破解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难题,突破发展“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三要创新柔性引才用才推动资源共享。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在、但求所为”的理念,坚持需求导向,以用为本,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柔性引用、柔性使用人才,促进智力共享、成果共享、收益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建设新时代人才强国的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理论的最新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人才工作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彩的

“人才篇”。我国人才工作要始终做到“八个坚持”,不断推动党的人才工作理论与实践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 [1] 杨凤城,涂芝仪.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三重考察:历史生成、历史性变革、重要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03):25-32+204.
- [2] 吴江.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J].红旗文稿,2023(03):22-25.
- [3] 习近平关于人才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23.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73.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0.
- [7] 习近平.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J].求是,2021(24):4-15.
- [8] 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N].人民日报,2022-1-13(09).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 [1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责任编辑:陈琴容

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牟娟

(东华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从征服自然观、科技异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等方面,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的三重肇因;并从树立人与自然一体性观念、运用科学技术调节物质变换、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三个维度,提出了弥合“裂缝”之策,为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 物质变换裂缝; 弥合物质变换裂缝; 马克思生态思想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3-036-09

引言

“物质变换”作为20世纪生态自然观的重要理论来源,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出现了128次。^[1]尤其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人的生产生活实践,对“自然—人—人类社会”三个层面物质变换作了系统阐述,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叫作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2]并指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将导致“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3]919},提出了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探索了弥合裂缝的策略。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不仅实现了对生理学、农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范畴的超越,还赋予了物质变换以生态和社会双重意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

近年来,随着人与自然矛盾的日益严峻,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成为研究马克思与环境保护思想关系问题上最重要的概念^[4],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众多欧美学者

基于马克思的文本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生态思想的理论空场”进行了反击,完成了对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价值建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为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了“全新的视角”。^[5]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所进行的深刻批判,超越了当代许多绿色理论的唯心主义、唯灵论和二元论。^{[6]23}日本学者斋藤幸平根据对马克思生态学笔记的系统研究,进一步认为新陈代谢断裂是为了资本的高效增值而对物质世界进行无休止的形态转换的结果。^[7]国内学者在引入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的内涵、发展路径及其当代意义。如,郭剑仁认为,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应包含自然界中生命的与非生命的物质变换、人与自然界之间土地和劳动的物质变换、社会中商品交换的物质变换。^[8]毕秋认为,坚持物质变换的人民导向,发展循环经济是马克思对弥合物质裂缝的探索。^[9]蒋彧认为,综合

作者简介: 牟娟,东华理工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运用《资本论》中生态思想带来的各种启示,可以避免偏差,让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更大成效。^[10]然而,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的致因剖析是从哪些方面展开的?对弥合“裂缝”又做了哪些探索?这些探索对生态文明建设又有哪些启示?尚需在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进一步探讨。

一、“裂缝”产生的三重肇因

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剖析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征服自然的观念、科技异化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同作用,导致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

(一) 征服论主导下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的思想病症是征服自然观念,或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主导着人的实践活动。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人的需要具有唯一性、至上性。

1. 征服论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将二者的关系简化为对立的二元结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1]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与自然界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人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界的支持,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必需的外部环境保障。并且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必须同自然规律保持内在一致性,即在尊崇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获得满足自身生存发展之需。但在征服自然观念或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主导下,人的需要具有唯一至上性。人从自然的一部分中抽象出来,成为统治自然的绝对异己力量,随意处置和利用自然,以机器为代表的科技运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人类将自然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并不顾及自身活动给自然界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自然沦为服务人的绝对需求的对象物,这种二元对立,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同一走向异化与分裂。

2. 征服论打着满足人类的旗号,将剥削自然的行为正当化。全方位地控制自然这一观念,虽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却与资本主义的自然观相契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劳动不是自我幸福感提升的途径,而是谋生的手段,这种异化劳动导致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和劳动异化,使“国民财富”这个概念不具备任何意义。^{[12]60}“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13]686}生产剩余价值,是资产阶级直接行为动机。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并诞生了这样一个普遍有用的利用人与自然的体系,认识自然的目的是为了在最符合自然规律的条件下进行人类实践活动,而是为了更充分地利用自然、驾驭自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更高的东西,一切东西的合理性都要通过这个体系来得到说明。”^{[14]90}在这个体系之中,无论是人还是自然,都仅仅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两个环节、满足生产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存在。这种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双重剥削之上的社会化生产,既无法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也无法实现人对自然的反哺,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加深和人与自然物质循环的“断裂”。人类福祉需要的满足,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对人与自然剥削的正当化。

(二) 科技异化为人对自然力胜利的标志

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科学技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盲目扩大生产的需要,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破坏日益加剧,使人的生态生存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都不复可能。

1. 科技异化使得物质生产的过程演变为人对自然力的征服与统治过程。高兹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就带有政治色彩,是为资本主义阶级和政治制度服务。^[15]“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16]508},“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

接的生产过程”^{[14]356}。以英国为例，其“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70年间增加了2700%”^[17]，却把产生的废气、废渣、废水直接排放到大气、土地和湖泊中。与此同时，技术变成“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16]579}，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肆无忌惮地攫取能源资源，却不对土地进行养护，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森林破坏。正如日本学者岩佐茂指出的那样：“资本逻辑对自然的运用规则，就是无偿接受环境、大气、水等环境资源，并在生产过程中把污染的大气、水排放到环境中，是理所当然的事。”^[18]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科技应用，忽视自然承受阈值，粗暴解构自然，非但没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成为贫困的根源”^[19]。这表明，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科技进步不仅没有提升人类幸福感或促进自然修复，反而异化为奴役人类和自然的敌对力量，从而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裂缝”提供了动因。

2. 科学技术异化为资本扩张的重要手段，资本运用科学技术为实现其增值目的保驾护航。“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13]418}在此过程中，科技与劳动分离，劳动异化就转变为了科技异化，人的劳动主体性地位被弱化。“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力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13]698}从这意义上来说，科学技术只有在为资本服务、变成资本运行的工具时，其自身才会发生异化，并把人和自然的利益排除在资本增值的目的之外。科技成为“裂缝”程度更深、范围更广的帮凶。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技术进步会超出必须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它曾作为统治和剥削的工具并因而限制了它的合理性。”^[20]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

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21]35}。资本家为了达到生产成本外在化，收益内在化的效果，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不可持续性通过远距离贸易手段，使“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3]919}。

（三）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成本的外化

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22]这就表明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与社会组织形式或制度形式密切关联。

1.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裂缝”表现得最为典型。虽然“裂缝”一词产生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期，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延展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马克思从八个方面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系统比较。他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受自然界支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和自然条件都受劳动产品的支配。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和自然沦为资本增值的附庸，“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21]592}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往往呈现出最简单的模式，“裂缝”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不会太大、太重，以非典型性的形式存在着。但随着人类完成了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跃迁，“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23]这就导致“裂缝”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发生了质的飞跃，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非典型“裂缝”让渡到资本主义时期的典型“裂缝”状态。马克思正是看到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的动态化发展，并基于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关系的分析，直接提出了“裂缝”概念。

2. 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极尽所能外化生产成本。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本质是一种扭曲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扭曲的关系中,资本掌控一切,“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是其唯一的行为准则,控制着人与其他一切事物的关系。马克思以土地、瀑布、矿藏等自然资源的使用为例,说明资本增值逻辑总是无视自然法则,想尽一切办法使生产成本外化,贪婪地向自然界索求“不费资本分文”的馈赠,或是把废气排入大气、让废水流入江河湖泊,或是把后果转嫁给外国国家、转移给后代。“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16]587},自然只有为资本增值服务,才有意义。其结果必然是资本对自然的统摄、掠夺和破坏,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裂缝”也随即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常态,在形式上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却是资本增值的无序性和自然循环的规律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要求无限增值的内在本性,是引发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断裂”的内在驱动力。

二、“裂缝”弥合之策

马克思基于对“裂缝”根源的分析,开启了何以弥合“裂缝”的探索,主张依靠重塑人与自然关系、转变科技的生态导向与革新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实现“裂缝”的弥合。

(一) 树立人与自然的一体性观念

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合理物质变换,不仅要从事制度的变革入手,还要从人的思想观念入手,为弥补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提供思想保障。

1. 人与自然是一体性的关系。针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问题,马克思从活动性、关系性以及历史性的角度来考察人和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首先是人类生产实践的场域。自然作为感性、实体的存在,与人类的感性经验密切相关,人类不应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将自然看作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对象性存在,而应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

具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又由于自然具有其自身的先在性和客观性,无论人的理性力量和智商发展到何种程度,都要受到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制约。同时,人又是社会性的人,“类意识”“类本质”“类属性”的发挥,决定了人能够探索和掌握自然规律,为弥合“裂缝”提供可能。这就从源头上触动了导致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根基,克服了将人与自然置于抽象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考察的缺陷。同时通过对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中心之争”的批判,揭示了人与自然是同塑互构、互养相成的关系,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得以在全新的视域下开启。“消解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人在生态整体性中扬弃了绝对主体性。”^[24]

2. 只有在最合乎自然限度的前提下开展物质变换,人对自然的改造才具有正当性。如前所述,资本要求增值的目的,把人的需要凌驾于自然承载力之上,罔顾自然限度和人对自然的依赖,进行非正当的生产、消费,最终造成“裂缝”出现。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出发,提出了人的本质的复归能矫正人对自然的非正义索取,即“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12]185}。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不再出于自私的利己主义以及赚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目的而占有自然资源,人的需要将回归到人的本质和合乎自然限度的基点上,最终实现“自然的解放”。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的需要的满足与对自然的反哺统一于人的社会性活动、感性劳动之下,不仅明确指出了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是在生命共同体的场域下进行的,还详细阐述了人与自然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即使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人与自然的必然达到一个合乎规律、合乎人的需要的双向互动、和谐共生的状态。

（二）运用科学技术调节物质变换

与激进的环保学者们只看到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反对人对自然的利用，要求废除工业生产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不同，马克思主张人对自然的合理性利用要建立在科技的生态转向之上。

1. 破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资本逻辑导向，向人的正义性需求回归。马克思立足政治经济学视角，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科学技术成为“资本的生产力”^{[14]392}，异化为统治人和自然的工具，使人的生态生存不复可能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由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自然资源愈加被裹挟入资本的节奏中，构成了资本—技术—自然力的变换形态，并将破除科技异化的根本出路指向对资本主义完成全面、彻底超越的共产主义，主张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科学技术对“自我异化的扬弃”^{[12]182}。即是说，科学技术作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关键桥梁，在帮助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满足需求的同时，应拓展对自然的认识和敬畏。此外，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和生产资料，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循环利用。马克思不仅关注到了科学技术的经济效益，更关注到了科学技术在实现人与自然合理物质变换中的重要作用。他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批判范式和对科学技术在未来社会的“应然”状态的畅想，为实现科学技术的正义化利用指明了方向，即服务人类的共同利益而非资本增值的需要。通过合规律地开采自然资源、高效改造自然以及充分关切其他要素的平衡稳定，科技将助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2. 绿色科技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原动力。持技术悲观论的学者认为，科学技术是导致自然资源短缺的罪魁祸首。马克思对此持相反观点，认为科技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的科技运用才是导致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的根源，要以绿色科学技术的应用来“调节控制”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发现、开辟新的自然资源及其新的用途”^[25]，以促进废物循环利用，发

展循环经济。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循环是与物质循环（生态循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物质变换又与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相联系。”^{[6]172}科学技术则是二者有序循环的基本中介，“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本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3]115}即是说，科技的进步为促进生产资料循环利用打开了广阔天地的同时，也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撑。此外，科技水平的提高还将合理化、生态化地改造人类社会关系。

（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都源自于资本的剥削本质。这就规定了彻底的解决方案是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变革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性重构。

1. 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前提是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私有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裂缝”，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可弥补的自发性断裂，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的无法弥补的典型性“裂缝”，不是人与自然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少数人占据绝大多数自然的和社会的资源财富，对自然的支配力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因此，生产活动的异化——私有财产是阻碍人与自然的合理物质变换的关键，而“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实际上蕴含着共产主义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在自由自觉劳动下被彻底解决的可能性。“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6]只有变

私有制为公有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裂缝才有弥合的可能。

2. 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和解最终指向未来共产主义。如前所述，马克思对物质变换“裂缝”的原因剖析，已经明确指出了资本的逐利性特质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是引致生态危机的原因。因此，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是弥补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的保障。马克思对此有过详细论述：“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16]96}“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16]683}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传统生态学只是简单地就生态而谈生态问题，忽视引发生态问题的深层次社会动因。马克思始终坚持社会视角和自然视角相统一的原则，更多地指向受特定社会关系制约且被人的劳动中介过的自然。因此，他强调社会制度变革是实现物质变换“裂缝”的根本前提，“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整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并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支配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代谢。”^{[3]926-927}不仅肯定了人利用自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还提出了只有“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最终实现物质变换的“合理调整”与“共同控制”。

三、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的当代启示

当前，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裂缝”发展到了更高阶段，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全人类共同难题的形式存在着。马克思对弥合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的考察，为我们克服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引。

（一）厚植“四个共同体”理念，塑造全球生态观

从长远来看，要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实现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目标，离不开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纵观现代西方生态思潮和生态理论，总是站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围绕着“人和自然究竟谁主宰着世界”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人与自然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和“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之中。由此，形成了人与自然相互割裂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两大话语范式和两种价值立场。与二者割裂人与自然关系的做法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是一体性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批判吸收“深绿”“浅绿”思潮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原创性理念，点明了人与自然是共同体的关系，为全球生态治理奠定了基石。

“四个共同体”层层递进、相辅相成。“生命共同体”从本体论维度揭示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27]。阐明了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依存、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必须依赖于自然，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有机共生关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则从生态价值观层面，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8]，强调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对于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性。“地球生命共同体”从生态安全边界层面，强调“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29]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从全球生态治理层面，进一步强调建设美丽清洁世界应当秉承的基本理念。其中，“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均强调的是人类与自然生命之间的

有机共生关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观察自然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整体论和系统论视角。^[30]“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生态危机的应对置于共同体的场域内进行解答,为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变革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纲领”。^[31]

(二) 强化绿色科技应用,促进有序有节物质变换

马克思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出发,指出了“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32],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在更深、更广的维度上发展。因此,要消除生态危机,促进建成经济向好、生态向美的生态文明社会,就要加快绿色科技创新与转化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科技观,围绕绿色科技创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规避西方资本主义的“黑色现代化”,推进实现“绿色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武器。以“绿色”标识“科技”是对科技进步的限制和规定,赋予科学技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3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34]这就意味着,绿色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和价值追求具有内在一致性。区别于传统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运用忽视生态保护,只关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绿色科技创新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保护并重,对应对人类生存发展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清洁美丽的人类家园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尤其是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就能源的开发与应用来说,绿色能源的开发应用,是取代传统化石能源,应对生态危机的重要途径。就资源回收利用技术的创新来说,有效的资源回收利用不仅可以减少对原始资源的依赖,还可以降低废弃物对环境的压力。绿色科技为资源回收利用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就污染治理技术的提升来说,焚烧发电、

卫生填埋等技术的应用既减少了垃圾的体积,又实现了能源的回收利用。就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的应用来说,生态监测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生态系统的变化情况,及时发现生态问题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植被恢复、土壤改良等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则可以帮助受损的生态系统恢复生机。此外,依托绿色科技成果运用,能够彻底颠覆传统经济发展“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高投入、低产出、高污染模式,建立“资源—产品—再生产资源”的低投入、低排放、高产出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加快形成“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循环经济增长体系。

(三) 重视城乡融合发展,规避城乡二元分离

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与土地、城市与乡村分离的原因作了详细阐述,指出:“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3]918-919}在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下,一方面,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其衣食住行产生的土地养护成分与土地疏离,无法实现向土地的复归,从而对土地肥力造成永久性的破坏。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排污系统承载力有限,排泄物便以城市污染物的形式存在着,“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3]115}土地肥料的浪费和城市的普遍污染,既是“裂缝”产生的原因又是“裂缝”的现实表征,二者共同指向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口极端分化对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极端浪费。

对此,马克思将消除资本主义的城乡分离状态看作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认为城乡分离并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动终结,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发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

的肥料”^[35]。很显然，这些思考包含着城乡融合的出路是农业和工业的结合、土地自然力的恢复以及城乡人口的均匀分配。因此，统筹城乡发展不能只局限在发展事实的陈述里探讨城乡关系，而是要在系统观念的指导下，运用系统分析法去透视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和运行逻辑，以此实现土地自然力的恢复和城乡较高层次的综合。

（四）自觉抵制虚假需求，树立绿色消费观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需求“总是被异化地再生产出来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6]175}。这种异化的需求关系有三层内涵。首先，消费异化为自我实现的手段。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索取，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物质生产。随着生产的进一步扩大，为避免商品囤积，总是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虚假宣传，使得人们的消费不再仅仅是满足生存和恢复劳动力的需要，而是把消费当作自我实现的手段，即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其次，消费异化的思想根源是消费主义思潮的兴起和传播。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消费行为的发生，往往不是基于其真实的生存生活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虚荣心、追求时尚或者跟风等虚假需要，进行不必要的、超越自身条件和能力的消费。最后，消费异化的社会根源是劳动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不自由关系，表现到消费领域，就是人期望通过消费来补偿在劳动中遭受的乏味、单调，试图在消费中寻找自我确证。异化消费反作用于异化生产，就造成了“裂缝”在更大范围内蔓延。

当前，“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36]越来越重要。绿色消费是指绿色生活观念主导下的绿色产品消费及其他消费行为^[37]，要求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其一，绿色原则。即在消费行为中兼顾自然资源限度和自身需求限度，既充分考虑自然资源的节约集约问题，又充分考虑产品运用的全面性问题。

其二，公平性原则。即消费行为建立在充分尊重其他生物及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基础上，而非仅仅满足自身需要进行掠夺性消费。其三，适度原则，即警惕虚假需求和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反对铺张浪费，使消费行为符合自身生存发展需要，以推动形成节俭环保的绿色消费风尚共识。

结语

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具有丰富的生态意涵，映照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与断裂，揭示了物质变换“裂缝”产生与扩大的根源，指出了生态危机的本质所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深入探讨了弥合物质变换“裂缝”的共治方案，不仅奠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底，而且为我们反思西方黑色现代化的生态困境，共同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和建设清洁美丽的人类共同家园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参考文献：

- [1] 臧立. “物质变换”概念歧见分析[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12(01): 47-52+106.
- [2] 汪晓莺, 郭凯. 马克思“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思想蕴涵及理论价值[J]. 江西社会科学, 2011, 31(11): 52-56.
- [3]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4] 韩立新. 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概念与环境保护思想[J]. 哲学研究, 2002(02): 6-13+79.
- [5] 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3.
- [6] [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M]. 刘仁胜, 肖峰,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7] [日] 斋藤幸平, 刘仁胜, 赵伊琳. 马克思的生态笔记[J]. 鄱阳湖学刊, 2018(03): 34-47+126.
- [8] 郭剑仁.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及其当代意义[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02): 200-205.
- [9] 毕秋. 《资本论》物质变换理论的生态阐释及其时代价值[J]. 山东社会科学, 2024(02): 24-31.

- [10] 蒋彧.《资本论》生态思想的三重挖掘及当代启示[J].当代经济研究,2019(02):68-76.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ANDR GORZ. The division of labour: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 [M]. Sussex:The Harvester Press,1976:165.
-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35.
- [18] 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韩立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69.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 [20]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3.
-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87.
-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3.
- [24] 王妍.论马克思主义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意涵及当代价值[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2,39(02):116-120.
-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21.
-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 [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63.
- [28]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25.
- [29] 习近平.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1-10-13(01).
- [30] 王艳峰,吴晶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J].科学社会主义,2022(03):29-40.
- [31] 张云飞,李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贡献[J].探索,2020(02):5-14.
-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1.
- [33] 沈广明,左勇华.绿色科技的哲学探微——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视域[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7(05):31-37.
- [34] 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
-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21.
- [36]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0.
- [37] 吴波.绿色消费研究评述[J].经济管理,2014,36(11):178-189.

责任编辑:郑梅钦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思想 及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付佳伟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型新质人才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引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了“现实的人”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蕴含着丰富的“现实的人”发展思想。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文本解读, 梳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战略地位、价值指向、发展重要保障和发展基本条件等内容, 有助于充分理解创新人才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增强新时代以人才引领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 新质生产力; “现实的人”; 人才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3-045-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 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1] 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之一, 而新质生产力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是当前生产力发展的科学写照。因此, 构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 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为基础对唯物史观进行追本溯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2], “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2]。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人才, 人才对于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有着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就如何以人才加快形成和

发展新质生产力, 可以从经典著作的文本中找到答案。人才发展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诸多著作中都有阐述, 但是关于人才对社会发展作用阐述最集中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旧哲学的过程中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 他们通过对以费尔巴哈和鲍威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思潮的批判, 逐步摆脱了唯心史观的影响, 明确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了“现实的人”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3], 这为我们从文本角度研究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思路: 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研究”(23JD201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付佳伟,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著作出发研究人才如何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基于此思路,通过系统化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发展思想,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深化人才对社会发展重要作用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准确把握以人才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思想,有利于增强新时代以高素质劳动者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战略地位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对“现实的人”的地位进行了系统地分析,指出了“现实的人”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形成了深刻而丰富的关于“现实的人”的战略地位的论述。这为分析新时代高素质劳动者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地位提供了指导,对于新时代认清高素质劳动者对于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地位给予了重要启迪。

(一)“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因

19世纪的德国哲学界,青年黑格尔派如鲍威尔等人,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精神、观念、意识的自我矛盾运动。他们认为,历史的演进是思想和理念的自我展开与辩证冲突的结果。这种历史观夸大了理念、思想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物质条件和人类实践活动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影响。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误区,将抽象的精神力量视为历史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他们的理论中,历史的演进是由抽象的思想和理念所主导,忽略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对唯心史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认为,历史的真正主体不是抽象的观念或精神,而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生活在具体的物质条件下,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满足自身的

生存和发展需求。正是这种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只有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才能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4]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现实的人”对于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力量,即“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唯物史观指出意识或理念绝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因,而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人类能力的集中体现,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界的互动程度。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人类并非被动地接受自然的馈赠,而是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力,将自然界的原生力量与人类的技术手段相结合,形成多样化的力量作用于劳动对象。这些力量的运用并非自然自发产生的,而是依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实践活动。质言之,只有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这些力量才能真正发挥生产力的作用,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二)高素质劳动者是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了“现实的人”对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要素优化配置以及生产方式的深度变革,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实现生产力的质态跃升。这一过程中,高素质劳动者的作用尤为关键,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他们是创新驱动的第一资源,创新驱动本质上可以说是人才驱动,高素质劳动者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主体力量,他们不仅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更是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通过技术创新和要素组织的双重驱动,新质生产力能够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系统化整合

和高效利用，从而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当今数字化、智能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劳动者不仅需要具备传统的劳动技能，还需要不断适应新技术带来的变革。特别是劳动者对数智化技能的掌握，已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进步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数智化技能不仅包括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还涉及对数字化工具的熟练操作以及在复杂技术环境中的创新思维能力。这些技能的掌握能够显著提升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优化生产流程，并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因此，劳动者的素质提升和技能转型是实现生产力质态跃升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价值指向观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受其时代性限制，没有也不可能对创新人才的价值指向进行阐述。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却处处闪耀着“现实的人”价值指向的光芒，“现实的人”的价值指向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与人的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且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现实的人”以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深入探讨了生产力的本质。他们指出，生产力并非简单地表现为一种独立于个人、与人分离的客观存在，而是与人的生命活动紧密相连。生产力并非仅仅是物质工具的集合，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积极展现，是人类主体力量的体现。这种主体力量不仅包括物质生产的能力，还涵盖了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实践能力。如果剥离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以及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展现的自觉自主的特质，生产力将失去其灵魂与方向，沦为一种机械的、被动的存在。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种

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5]580}这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物质工具的积累，更是人类对自身能力的全面占有和发挥。生产力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结果，它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创造性。正是这种特质的存在，使得生产力成为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推动了物质财富的增长，更推动了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不仅仅表征现有财富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它确证了生产过程中的属人力量。人的本质属性的丰富与生产力的发展是同一过程，生产力前行的方向就是人的发展方向。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发展构成了历史的深层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与生产力发展的本质需求高度一致。因此，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个能够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的人类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更是人类自身发展的核心动力。人类自身生产与发展构成了历史的深层驱动力，是持续追求的主体价值目标。这一目标与生产力发展的本质需求不谋而合。因此，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二）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指向是自由而全面发展

只有具备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技能和素质的人，才能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人们必须通过持续学习，掌握发展新质生产力所必需的知识、技术、能力等，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掌握到越来越多的新知识、新方法、新观念，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不断增强，其知识储备、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得到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得到提高，使其成为创新人才，进而不断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人才引领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更要强调其价值属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质生产力必须服务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因此，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它将为人们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推动社会向更高层次的文明迈进,助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现实。

(三)“现实的人”的生产力在相互关系中以实现

人是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而不是以往哲学中所指出的抽象的、孤立的人。而“现实的人”的生产力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得以实现。“现实的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是“处于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6]。只有在这些社会关系中,人的生产力才能得以发展和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分工与协作。在社会生产中,人们通过分工合作,将各自的能力和技能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的生产力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5]532}人们从事生产力的活动是“作为共同活动方式本身的力量”的存在,是一种团结的群体力量或社会力量。第一,从量的规定性来看,生产活动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人参与。这些个人通过分工合作,借助特定的生产要素并通过合理的配置和组织,才能完成生产任务。这种量的规定性强调了生产力的实现离不开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对这些资源的有效整合。第二,从质的规定性来看,生产力的增长不仅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数量,更取决于多数人共同活动的方式。在分工、协作和管理等组织方式中,正向力量的有效发挥能够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分工使得个人能够专注于特定任务,从而提高技能水平和生产效率;协作则通过整合不同个体的能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而科学的管理则能够进一步提升生产活动的组织性和效率。这

些方式的有机结合,能够使生产力实现多倍增长,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四)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具备伟大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品质、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核心体现。它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实践中,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需要人才群策群力,全体劳动者必须发扬伟大团结精神。在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道路上,需要认清广大高素质劳动者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社会各方力量的合作和联系,实现各方力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保障。同时,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生活在一个“共同体”的人民群众社会关系十分复杂,社会各个阶层需要加强分工合作,努力弥合分歧之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在创新主体上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并通过“国民共进”,凝聚起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磅礴伟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7]。新质生产力对于实现伟大梦想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作为新型举国体制下加快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高素质人才,需要全体劳动者共同发力来加快科技成果研发并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助推中国梦的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离不开各方人才凝聚形成的磅礴伟力。新时代的高素质劳动者在思想上要不断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在行动上要主动践行新方案,发扬伟大的斗争精神,以乐观向上、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态度向着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而不懈奋斗,自觉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发展保障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揭示了只有彻底终结私有制,“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5]574},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改变来真正达到“现实的人”解放。这启示我们建立合理的生产关系是人才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通过对唯物史观的发现指明了变革生产关系的必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本质及其与生产活动的密切关系。他们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之间,一定会发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5]523}这一观点明确指出,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深深植根于人们的生产活动之中。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又进一步衍生出政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理解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本质,就必须从生产活动出发,通过经验性的研究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批判了以往哲学家们对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神秘化和思辨性解释,认为这种脱离实际的思辨方法无法真正揭示社会的本质规律。相反,只有通过对生产活动的具体考察,才能科学地理解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他们进一步指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由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的。当生产方式发生变革时,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反之,先进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对生产方式的变革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必须构建创新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二)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保障人才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可以发现,正确的生产关系对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

深刻地指出,人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个体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活动。生产关系作为一种既定的社会力量,本质上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它不仅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框架,还构成了人的现实生存空间,塑造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关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人的发展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然而,生产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当现有的生产关系逐渐成为制约人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桎梏时,变革生产关系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种变革并非简单的调整,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能够打破旧的束缚,为人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开辟新的道路。在生产关系的变迁过程中,人的社会关系也会随之不断演进,变得更加完善、丰富和多元。这种动态的演变过程,不仅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高素质人才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他们不仅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还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高素质人才通过创新思维 and 实践能力,不断推动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然而,要充分发挥高素质人才的作用,就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应当能够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保障人才的合法权益,促进人才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才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8]因此,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是人才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引领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第一,必须强化法制的保障功能。通过强制性法律手段,为人才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基本依据,用法律手段维护人们权益,为创新型人才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第二,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保护知识产

权在推动人才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保护知识产权不仅可以发现、保护和激励人才,还可以激发创新、引领创新、保障创新。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是至关重要的。第三,新质生产力人才发展是一个多维的、动态的、复杂的过程,要破除人才发展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打破人才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堵点、痛点和卡点,为人才发展保驾护航。全社会要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以生产关系变革作为人才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四、《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发展条件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人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它的前提是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而人的需求和创造力则是推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需求不断推动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人类的创造力则为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无限可能。正是这种需求与创造力的结合,推动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因此,必须为“现实的人”发展创造基本条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人的主体性和创新能力的全面释放。因此,必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人的需求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激发人的创造力和主动性。

(一) 完善对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的激励机制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科技创新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联系。在现代社会,保护知识产权是激励科技人员发明创造的基础,也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只有让科技创新主体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和待遇,才能充分激发其创新活力,进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我国通过不断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法律体系、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等措施,为科技人员提供了良好的创新环境。

企业家在科技创新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不仅是科技成果的转化者,更是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和引领者。企业家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够发现新发明、新技术的产业化前景,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善待企业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这不仅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需要优化政策支持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同时,要构建协同创新生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强大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二) 完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劳动者的素质提升和新质化至关重要。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崛起需要具备科学文化素养和操作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不仅要熟练掌握数字技术,还要具备人机协同能力、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为了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必须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教育系统应通过数字化转型,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培养适应数字时代的人才。同时,用人单位应不拘一格选人才,根据未来发展战略形成新的评价体系,拓宽不同层次人才的引进渠道。

(三) 鼓励劳动者提升自身能力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在于知识与能力的快速更新,这种动态变化要求劳动者不断提升自身的自主学习能力,必须能够充分利用现代技术,适应高端设备,并具备快速迭代知识的能力。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劳动者需要树立以个体能力提升为核心的理念,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且系统的工程。劳动者只

有不断更新思想观念，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应对工作挑战，把握工作机遇。

结语

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现实的人”对发展生产力作用的思想，有助于理解高素质劳动者对于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梳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思想，有助于掌握用人才引领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人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在发展自由自觉个性的动力驱动下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要以高素质劳动者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来实现高质量发展，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宝库出发，明晰人才始终置于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地位，让高素质劳动者能够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向前发展提供实践动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 2024 (11): 4-8.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6 (01).
- [3] 习近平.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J]. 求是, 2021 (11): 4-17.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6-77.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3.
- [7]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63.
- [8] 权衡, 吴敬琏, 刘培林, 等.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经济改革再出发[J]. 探索与争鸣, 2024 (03): 4+177.
- [9]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18.

责任编辑：丁春华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点思考

陈丽华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100)

摘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 在“七个聚焦”改革框架中,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首要目标任务, 并且明确了改革时间节点要求, 凸显了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制度创新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此背景下, 有必要系统阐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内涵,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 深入解析“放得活”与“管得住”的辩证关系, 着力实现市场活力激发与风险防控机制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放得活; 管得住

中图分类号: F1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3-052-06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并将其列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七个聚焦”之首, 凸显了在新时代新征程这一改革目标任务的重大意义和牵引地位。为此, 必须全面深刻理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内涵、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厘清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实质要义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促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 实现“放得活”和“管得住”的有机统一。

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阐释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了“一个基础、五大支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 一个基础是指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五大支柱包括现代企业制

度、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表明, 我们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完成了建立基本框架的任务, 在新时代背景下, 要在更高起点、更高目标、更高层次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内涵。市场经济理论相关原理认为, 具有“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五大特征的体制, 可称为成熟的或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

2.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涵。首先是能够“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竞争环境, 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1]。其次是能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维护市场秩序, 弥补市场失灵, 畅

作者简介: 陈丽华,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经济教研部主任、教授, 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也就是说，“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3.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运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调配合的方法路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根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坚持党的领导，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公平正义，增进全社会福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4. 更加系统完备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系统完备是指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把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整合成有机的整体，使各项政策相得益彰，发挥出联动效应并提升整体效能。聚焦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点要关注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全国统一大市场及其相关经济制度的系统集成和有机衔接，同时要关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之间的关联。此外，还要处理好制度创新、制度运行和制度保障三者的关系，提高制度供给质量，加快改革举措落地见效。由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展为更广义的内涵。

5. 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要达到更加成熟定型，首先必须在建构制度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于实践中不断对其进行优化和完善，然后才能逐步走向成熟定型。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各组成部分都达到了高水平，如拥有高素质的市场主体、高标准的市场体系、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以及健全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等，才能建成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未来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将被消灭，全部的生

产分配由社会有计划地统一进行。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与苏联类似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使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新中国迅速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国民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发展。但从较长时期看，这种经济体制存在管理体制僵化、未能充分调动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经济效率不高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等弊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并取得历史性突破，从打破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如今进一步明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历经了40多年发展进程。

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指出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完善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随后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和目标，即“最终构建起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中再次明确要“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的战略性部署,明确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不仅部署了各项改革目标内容,而且设置了时间节点要求,即“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并把“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现时间设定到二〇三五年。时间表和路线图的整体擘画,深刻彰显了必须抓紧抓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项关键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本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遵循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标准,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创新精神,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伟大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确立至今经过30多年的持续探索,其理论逻辑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适,实质是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路径。这个世界性的理论和实践难题,苏联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试图破解,但均以失败告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伟大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创新取得了若干重大突破:一是在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的设想进行了创新。二是解除了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三是超越了苏联东欧学者曾经将社会主义与商品和市场进行简单嫁接的尝试。四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西方学者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天然相对立的论断。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论,

还是属于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他们都认为私有制最具优越性并天然与市场经济相容,其本质都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市场经济运行进行辩护和维护。五是对西方形形色色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突破。相关思潮反思甚至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主张借助市场功能来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但或不赞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相应的分配制度,或找不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有效途径。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市场经济的新形态,既要发挥市场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优势,又要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固有的基本矛盾造成经济危机周期爆发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严重弊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演变,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富有独创性的理论。”^[2]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所有制结构演变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关键性制度根基。公有制为主体,确保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稳步前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激发了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形成了不同所有制多元主体之间的竞争,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生成。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所有制状况决定了社会产品的分配形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分配制度兼顾了公平和效率,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了基本制度基础。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公有制为主体相适应,否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对劳动者的剥削制度;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与多种所

有制经济相适应,不仅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使各种生产要素贡献在市场分配中得以充分展现。

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逻辑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微观基础是拥有市场化和多元化的微观经济主体,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则成为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因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进程中,伴随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演进的是包括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市场体系建设、政府职能转变等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举措不断深化。

1.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从未间断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改革的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并把改革国有企业作为中心环节,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国企改革都被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企改革进程历经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放权让利、80年代的承包制到90年代开始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诸如股份制改革、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和成立国资委、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党的十八大之后国企改革进入深化改革时期,主要包括进一步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分类改革、布局优化、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等。在2016年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提“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体系,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深化结合的又一次理论与实践创新。

现代企业制度最基本特征就是产权明晰和权责明确,现代企业在产权制度变革上包括明确企业法人财产权或称企业所有权、界定出资者所有权也可称为终极所有权,这充实和发展了早期的两权分离理论。其在国企改革实践中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一是政府行政管理权和国家所有权的分离,即政资分离;二是对国家所有权实行分割,国家保留终极所有权,企业获得法人财产权,即政企分离;

三是在企业层面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体现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不断优化。因而,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不仅仅需要企业微观层面的产权改革,还需要国家政府宏观层面上的政资分离、政企分开和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优化。

2. 个体、民营、外资等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党的十三大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必要性,并将其表述为“公有制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十五大明确了民营经济从“补充地位”向“重要组成部分”转变。进入新时代后民营经济的角色进一步升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的:“民营经济……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

同时,开放型经济不断向纵深推进。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发展外向型经济转变为发展开放型经济,推进对外贸易体制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化,吸引更多的外商来华投资办企,也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要素双向流动,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优配置,要求我国建立与国际市场相适应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融合。

3. 市场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和政府职能作用不断优化,积极探求市场和政府的合理边界和定位。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载体,我国推进市场体系建设的历程有三个重要的节点:一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重点是培育发展要素市场;二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强调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推动市场公平竞争;三是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于2021年和2022年制定《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与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相联系。

市场配置资源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转变，相应地要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为规范，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以及对市场和企业的过度干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4]由此可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这一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科学定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提供了破解经济学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方案，而且为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基本思路。

五、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进一步思考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高度概括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涵和本质要求，是对如何处理好市场和政府关系的精要提炼。

“放得活”的主旨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供求、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调节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和市场行为，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放得活”意味着政府要放手但不完全放任，放手是要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让微观经济主体自由竞争、自主经营、自由贸易，让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当然市场能够有效发挥配置资源作用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要有健全的市场体系，完备的要素市场制度规则和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如果让市场体系自主发育，那么时间会很漫长，而且市场自身也不会自然生成制度和规则，如产权界定和保护相关制度规则的制

定和实施就需要积极发挥政府作用，属于政府核心职责之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程表明，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将出现垄断和各种破坏市场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资本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显示了其过于逐利的恶劣一面，并且其他各种市场失灵问题也纷纷呈现。因此，“放得活”离不开政府的适度作为，若仅仅借助市场机制，那么市场经济运行并不能完全顺畅，因而需要政府介入弥补市场失灵，完成市场做不了也做不好的事情。

“管得住”，就是要更好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把市场失灵的领域管住管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有效运行。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分析，市场失灵分为微观经济运行失灵和宏观经济运行失衡，前者包括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供给失灵、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分配不公平以及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等等，后者宏观失衡包括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经济衰退萧条、经济停滞和通胀并存的滞胀问题。相应地，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就分为微观规制和宏观治理。再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分析，初级阶段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基本国情，使赶超和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为硬道理，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特有的强大政府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如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体系建构、绿色智能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富裕实现等都离不开政府积极有为的推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5]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无论在市场经济理论层面还是各国市场经济运行实践中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存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发达市场经济体也存在诸如英美模式、北欧模式、德日模式等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之分，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就是政

府与市场各自发挥作用的强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存在区别。这表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是固化的、静态的，而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随着内外环境变化而动态变化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多与少、干预什么、如何干预，其特定形式和具体内容即便在同一国家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期情况也会不完全一致，进而产生不同的干预结果、差异化的经济绩效。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40 多年的奇迹来自改革开放，也归功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释放了市场潜力，激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极为智慧地采取了适合国情的渐进式路径，逐步有序培育和不断完善国内市场并融入世界市场，完成了从 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辅助作用”，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组合的转型。如今踏步进入新时代新征程，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结构、规模都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动态边

界，保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要管得好。要以各级政府的勇于担当、有为、善于作为，激发全社会创新动力和活力，做到既全面推进也要重点突破，既要对标对表先进也要突出地域特色，在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产业新优势上闯出新路。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01).
- [2] 顾海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辉煌与思想精粹[J]. 社会科学战线, 2021(03):1-16.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5.
- [4] 习近平.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 求是，2020（16）：4-9.
- [5]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7-1-23(01).

责任编辑：陈琴容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 实践逻辑、困境与推进路径

——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

林晶晶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014)

摘要: 数字技术通过打破主体协同壁垒、优化主体结构以及拓展应用场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有效激活社会治理共同体活力,推动多元主体共建共治的协同转型。然而,随着赋能的深入,数字技术所呈现的阶段困境也在制约着共治效能。推进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赋能,需要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探索构建包容、公平、可持续的数字化共治生态;积极扩大主体数字化协同的职责权限,不断提升主体协同共治的能力与效率;不断完善能够提供社会治理共同体结构性基础和保障性约束的制度供给,推动共治效能的最大化。

关键词: 数字技术; 社会治理共同体; 数字赋能; 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 F49;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3-058-08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社会正加速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的作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治理手段、治理工具,更是形塑社会治理主体架构、推进多元主体耦合的有效媒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层面先后提出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明确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主体构成与职责要求,把“科技支撑”作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找准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

共同体的契合点,成为当前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命题。

作为“共同体”的最早阐述者,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阐述共同体时指出,共同体的本质是“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1]。随后,国外学者对治理共同体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如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共同体在社会发展和现代性过程中是基于内部“有机团结”的形式而存在的;法国学者阿尔坎塔拉提出治理是由各个利益群体在共同协商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共同计划、共同安排治理事务的过程。^[2]在技术对治

基金项目: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2023年度研究项目;福州市党校系统2023年度项目。

作者简介: 林晶晶,中共福州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社会治理。

理主体的影响方面,国外学者主要依据数字技术的发展逻辑,分析了数字技术对政府行政方式转变、社会治理模式改革、治理中心下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相比之下,国内“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的时间尚短,相关的研究还不多。目前,国内围绕“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价值旨归、建构逻辑、实践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价值意蕴,国内学者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社会治理的主体目标和重要内容,主要是指多元主体“基于互动协商、权责对等的原则,基于解决社会问题、回应治理需求的共同目标,自觉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且关系稳定的群体”^[1]。有学者指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对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社会治理共同体”并不是“社会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组合,其中的共同体不仅仅是治理的主体、还是治理客体。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治理本身已经包含了合作和共识两个基本元素,蕴含了形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2]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与运行机制,现有研究从参与渠道、价值导向、技术支撑、机制优化等方面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有学者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键在于处理好社会共治与自治的关系,打造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平等协商的渠道和平台。^[3]实现体制机制的保障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有学者因此提出了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如探索“个人与共同体激励相容的实现机制”,激励公众积极有效融入社会治理共同体中。^[4]关于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目前国内对数字技术与治理效能的解释大多是单向的,即重点放在数字技术的赋能、赋权功能上。大多学者对数字技术赋能效应保持乐观,有学者从渠道疏解、主体扩充、关系重构、观念扭转、效能提升等方面阐述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的助力作用;有学者从数字赋能主体共建、路径共治、成

果共享视角出发,提出健全有效参与主体格局、完善协同机制、推动数据双向流动共享、构建靶向治理模式等具体赋能表现。^[5]部分学者指出,技术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受到总体规划不足、专业人才匮乏、发展机制滞后、资源整合不力等因素影响。

综上,国内学者对治理共同体、技术对治理影响的关注相对西方而言较晚,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研究更多集中于理论内涵与意义阐述,对现实语境下社会治理正处于数字技术时代的实践背景与发展趋势关注不足,对“如何建设”的关键命题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聚焦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高效协同的核心命题,探讨其赋能实践的逻辑、困境与进路,以期构建更趋合作式、融合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更多的研究视角。

二、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

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赋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数字技术作为塑造、培育、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外部强化”的重要变量,通过现代化信息手段的应用,实现信息资源、组织结构和治理要素高度融合,在提供更为广阔的共治平台、更具包容的社会环境以及更加开放的共治视野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6]赋能初期,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主体交互中发挥技术工具的作用,随着技术工具应用的不断深入,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治理在主体环境、应用场景方面有了更多的探索。从主体交互的技术工具到主体生态环境重构或治理场景拓展,构成了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有效实践图景。

福建省福州市作为“数字中国”的重要实践地和发源地,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城市”“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过程中,形成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有益探索。因此,本文选取福州市部分代表性案例(见表1)为对象,分析当前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

表 1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福州探索

代表性案例	数字技术作用方式	赋能体现	赋能成效
“e 福州”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	• 整合社保、公积金、医保、交通违章处理等 2000 多项政务服务，实现“一网通办” • 借助区块链技术保障数据安全	• 打破部门数据壁垒	• 行政效率大幅提升 • 日均服务超 30 万人次 • 获评“中国信息化（数字政府）示范实践奖”
	• 依托“鼓楼智脑”平台，整合 12345 热线、网格巡查、物联感知设备等多源数据 • 提供便民服务、信息发布、社区活动等功能 • 居民通过 APP 上报问题（如占道经营、设施损坏） • AI 智能分派至责任部门，限时处理并反馈 • 超时未办结事项启动“一线呼叫” • 区级领导直接督办	• 打破治理层级、部门限制 • 整合社区资源，提升居民参与度，增强了社区凝聚力	• 问题办结率超 98% • 获评“中国城市治理创新优秀案例奖”
水系智慧调度系统	• 通过布设数千个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水位、水质、管网流量 • 结合气象数据，AI 模型预测内涝风险 • 无人机+AR 技术辅助河道巡检	• 推动水利、城管、气象等部门协同联动，实现“监测-预警-处置-复盘”治理闭环	• 城区排水防涝应急处置效率提高 50%，库河调蓄效益提高 30% • 2017 年来，经受 20 多个台风和 300 多场短历时强降雨考验
台江区“智慧养老”	• 企业利用物联网和智能设备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监测、异常情况自动告警、紧急呼叫等服务 • 社区通过智慧养老平台实时掌握老人健康状况，及时提供帮助 • “长者食堂”人脸识别系统自动扣费，支持子女远程充值	• 实现社区、企业、居民三方合作	• 覆盖范围逐步扩大 • 服务超 10 万老年人

（一）交互破壁：从打破主体协同壁垒切入提升共治效能

传统的功能性政府主张分权治理，导致治理主体之间出现信息孤岛、职能分化、各自为政、沟通不畅、协调低效、行动者自利等问题，进而导致治理对象和治理内容覆盖的碎片化。数字技术在数据共享、业务联动、流程再造等方面的优势，不仅为部门、层级间的信息共享与交互提供技术支撑，也

为解决由跨主体、跨部门、跨层级、跨系统、跨领域乃至跨地域的治理趋势所产生的“治理内耗”与“中间梗阻”等问题提供了可能。在行政层级上，数字技术的引入，打破以往层级、部门条块分割的局面，重塑共治机制。如福州市打造的“e 福州”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打破了部门数据壁垒，驱动社保、公积金、医保、交通违章处理等多层级、多部门政务服务项目的整合，实现“一网通办”。同

时,数字技术破解行政部门与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民等多主体间的交互壁垒。数字平台、智慧系统等技术渠道的应用,推动多元主体构建以技术为支撑的信息沟通、反馈和综合协同机制。如福州市鼓楼区依托“鼓楼智脑”平台,通过整合12345热线、网格巡查、物联感知设备等多源数据,形成了基层共治“一线处置”机制——居民问题“自下而上”反馈,社区直接联动区直、市直部门协同处置。这种交互破壁的方式,改变多元主体共治机制,有效提升多主体协同效率。

(二)结构优化:从工具应用切入推动形成多元共治格局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也是形塑主体结构的过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和应用的快速发展打破传统治理主体结构中心化的治理局面,进一步呼应并强化“治理”本身所包含的民主、协商、多元、开放等特性。作为工具与纽带,数字技术链接着治理场域中的多元参与主体,推动治理主体边界趋于向外兼容,在扩大治理主体覆盖范围、有效降低治理主体参与成本、强化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等方面发挥显著优势。一方面,数字技术所具备的跨越层级、组织边界以及地理边界的链接功能,掌握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治理策略、要素储备等方面的差异,拓宽了多元主体参与渠道与方式。当前数字化治理平台、网络问政、虚拟社区自治、积分制公民行为数据整合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就是实现“政府搭台—社会唱戏”“居民点单—政府办事”多类型互动和协作共治模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打破传统社会治理领域界限,推动多元主体向技术支持的横向网络发展,以新的弹性机制和共享机制促进包括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志愿者、居民个人在内的各类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如福州市鼓楼区“一线处置”机制,其赋能机理不仅仅在于打破交互壁垒,还在于通过数字平台实现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社区志愿者、社区公

益资源“五社联动”,以低成本和即时性重新聚合脱嵌主体,组织形成覆盖更加全面、组织架构更为完善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关系网络”。

(三)场景拓展:从应用场景切入带动共建共治模式变革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各类应用与虚拟性治理平台在推动社会治理场景融合与转化中的作用,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实践空间。当前,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聚焦民生服务、应急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层治理等具体应用场景,实现特定场景资源整合以及内外信息、资源、组织的协同,从而快速凝聚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力量,建立涵盖多主体、多层级、多职能部门的智能化响应与联动机制。如福州市选择高频、痛点明确的应用场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形成共建共治的协作范式。为提升城市防洪抗涝能力,福州市打造水系智慧调度系统,通过布设数千个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水位、水质、管网流量,推动水利、城管、气象等部门协同联动,实现“监测—预警—处置—复盘”治理闭环。在探索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中,福州市台江区探索“智慧养老”,借助物联网与智能设备实时监测老人健康数据,联动社区服务中心、医疗机构和家属,构建“需求发现—服务匹配—紧急救援”闭环。在这一过程中,社区提供平台支持,企业开发智能设备,居民参与服务反馈,形成“政府+企业+家庭”协同供给模式。此外,福州市“智慧城市”建设中,在交通、生态、应急等不同应用场景中也实现了数字技术应用下多元主体在专业领域、分析能力和技术开发等方面密切配合,带动了共治模式的变革。

三、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困境

从数字技术赋能的实践逻辑看,数字技术通过打破主体协同壁垒、优化主体结构以及拓展应用场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有效激活社会治理共同体活力,推动多元主体共建共治的协同转型。然而,

随着赋能的深入，数字技术所呈现的阶段困境也在制约着共治效能。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困境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数字技术作为工具手段对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效性，然而，数字技术应用不仅仅具有工具理性，还应当关注到其价值理性，即数字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行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从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实践可以看出，当前数字技术工具理性得到充分挖掘，对治理效能的提升作用显著。但在这一过程出现了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数字技术赋能陷入“效率至上”的技术乌托邦陷阱，忽视了治理本身所蕴含的公平、参与、透明、责任、可持续性多元价值，导致治理目标的单一化。具体而言，一方面，过度强调工具理性可能导致技术应用的异化。如在一些数字化治理场景中，出现了平台重复建设，盲目追求“技术亮点”，导致共治平台冗余与资源浪费；部分主体通过技术优势主导治理平台建设，可能出现“技术的权力化”问题，表现为在治理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挤压小微社会组织参与空间，削弱治理公共性。另一方面，过度依赖数字技术也可能忽视社会治理中的人文关怀和公平性，加剧治理的不平等和歧视现象。如民生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场景中，智能算法的应用可能存在偏见和歧视性决策，导致治理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城乡、区域之间技术应用不均衡，数字基建与能力差异加剧“数字鸿沟”，削弱共同体包容性；基层治理过度依赖“线上反馈”，导致老年人和数字弱势群体可能因技术障碍而被边缘化，加剧“治理悬浮”现象等。

（二）多元共治协同性困境

协同是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性价值追求。狄德罗曾指出，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将“共同协作”作为技术实现的价值旨归。尽管数字技术打

破了主体之间的交互壁垒，但多元主体共治的协同性困境依然存在。在共治结构与形式方面，一方面，社会组织和公众在数字技术赋能治理过程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不足，部分线上平台使用率低，居民线上参与以问题反馈为主，缺乏深度协商与决策权。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的场景应用形成了定向群体参与倾向。如当前以养老托育为主的数字化应用设计，使得青年群体因缺乏吸引力难以融入共治体系。在共治主体权责界定方面，多元主体协同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角色定位不清，政府主导惯性导致数字赋能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市场与社会主体的“被动参与”，协同效能弱化。具体数字化应用场景中，共治的权责分配模糊，如智慧养老项目依赖政企合作，但利益分配机制尚未成熟；即便是行政部门，同样存在权责界定制约共治效能问题——虽然通过“一网统管”平台实现了跨部门协同，但在实际操作中，部门之间的权责划分不清晰，协同治理的效能受到限制。在共治能力方面，基层兼具技术能力与治理经验的专业人才短缺，制约治理创新；数字素养断层，如老年群体、基层工作者等部分主体技术适应能力不足，加剧“参与排斥”。

（三）制度建设滞后性困境

数字技术在赋能的同时，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互动协同的相关制度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简·芳汀所认为，“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会导致理想的制度变迁”^[8]，数字技术在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对传统的主体结构、职定位能、参与形式以及共治模式产生冲击与挑战，对修正固有治理制度缺陷提出探索诉求。当前，由于我国技术与治理融合尚处于探索阶段，对数字技术赋能的推进更多的是行政层面的规划，技术运用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撑，成为制约赋能效能的重要因素。现行的数字技术应用相关的法规和条例，绝大多数缺乏技术治理理念和要求的融合。数据共享与协同机制不足，层级、部门间数据整合难度大，数据孤岛仍存；

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的制度缺乏统一标准,在提升共治效能的同时也附着诸如信息安全、隐私保护等威胁和挑战;数字技术的应用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和伦理规范;技术应用的标准与评价体系尚未完善,治理过程中出现技术滥用的风险。

四、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推进路径

构建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当前数字技术赋能增效的结合是时代大势所趋。数字技术的赋能给社会治理共同体效能提升带来了更多可能,同时也对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进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赋能,需要积极探索其实践进路。

(一) 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坚持“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在充分挖掘数字技术工具属性所带来的高效能的基础上,探索构建包容、公平、可持续的数字化共治生态。首先,注重培育公共精神与行动共识,加强数字技术赋能的公共性。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对“共同体”概念的诠释揭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性质与特征,即拥有共同的理解、利益与集体需求的关系集合体。因此,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同样需要遵循社会主体生存和发展权利与责任相适应、相对等原则,关注多元主体在治理方面的差异化需求与个体利益,推动各主体多元利益的表达和谈判协商,合理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在维护主体权益的基础上挖掘社会治理共同体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整合共同体内部意愿,形成代表各治理主体的治理性价值偏好,构建利益共同体。发挥数字技术引导价值回归社会属性,在整合和协调利益差异的过程中,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公共精神的培育与共同价值的塑造^[9],进而凝聚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行动共识,实现社会治理的权益共享和价值共创。如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出现的运用线上议事厅推动解决社区改造矛盾,其行为本质是借助数字平台促进居民协商共治,在兼顾居民、社区居委会、物业、改造企

业等多方利益诉求的同时强化社区归属感。其次,推进数字技术包容性考量与设计,加强数字技术赋能的公平性。数字技术的应用注重普适性与包容性。当前部分地区通过设置“数字辅导员”“便民辅导员”帮助老年群体使用智能终端等阶段性、过渡性的措施。考虑到其人力投入成本,适当保留线下服务渠道,加强适老化、无障碍数字应用的考量和设计才是长远之策。加强技术应用包容性、普适性考量,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和使用习惯,支持个性化与可适应性,如优化无障碍功能、简化交互、多语言(方言)支持等设计。探索“技术道德化”嵌入公平性设计,推动算法透明化与可解释性。如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了避免司法大数据可能因历史案件偏差影响风险评估,通过“司法数字体检”加权计算,避免数据偏见。此外,还要加强对数字技术赋能过程中的伦理审查和监管力度,确保技术赋能的公平与可持续。

(二) 推进赋能—赋权协同优化

构建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既是对构建包容互补的主体结构的要求,也是对主体能力的要求。数字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既需要积极扩大主体协同共治的职责权限,也需要不断提升主体协同共治的能力与效率。首先,加强数字技术赋能语境下多元主体的培育。正视技术更迭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技术素养的要求,加快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等治理主体数字素养与数字能力建设,鼓励多元治理主体加快技术治理的认知和技术结构的更新,弥合多元主体协同的数字鸿沟。构建完善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基础设施,提升数字技术管理和应用能力。加强数字化人才储备与专业队伍建设,组建、培养满足基层技术开发、管理和应用的复合型人才,提升公众信息素质与技术应用技能。其次,优化数字技术赋能语境下多元主体参与结构。探索多元主体参与激励、示范带动和整合延伸的有效形式,在跨领域、跨层级、跨区域治理单元内孕育基

于行动交换、数据开放、信息共享、价值共创的多方互动共同体。探索主体参与程序、形式和路径的数字化,依托数字化传播与互联网等媒介全面拓展多样化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推动构建更加扁平化的社会治理主体结构。发挥数字技术跨地域主体的辐射带动作用,加速信息、资本、人才等主体资源跨域的辐射流通,推进跨域协同治理。推进以技术为基础的各类应用对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主体的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参与度,增强多元主体在数字技术赋能治理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最后,健全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职责体系。重视数字技术赋能治理场景融合与转化过程中的相关治理主体权责身份变革和角色转化,进一步明确多元主体的职责权限和行动边界。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去中心化”联通,强化各职能主体的责任意识,消解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间权责边界模糊、回应性不足导致行动的分散无序。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协同协作的权责共担机制,探索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实时场景转换与时空压缩下,共识性权责关系有效界定的数字化、科学化,进而实现不同主体间规范有序的联系和互动,推动治理模式从“数字管控”向“数字共生”转型。

(三) 加快技术—制度适配性调整

合理的制度为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规范性建设、方向性指导与合法性保障。“制度以认知上、文化上、规范上以及社会结构上的内嵌等形式进入技术执行框架”^{[8]86},动态良性的制度性政策法规可以扩大数字技术赋能的空间,成为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行为规范和秩序塑造的关键。完善多主体数字化协同协作制度,重视协同协作制度规范建设,依托能够提供社会治理共同体结构性基础和保障性约束的制度供给,推动共治效能的最大化。一方面,明确集体行动的制度规则,建立多元主体深度参与的开放、互动的数字治理法律与制度生态系统。构建多链融合、高效共享和有序

开放的数据资源体系,提升数据资源整合、开放和共享水平。打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数据壁垒,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治理共享标准,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系统、跨业务的数据开放与共享。打造开放、共享、兼容的社会治理数字资源平台,推动信息纵向的联通与横向的共享,明确数据在跨部门、跨层级流转中的权责关系。完善多元治理主体的共治范式,通过准入机制、程序规则、信用机制、激励机制、信息保护、退出机制等强化社会治理共同体协同协作行为的规范性监管,从而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厘清公共信息的边界,提高公共数据收集的准确性、数据应用和共享范围的确定性,通过规范数据采集标准、设置政府公共数据准入壁垒、建立数据交易机制等途径,对社会治理共治全流程、多环节可能出现的数据资源体系的安全和开放、数据采集和运用行为,进行常态化、制度化监管。另一方面,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对数字技术应用的风险防控、责任追究和隐私保护等制度规范。通过各项法规制度和标准化规范,有效防范和规制社会治理共同体协同协作行为风险^[10]。加强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法律保障和伦理规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全流程技术管理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数据产权、数据交易、数据隐私、网络安全、技术伦理、资源归属等法律法规。推进跨地域机制衔接和标准互认,建立技术滥用的责任追究机制,推动多元治理主体依法有序开展合作。

结语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在推动治理结构优化、共治效能提升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赋能作用不可或缺。就此而言,走数字化发展道路是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然选择,对构建数字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新模式、加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而数字技术应用和发展的未知性也决定了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与赋能其他领域一样,兼

具作用优势和局限。因此，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任重道远，需要政府、学界乃至行动者在客观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克服数字技术赋能局限，持续探索赋能效果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 [1]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43.
- [2] 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 黄语生, 译. “治理”概念的运用与滥用[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1999(01):105-113.
- [3] 郁建兴. 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建设路径[J]. 公共管理评论, 2019(03):59-65.
- [4] 公维友, 刘云. 当代中国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理路探析[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3):52-59.
- [5] 郁建兴, 任杰. 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实现机制 [J]. 政治学研究, 2020(01):45-56+125-126.
- [6] 耿骞, 胡海波. 数字治理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02-08(07).
- [7] 翟月荧. 数字场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建构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河南社会科学, 2023, 31(09):79-85.
- [8] 简·芳汀. 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M]. 邵国松,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9] 曹海林. 数字技术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探究[J]. 中州学刊, 2024(03):74-81.
- [10] 关爽. 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1(04):153-161.

责任编辑：魏璐珂

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筑牢乡村振兴坚强战斗堡垒

——南平市开展农村“党建体检”的探索实践

潘 婷

(中共南平市委党校, 福建 南平 353006)

摘要: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开展工作的中坚力量。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时代命题,系统回答了如何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各项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作出新部署,要求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党建体检”作为南平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有效地促进了闽北广大农村地区党组织的强化、产业的壮大以及人气的提升,显著地改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面貌。

关键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南平;党建体检

中图分类号: D262.2;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3-066-08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管党治党,重在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地基固则大厦坚,地基松则大厦倾。”^[2]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深化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规律性认识,探索以科学理论推动实践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南平市成功探索“‘党建体检’+精准选派+能力提升+资源下沉”这一农村党建工作新模式,使南平市农村基层党组织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 内涵阐释与南平实践困境

(一)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 相关内涵

新时代,中国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不仅具有作为一个组织和政党的基本特性,还具备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及中国复杂农情赋予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正式提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一词,要求在新时代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内涵,应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视域下把握,即为实现农村工作目标,完成其承担的职责任务而进行结构优化、不断完善制度、加强自身建设、发挥自

作者简介:潘婷,中共南平市委党校中共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身优势、有效整合资源、团结动员群众、促进基层治理、推动农村社会发展所具备的能力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2月2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抓住乡村组织体系这个关键，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等方面的战斗堡垒作用。”^[3]这为深入剖析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组成部分打下了理论基础。据此，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这项合力的构成，具体包括了政治领导力、乡村治理力、群众凝聚力和发展推动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以上多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组织力，农村基层党组织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使命，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二）南平市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面临的问题

南平市在农村产业方面，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优势不够明显。部分偏远山村的林地、耕地、房屋等资源因缺乏有效利用而抛荒闲置。在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方面，2021年村级换届选举，班子成员任期由3年改为5年、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首次实现全面“一肩挑”。换届后部分乡村干部存在工作思路不清晰、发展方向不明确的现象。部分村级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农村“空心化”问题愈发突出。在群众参与方面，部分群众对村级事务的关心度与参与度有所降低，未有效发挥群众主体作用，部分干部在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缺乏群众基础，难以激发群众对发展的共鸣与参与热情，进而形成了“干部在努力推进，群众却置身事外”的局面，最终制约了乡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承接政策方面，上级近年来持续在乡村振兴领域提供了丰富的扶持项目，但由于部分基层干部能力水平不足，缺乏行之

有效的思路与策略，致使诸多工作难以真正落地见效。如中央、省、市层面出台的一系列涉农惠农政策，在传导至基层时遭遇梗阻，导致大量政策资金仅停留于文件层面与基础性工作之中，未能精准惠及广大农民群众。

针对这些问题，南平市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立足本地实际，从市级层面加强制度设计，探索“‘党建体检’+精准选派+能力提升+资源下沉”的农村党建工作新模式，找到破解问题的办法。该模式已在闽北广大农村取得积极成效，成为提升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

二、南平市开展农村基层“党建体检”的做法及成效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这一认识方法的指导下，南平市创新开展以党建、城市、产业、生态、安全为主题的“五大‘体检’”，其中居于首要地位的“党建体检”是南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顾名思义，“党建体检”就是运用医学“体检”理念方法，对农村情况进行一次全面透视，看农村基层“身体好不好、各个器官运转得怎么样”，再对症下药。南平以“党建体检”这一形式，对农村进行系统全面的“体检”式调研，全面分析村“两委”班子运行情况，摸清各村相对优势和农村党建存在的短板弱项，理清发展思路，提升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质效。

（一）“党建体检”的做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讲究的就是一个“实”字，农村工作干部要真正深入群众，真心依靠群众，真情关爱群众，真诚服务群众。南平坚持把“实”字贯穿始终，扎实开展“党建体检”。体检过程主要是系统谋划、把脉问诊、对症下药三个部分。

1. 系统谋划，联动体检。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维方法，在这一思维方法的指导下，南平市“党建体检”坚持做到“五个突出”。

一是突出制度建设。聚焦常态长效、有用有效，在地市层面出台了《常态化开展党建体检的指导意见》，对县级、乡级开展“党建体检”的方法步骤、操作流程提出具体要求，要求各县（市、区）在村级党组织换届前和届中分别集中开展1次、各乡镇（街道）每年开展1次农村“党建体检”，还明确了“体检”的责任、项目和主体等等，形成“体检”的规范和标准。

二是突出氛围营造。2023年4—6月，南平市集中3个月时间，开展了“千村大体检”，对全市1636个村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式调研，基本摸清了乡村基本情况，在全市范围内形成重视基层工作和调研活动的浓厚氛围。2024年4月以来，继续聚焦上年度发现的重难点问题，开展了新一轮精准有效的“党建体检”，全市上下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底子更清、责任更实、氛围更浓。

三是突出四级联动。统筹市、县、乡、村四级力量，按照“市督导、县组织、乡体检、村参与”的工作要求，市级组建督导组，负责督促指导；县级组建综合组，负责统筹开展；乡级成立调研组，作为此次“体检”的主要力量，负责组建队伍跨镇域开展“体检”，队伍人员包括了挂村领导、包村干部、基层党群工作者等等。村一级则主要负责组织动员党员群众积极参与。

四是突出乡村主体。乡镇（街道）党委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沿作战部”，在筹划“党建体检”工作之初，明确乡镇（街道）为此次“党建体检”的核心主体，并确定由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担任乡级调研组的组长。将责任压力传导至

乡镇书记，确保乡镇书记对这项工作有深入的理解，使整个班子有效运转，促进乡镇干部的认识水平整体提升，确保了对职责的坚守与全面履行，从而使得这项工作能够达到预期的成效。

五是突出活化“账本”。在深入基层广泛征求干部群众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围绕“土特产”开发、村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村集体经济等方面细化设置了10个方面、35小类、300余项体检项目，建立了一套基础指标体系。并鼓励各地增加或优化特色指标，以便更加精准全面掌握村情实际，促进村集体发展。如邵武市依托其氟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党建体检”中深入挖掘本地科技人才资源，成功促成了一系列项目的落地。建阳区致力于提升建盏产业的规模与影响力，在“党建体检”中将建盏对矿石、釉料的分布情况以及制作工艺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建立建盏矿石的生态银行体系，有效促进了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

2. 走深走实，把脉问诊。“党建体检”调研组由1名区直单位的科级干部和1名其他乡镇的科级干部带队，与该村挂村领导、包村干部、基层党群工作者等组成。既引入镇外力量帮助查找问题，又发挥本地干部优势确保摸深摸透村情民意。

开展“体检”的过程，具体分四个步骤：一是动员培训，讲清方法步骤、目标要求、注意事项等，让工作人员明确如何开展“体检”，力求统一思想认识，明白“体检”的目的意义；二是收集汇总基础数据，在入村调查前，调研组和乡镇站办所工作人员一起会商完成部分的数据、资料录入工作；三是深入农村“体检”调研，做到“走透、听透、看透、想透”村情民意，重点摸透特色产业、人脉资源、特色人文、闲置资产等；四是梳理核对，建立审核制度，要求各调研组将梳理好的调研资料报县里审核，对不符合标准的材料进行补充完善。

3. 靶向发力，对症施治。通过“体检”找到病灶只是初期工作，对症下药、精准施治才是关键。南平全市下辖1636个村，各村区位不同、条件不同、资源不同、基础不同，故存在的问题也必然不同，不可能“一张方子”包治百病。为此，南平采取“分级诊疗”的方式，着力推动各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

一是对于先进村，注重典型引路、高位求进。结合乡村振兴样板村建设，培育优化多个“党建体检”成果转化示范村、重点村，通过举办“乡村拉练会”，组织部分乡村干部赴浙江、江苏、贵州等先进地区考察学习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是对于一般村，注重结对帮带、整体提升。按照“地域相邻、产业相近、文化相融”原则，试点开展先进村党组织与一般村党组织“结对共建”活动，帮带相对一般的村基层党组织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提升工作水平。

三是对于后进村，注重补齐短板、整顿转化。针对摸排确定出的软弱涣散村党组织，落实“党建‘体检’+精准选派+能力提升+资源下沉”要求，聚力推动整顿工作落地见效。精准选派按照“党群部门联弱村、政法部门联乱村、经济部门联穷村、涉农部门联产业村”的原则，从机关、企事业单位优秀年轻干部中精准选派60名驻村第一书记，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有力的人才支撑。建好用好培训“师资库”，举办市级村（社区）书记培训示范班，培优训强带头人。为推动各项资源下沉，积极落实好“四个一”整顿措施，每1个软弱涣散村都安排1名市县领导带头挂村、1名乡镇领导包村、1个县以上机关单位帮扶，促进力量下沉、资源下倾，有力推动软弱涣散村整顿转化。如政和县石屯镇王山口村通过这一工作机制，提出“一朵花、一片叶、

一颗稻”的发展思路，探索实施“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实现了茉莉花、烟叶、水稻等主导产业扩产升级，村集体自主经营性收入从13万元一跃增加到33万元，真正实现了“颜值”提升，村民增收。

（二）“党建体检”的成效

“党建体检”的最终目的在于运用，南平始终注重做好“党建体检”“后半篇文章”，用好用活“党建体检”成果，打通产业发展堵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整体质效。

1. 筑牢农村基层战斗堡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农村的事，要靠好的带头人，靠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4]针对在“党建体检”调研中发现的部分村干部队伍建设措施系统性不强、力度不够等实际情况，南平制定出台了村干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健全严格选用、备案管理、绩效考核、关怀帮扶等全周期管理制度，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更加坚强的骨干队伍支撑。如松溪县为实现对村“两委”班子履职情况“即时收集、动态考核”，构建了“激励+约束”的日常监管体系，根据村干部履职情况的量化得分，对不同表现的村干部出台管理办法、配套文件。表现优秀的村干部，在年终绩效、评优评先、培养使用等方面给予倾斜；对不称职的村干部则实行“歇职教育”管理，停发绩效工资，并到先进村跟班锻炼，实现待遇、培养、使用的差异化。

2. 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效能。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过去在农村基层，多数村都面临干部收集民意不精准、村民参与议事不经常的问题，部分工作难以得到群众支持。为此，南平通过“党建体检”这一举措推动广大干部下沉网格服务，从而健全“行政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联系

户”的村党组织体系，全面实现党建、综治、民政、城管、信访、应急管理“多网合一”，构建起具有闽北山区特色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如，松溪县依托其深厚的茶文化底蕴，以“党建体检”为依托，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吃茶话事”活动。邀请党性修养深厚、群众评价高、服务能力强的党员或“两代表一委员”担任“掌事人”。各级领导干部也频繁深入乡村，参与“吃茶话事”活动，通过“有事说事，没事喝茶”的方式，鼓励群众畅所欲言，表达内心的想法、需求以及不满，从而打开话匣子，解开心结。定期举办的茶话会为“党建体检”提供了持续的反馈机制，同时将“体检”中发现的问题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进一步完善了推动基层治理的党建制度体系和工作框架。

3. 强化农村人才队伍建设。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南平市通过“党建体检”挖掘出一大批本土的“土专家”“田秀才”以及在外乡贤等人力资源，发挥好驻村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乡镇流通助理“三支队伍”的作用，结合正在实施的“才聚武夷”行动计划、“到南平去、助乡村兴”等活动，打出一套教育培训、跟踪培养、政策扶持“组合拳”。通过这些努力，南平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既有了新挖掘、培养出的本土人才，又有了新生力量的注入，极大促进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当地群众的紧密联系，使得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得到显著提升，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和组织支撑。如武夷山市深化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打造首个县级科技特派员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创新科技特派“1+X”模式，组建科技特派团队动态服务行政村和企业。围绕茶产业的种质资源、生态种植、生产加工等6个领域组建茶产业科技特派团队，根据具体技术需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交叉服务、动态服务，实现茶产业链科技服务全覆盖，真

正“让技术长在泥土里”。基层群众与科技特派团队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这种紧密的联系不仅增强了双方的凝聚力，更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的振兴。

4. 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村级基层党组织能否带领村民发展致富，不仅仅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关乎党群干群关系、关乎农村政权基础的政治问题。南平把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来抓，坚持工业化理念、产业化思维、规模化推动，用好“党建体检”排查出来的特色资源、闲置资产等，做好做足做活“土特产”文章，走好山区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多种强村富民模式。

一是村企牵手模式。坚持党建引领，大力推动村党组织和企业党组织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把更多优势资源导入农村，实现村企互促共进、互利共赢。光泽县的圣农集团是一家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但作为闽北山区县，当地产业工人不多，限制了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村民回归、乡村振兴，需要为农村劳动力匹配就业岗位。在稳经济、促发展的当下，光泽把产业链引进乡村，积极推动各村成立联村党组织，以乡镇为龙头组建公司，推动辖区内的每个村入股公司，与圣农集团党委结对共建，结合企业延链、扩链，布局肉串加工、物流运输等白羽肉鸡上下游产业链项目，既增加了村财，还解决了群众家门口就业问题。目前，光泽探索的“村企共建”和“联村联建”相结合模式已见成效，2023年实现产值1.37亿元，83个村平均增收5.9万元。

二是乡村振兴公司模式。即把农村产业的发展放在乡镇这个层面来考虑，探索以乡镇为主导的乡

村振兴公司模式，积极引导各村入股乡村振兴公司，通过实行公司化运营，积极探索资产经营、产业发展、物业服务、工程承揽、订单生产等业务板块，有效盘活人才、土地、资金等资源与要素，助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如浦城县九牧镇的黄毕洋村以“党建体检”为契机，整合各类资源成立九牧镇乡村振兴公司，形成种植、加工、销售的全链条产业模式，做大做强黄毕洋酸菜产业。目前，南平10个市级试点乡村振兴公司推进有序，围绕资产经营、产业发展、社会服务、工程承揽等经营板块，策划实施项目133个，公司平均实现利润81万元，推动村集体稳定增收、群众家门口充分就业的成效逐步显现。

三是村工程乡代建模式。由乡里的建设公司统一组织实施辖区内工程总投资50万元以下的农村小型建设项目，依托县级国企统一设计、制定预算，并在县乡两级库中“派工购料”，统一集采工料，统一工程监理审计，泥水工、木工等一类施工人员则由“党建体检”摸排出的能工巧匠组成。这一模式既有效防范了农村“小工程”带来的“微腐败”问题，又提高了工程建设质量、施工效率，还满足了群众就近就业的需求。2023年11月，国家发改委发文肯定南平市“村工程乡代建”机制做法，并向全国推广。

“党建体检”这一探索实践对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定期的“党建体检”，可以有效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最后一公里”得到贯彻执行。同时，它也有助于发现和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和水平。此外，通过“党建体检”，还可以加强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和依赖，从而提升群众的凝聚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持。

三、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提升路径

南平市农村“党建体检”的探索实践，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如基层党组织在领导村集体经济方面还有待提升，乡村产业链条不够完善，稳定增收仍有挑战；在推动“空心村”村民返乡创业就业方面虽已有所突破，但仍需持续改善政策环境，吸引更多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下一步，需要持续推进农村“党建体检”工作，在提升政治领导力、乡村治理力、群众凝聚力和发展推动力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力求推动“党建体检”深入实践、常态长效以及转化运用，从而达到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最终目的。

（一）突出政治领导力，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打造坚强的领导核心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与群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是包括村委会在内的各类社会基层组织政治核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突出政治功能。因此，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是提升其组织力的关键所在。一要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村级党组织要始终坚持其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并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增强政治功能、提升政治领导力。从纵向上看，村级党组织要自上而下把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宣传、贯彻和落实到位，使乡村振兴不脱离党的统一集中领导、不偏离正确方向。从横向上看，村党组织要加强对农村社会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二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提衣提领子，牵牛牵鼻子”，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

要紧密结合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和工作需要，以工作需求为导向，着力补齐短板。近年来，在推动“党建体检”的工程中，建阳区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巩固基层基础、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常态化开展“支书大比武”活动，采取“述职演讲+现场打分+交叉点评”的方式，每人8分钟晒工作比思路、讲问题谈对策，同台“比武”、现场“过招”，还推动“大比武”的冠军村与软弱涣散村、年轻支部书记村等结对共建，建立“跨村联建”利益机制，带动全区共同发展。三要加强村内其他各类组织的领导。村内其他组织包括村级的妇联组织、共青团组织、民兵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各类种植养殖协会等。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对村级的妇联、共青团组织、民兵组织这些天然带有“官方属性”的组织领导情况较好，然而对于与一个村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各类种植养殖协会的领导情况还有待加强。

（二）增强乡村治理力，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增强乡村治理力与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不断强化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才能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组织体系构建上，优化党组织设置，针对农村产业的发展 and 人口流动等新变化，在产业链条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建立党组织，确保党组织的影响力能够延伸至乡村治理的每一个领域。例如，在特色农业产业集中的村落，可以成立产业党支部，汇聚党员的力量，引导群众共同推进产业发展，提高收入，使党组织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民主管理上，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建立村务公开

栏等方式，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人。如，南平市正积极推进基层“小微权力”监督平台建设，成功搭建起“监督信息平台+微信监督群”架构，闽北的大小村落每月都会把村务等各类事项材料拍照上传至监督平台，并转发至村里的微信监督群进行公示，得到了很多村民的积极回复，让村民反映诉求“有门”、解决问题“有人”，不断激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新活力。

（三）提高群众凝聚力，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夯实广泛的群众基础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工作的战斗堡垒，提高群众凝聚力是提升其组织力的重要基石，能为提升组织力夯实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思想引领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积极推进理论宣传与思想教育活动，运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及生动的案例，向群众传递党的政策与方针。例如，南平市在“党建体检”的过程中，通过定期举办的“田间课堂”和“吃茶话事”，向村民详细解读乡村振兴战略和惠农政策等，使群众深刻理解党的目标与个人利益的紧密联系，从而在思想上与党组织保持同步。同时，党组织致力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并宣传乡村中的道德模范、最美家庭等先进典型，通过讲述身边的故事来感召群众，营造文明和谐的乡村氛围，增强群众对党组织倡导的价值观的认同，凝聚思想上的共识。在服务群众过程中，党组织需持续关注群众的实际需求，从细节出发，切实解决群众的忧虑和烦恼。例如，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的关爱问题，党组织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定期探访、义务辅导等活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改善农村道路、水利、电力等条件。通过这些具体而微的服务，让群众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同时，

党组织还要鼓励群众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管理，如在农村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中，引导群众成为志愿者，参与垃圾分类宣传和监督，增强群众的责任感和参与感。

（四）强化发展推动力，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撑

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推动力体现在对农村经济的领导与组织能力上。集体经济对于农村而言有“造血”功能，乡村振兴的关键就在于集体经济功能的有效发挥，发挥得好可以有效调节农村经济两极分化现象。对于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困难与瓶颈，既要靠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自身能动性去解决，也要主动寻求上级党组织的帮助和政策支持，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如，南平市顺昌县大历镇引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展芋头产业时在跨村流转土地时遇到难题。为此，大历镇探索推进跨村联建，把地域相邻、产业相近的四个村的党支部联合起来，成立下坑洋联村党总支，并创新“土地生态银行”模式，把碎片化的土地流转集聚起来，采取了“党支部+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顺利流转7个村的4300亩土地，助力企业发展与村集体、村民增收，实现三方共赢。

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推动力也体现在其对农村文化的领导与组织能力上。南平是朱子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近年来，南平以时代精神激活朱子文化生命力，打造世界级朱子文化品牌。武夷山市五夫镇、建阳区考亭村、政和县石圳村等村落，正在大力发展朱子文化，将朱子文化遗存、朱子家训、朱子诗歌等文化元素与当地千亩茶园、百亩樱花园等特色景点和地方小吃串联起来，成功打造朱子文化IP体系，并开发“朱子文化+茶、盏、竹、水”等100余款特色文创产品，推出朱子文化少儿研学、农耕体验、生态课堂等活动，成为闽北

热门的短途旅游打卡地，既带来丰厚的村财增收，又很好培育了崇德向善的文明乡风。

农村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出了规定：“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抓乡促村，把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5]不论是从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还是从党的自身建设出发，新时代探索如何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引领乡村振兴的问题，都十分关键和紧迫。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总体要求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要有科学的举措，以此号召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身于基层建设、新农村建设之中，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1.
- [2] 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全党努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N].人民日报，2018-07-05（01）.
-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89.
- [4] “你看，乡亲们笑得多灿烂！”——回访河北正定县塔元庄村干部群众[N].人民日报，2022-01-10（01）.
-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2018-01-02）[2024-10-10].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66232.htm.

责任编辑：郑梅钦

深化地方立法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武超凡

(中共莆田市委党校, 福建 莆田 351100)

摘要: 营商环境改善的关键在于通过法治化的安排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环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近年来, 我国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立法工作, 各地营商环境立法数量颇丰, 在内容上积极对标国际国内评价指标, 为当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地方营商环境立法尚未完全匹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 主要表现在立法系统规划不足、问题导向不清、立法内容不优等方面。基于此, 建议遵循三个立法原则提高立法质量, 审视三组关系明确立法的实践导向, 发挥三个立法功能优化立法内容, 从而优化营商环境。

关键词: 营商环境; 地方立法; 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 DF127;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3-074-0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1]。”深刻揭示了法治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可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深化改革^[2], 深化地方立法改革是各地打造更好营商环境的关键, 合理运用地方立法的“规范性”“实施性”和“地方性”, 可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完善的保障。

一、营商环境地方立法的三维考察

2019年10月, 国务院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 国务院《条例》)是我国第一部优化营商环境的综合性行政法规, 填补了立法空白, 具有里程碑意义, 推动我国营商环境制度建设迈入新阶段。^[3]

(一) 时间维度: 营商环境地方立法的数量不断丰富

截至2024年3月, 全国28个省份共出台了30部省级营商环境地方性法规。从其制度效力等级来看, 其中地方性法规26部, 政府规章4部, 形成了以省级地方性法规为主导的地方立法格局。^[4]从营商环境地方立法首次公布的时间来看, 有6部先于国务院《条例》出台, 立法实践呈现出“地方—中央—地方”的路径。^[4]辽宁省于2016年12月颁布的《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是我国第一部省级地方性法规;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于2019年相继颁布了营商环境条例; 上海市作为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的样本城市, 在国务院《条例》实施的半年内颁布了《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5], 并在三年内进行二次修订, 其目的在于适应世界银行于2021年公布的新营商环境评价指标(Business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时代竞争政策定位与反垄断问题研究(编号: 23&ZD07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武超凡, 中共莆田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助教, 研究方向: 经济法。

表 1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与国务院《条例》对应表

世行 DB 指标	世行 BR 指标	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	国务院《条例》
开办企业	企业准入	开办企业	第十九条
/	劳动就业	劳动力市场监管	第二十二条
办理建筑许可	获得经营场所	办理建筑许可	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
登记财产		登记财产	第四十七条
获得电力	公共设施服务	获得电力	第二十八条
/		获得用水用气	
获得信贷	金融服务	获得信贷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保护少数投资者	/	保护中小投资者	第十六条 第二十一条
/		政府采购	第十三条 第三十一条
/	市场竞争	招标投标	第三十二条
/		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	第十五条
/		市场监管	第三十条 第五章
跨境贸易	国际贸易	跨境贸易	第四十五条
缴纳税费	缴纳税费	缴纳税费	第二十四条 第四十六条
执行合同	解决商业纠纷	执行合同	第六十六条
办理破产	企业破产	办理破产	第三十三条
/	/	政府服务	第二十五条 第四章
/	/		第十二条 第二十条
/	/	包容普惠创新	第二十三条 第六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营商环境报告》

Ready，以下简称：世行 BR 指标），为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内容维度：营商环境地方立法的内容对应评价指标

国务院《条例》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对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Doing Business，简称：世行 DB 指标）都有所回应。国务院《条例》虽至今未修订，但其内容对之后才实施的世行 BR 项目 10 大评估指标与中国营商环境评价 18 项指标均有所涉及（见表 1）。

在国务院《条例》的指引下，28 个省份营商环境条例的内容对国际国内的评价指标均有所回应。各省条例均设置了“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和“法

治环境”章节，全面规范企业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4 个省份单独设置“要素环境”章节，明确营商环境建设所需资源，给市场主体注入强心剂。19 个省份设置“监管执法”或者“监督保障”的章节，明确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正所谓有权必有责，12 个省份则设置“法律责任”章节，压实有关部门的责任，追究相关执法主体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违规行为。

（三）成效维度：为地方营商环境建设提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6]推进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是保障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营商环境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作用机制通常为“优化营商环境决策—法治化处理—实施营商环境改革—营商

环境评价”^[4]。如浙江省自2016年12月起,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全国率先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2018年出台了《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将2年的实践探索成果法治化,2023年出台《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浙江省《条例》)中第三章“政务服务”再次巩固“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果。同时,各省在深化国务院《条例》的基础上,结合地方特色明确本地营商环境建设的总体目标,让市场主体看到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比如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在浙江省《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之一在于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

二、营商环境地方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规则性治理”为核心的法治竞争有助于提高地方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但从各省条例内容对比和制度的实施情况来看,营商环境地方立法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

(一) 营商环境地方立法系统规划不足

湖北省于2020年8月出台《湖北省优化营商环境办法》(以下简称:湖北省《办法》)贯彻落实国务院《条例》,后于2022年11月颁布了《湖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湖北省《条例》),从政府规章上升至地方性法规,给予营商环境建设更有力的保障。但是,对比湖北省《办法》和《条例》,不难发现其中诸多条文雷同,部分内容仅微调表述或语句顺序,并且缺乏切实可行的有效举措。而且两部法规同时实施,造成一定程度的立法重叠,给市场主体造成立法冗杂的不良印象。还有部分地方立法存在冲突的情况,如在上位法《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16年版本)已然失效的情况下,依据其制定的《辽阳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仍然施行,辽阳市没有及时对该条例作出相应修改或废止,这无疑对构建合理营商环境造成了阻碍。可见,部分地区在营商环境立法审议时未

充分调研,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立法规划,造成立法重复或冲突问题,进而无法充分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二) 营商环境地方立法问题导向不清

优化营商环境既有共性,也有特性。从经济发展的纵向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呈现出“北重南轻”的经济格局,改革开放后东、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各异,导致营商环境的需求不同,相应制度设计也需因地制宜。从产业发展的横向视角看,不同产业的营商环境需求不同,同一个产业在不同阶段的需求不同,对此营商环境的侧重也应有所不同。若在立法时缺少问题导向,将导致立法质量欠佳,难以符合市场主体需求,更无法激发市场活力、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以黑龙江省为例,相较于东部地区,其熟人社会特征显著,因此,优化营商环境需要侧重于确保执法公正与增强企业家守法意识。但是,《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9章108条中关于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规定仅一条,未规定“亲而有度、清而有力”政商关系的细化措施,也未将其设置在总则的位置或单独成章,以引起执法者和市场主体的重视。

(三) 营商环境地方立法文本内容不优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可见地方立法好不好用,管不管用是关键。但是部分地方立法只是上位法的“搬运工”。部分条例为了保持草案体例的完整性,机械照搬上位法条款或者稍微调整引用国内营商环境建设较优地区的立法内容,而这样的条款在审议过程中往往不会被筛除。比如《四川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四川省《条例》)第三十五条与国务院《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并无二致。甚至国务院《条例》比四川省《条例》规定得更为详细:其在政企沟通机制前加上了畅通有效的定语,对于市场主体的诉求前未添加“合理”二字进行限制,这

些更有利于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还有部分条例中提倡性、号召性、宣示性的条款较多,实质性、具体性条款较少,针对性较差、操作性不强,容易沦为“观赏性立法”。因此若地方没有提高立法水平,不能对国务院《条例》进行有地方针对性的细化,没有提高立法的适用性,会损害立法权威、浪费法律资源、无法通过地方立法改善地方营商环境。

三、营商环境地方立法的革新路径

(一) 遵循三个原则提高立法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7]⁴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8]这是系统编制立法规划的方法,是破除立法质量不高的根本途径。

1. 遵循规律,科学立法。立法要尊重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首先,做好法律实施评估工作。评估现有的营商环境法律法规能否满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目标的需要,若不能,是法律的缺位、错位导致?还是选择性执行、消极执行、乱执行导致?其次,做好立法统筹规划工作。清理、修改和废止与营商环境优化相悖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最后,关注新兴领域。特别是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更高水平的营商环境,通过加强法律供给,完善营商环境制度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2. 尊重民意,民主立法。立良法需汇聚民意。在营商环境地方立法改革过程中,要健全充分听取公众意见的立法工作机制。畅通公众参与渠道,特别是个体工商户、企业、行业协会和商会的参与渠道。他们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了解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遇到的堵点、难点、痛点和瘀点,地方立法才更有针对性。同时,立良法需凝聚专业力量。

邀请资深专家开展论证会,对立法中技术的规范性、内容的可行性等进行广泛、深入的论证,有助于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3. 遵守权限,依法立法。依法立法要把握“不抵触上位法”原则,恪守纵向效力位阶与横向权限界分的双重约束。通过构建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和规范性审查,确保营商环境地方立法与上位法相比,做到立法目的不违背,条文设定不抵触,禁止行为不缩减。特别是在上位法作出修订时应及时启动立改废释工作,保证从中央到地方立法的统一性。同时,重视地方立法间的协调性问题,营商环境改善是一项综合性、长期性项目,其在内容上必然与其他领域的制度存在内容的交叉与重合,故相关制度均应作为营商环境立法的参考,做好立法“统”和“分”、“详”和“略”工作,避免立法重复或冲突问题。

(二) 审视三组关系明确立法的实践导向

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本质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核心在于实现改革和立法良性互动,关键在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

1. 厘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明确立法边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8]优化营商环境所需要的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宽松有序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等,都是市场经济对政府制度供给的基本要求。^[9]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遵循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原则来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2]。因此通过审视地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明确营商环境地方立法改革的重点很重要。第一,删除现有立法中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条款,增添“政府应当……”的义务性条款来压实地方政府责任。如黑龙江省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关键就在于压实政府的服务责任,避免权力寻租的可能性。第二,增添优化协作条款,

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协同作用。如社会信用体系包含“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其建设需要依托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力量，政府不只是“管理者”还是“推动者”，市场主体不仅是“参与者”更是“建设者”。

2. 理顺改革和立法的关系，明确立法方向。优化营商环境同简政放权、“放管服”改革、“互联网+政务服务”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激活市场活力、便利企业发展、促进创新创业等。^[10]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7]^[14]一方面，各地立足本地产业链需求进行改革，从而推动立法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立法巩固改革的成果，为地方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夯实制度基础。

地方政府和人大应处理好具有阶段性和多变化特点的改革决策与相对稳定的营商环境制度之间的平衡问题。结合营商环境建设与地方立法基础，促进改革决策与地方立法之间顺利衔接，需要地方政府和人大构建常态化和动态化的沟通机制，确保改革与立法同频共振。把成熟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法律，实现短期的“政策红利”向长期的“制度红利”完美转变。^[9]对于尚未成熟或未确定的问题，可以暂缓立法，为改革预留足够的探索空间。

3. 加强地方和区域的关系，扩大立法成效。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营商环境的建设不是要形成某省或某市的辖区内优势，而是要强化中心城市营商环境的辐射作用，形成营商环境优化的区域协同效应，引领区域营商环境协同发展。^[11]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就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问题上，分别在各自的营商环境条例中做出了“加强与长江三角洲区域相关省、市的交流合作”的规定，从而破除各种制度的、政策的、显性的或隐性的藩篱，为生产、流通、交易以及纳税和监管提供统一的规则体系。

因此各地要分析所处区域的优势之所在，以及

自身定位。思考如何通过加强区域协同立法建设区域营商环境，来实现优势互补和共赢。首先是各地秉持协商交流原则、互利共赢原则和有限自主原则达成协同立法合作意向或协议，建立协同立法机制，共同优化营商环境立法内容。其次是组建专班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如四川省和重庆市组建专班联合推进川渝两地法律服务资源共建、共享，打造优质营商环境。^[12]最后是扩大区域协同机制，通过省域层面战略合作带动市域和县域的合作，发挥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推动资本、人才和知识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促进产业合理布局。

（三）发挥三个功能优化立法的文本内容

地方立法需牢牢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的功能定位，防止照抄照搬、大而全，努力提高立法的针对性、精准度、实效性，以优质的法规来改善营商环境。

1. 紧扣实施性确保法规行得通。国务院《条例》是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必须统筹兼顾，地方立法是区域性和具体性的^[13]，如果营商环境地方立法的条文规定模糊，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相关部门职责体系不具体，那么可问责性和稳定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站在省域层面，营商环境立法改革则重在平衡倡导性和操作性的条款比例，既要细化国务院《条例》，也要确保市县域层面有空间结合本地情况进一步细化落实。

2. 强化补充性确保法规真管用。各省搭建“1+N”的营商环境立法体系，即营商环境条例+其他配套性的条例和政策体系。地方立法机关应充分发挥补充性功能，把国务院《条例》同本地实际结合起来，主动对标世行BR项目10大评估指标，开展新一轮对标改革提升行动。可对营商环境条例进行修订，立法和修订要能够补充营商环境制度中的空白点、模糊点和薄弱点。

3. 聚焦探索性确保法规有特色。国务院《条例》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在法治框架内积极探索原创性、差异化的优化营商环境具体措施。”地方立法机关一方面可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新举措上升为地方立法内容；另一方面可在上位法没有规定，或者不存在上位法的情况下，为解决地方营商环境出现的具体问题可运用自主立法权进行创制立法。^[14]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完善法治建设规划提高立法工作质量效率，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N]. 人民日报, 2019-2-26(01).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4-07-22(01).
- [3] 李建伟.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营商环境法治观[J]. 法学论坛, 2022, 37(03): 21-32.
- [4] 王翔. 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营商环境地方立法的检视与优化——以省级地方性法规为核心[J]. 青海社会科学, 2023(01): 155-165.
- [5] 陈开梓.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福建创新与实践路径[J]. 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1): 34-41.
- [6]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203.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 [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 [9] 黄新华, 曾昭腾. 建构政府与市场关系良性互动的营商环境[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0(04): 80-89+159.
- [10] 马亮. 以法治优化营商环境[N]. 中国市场监管报, 2019-10-29(03).
- [11] 刘勇华, 龙婧婧. 我国营商环境地方立法检视与优化——基于营商环境地方立法中“市场环境”章的内容比较[J]. 行政与法, 2022(12): 97-105.
- [12] 李燕. 区域一流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建设路径——以成渝地区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04): 141-150.
- [13] 黄明涛. 经济特区社会立法研究——以深圳市人大地方立法为例(1992~2019)[J]. 深圳社会科学, 2019, (06): 131-139.
- [14] 曹瀚予.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实践偏向与理念革新[J]. 山东社会科学, 2022(08): 178-184+192.

责任编辑：魏璐珂

书评三则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与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三大主题，既是学术纵深探索的焦点，亦是解码中国实践的关键维度。本次书评的三部著作以扎实的学理根基与实践导向，回应时代命题，彰显中国学术的使命担当。《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研究》一书通过“翻译—阐释—实践”的脉络解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方法论镜鉴，堪称理论本土化的“概念显微镜”。《中国式现代化名家谈》一书以跨学科理论集成突破传统范式，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亦为中国道路提供多维注解，是政策研究与学术启蒙的“战略图谱”。《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研究》一书立足闽西实践，提炼“带着泥土气息”的振兴方略，为基层治理与区域研究注入鲜活智慧。三部著作的共同特质在于“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问题中去”的学术品格：既有建构本土理论的话语自觉，亦含扎根现实的实践锋芒；既追求理论突破，更坚守回应现实的初心。这种知行合一的学术探索，既呈现当代中国思想的活力，也为交叉领域的对话开辟空间。期待这些学术成果激发更多理论与实践共生共进的可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赓续学术新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史研究的探索与尝试 ——评《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研究》一书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张艳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已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既有的研究多集中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研究得比较深入，成果也比较丰富。而从概念史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在中国的翻译、阐释、理解、传播、运用与创新在学术界还比较少。李永杰教授的《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年版）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这部著作具体而细致地研究了唯物史观若干核心概念的内涵辨析、中国化衍变、当代意蕴。总的看来，该著作在如下三个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史研究。

一、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史研究新范式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概念史研究源于西方，代表人物包括德国的因哈特·科赛雷克（以多卷本的《历史基本概念》为代表性成果），英国的昆廷·斯

金纳（以《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为代表性成果），英国的 J. G. A. 波考克（以《马基雅维里时刻》为代表性成果）等人。概念史研究最早在我国史学界兴起，后来这一研究范式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中，概念史研究还比较少，虽然已经有若干文章发表，但系统性的专著还没有。《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史研究的一次尝试，该著作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一系列重要概念的内涵诠释与辨析、中国化生成与衍变，中国化阐释与话语创新等问题。辨析了若干概念的内涵，比如在辨析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提出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编译者所做的注释的质疑，并以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为依据展开讨论，有较强说服力。该著作系统探讨了一系列唯物史观核心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衍变，比如“所有制”“社会存在”“人民”“人的本质”等等，这些概念的中国化演变史研究从微观层面再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某个具体领域。此外，该著作还探讨了若干概念中国化的话语演变，比如“共同体”概

念在当代就具有重要的话语创新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概念就是唯物史观“共同体”概念的当代中国话语创新。

该著作通过具体概念中国化历程的查考,从微观层面初步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机理与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有助于把理论探讨的宏大叙事引向微观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创新,有助于推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尤其是有助于推动研究方法创新。探讨唯物史观中国化概念史,该著作较多关注三个方面的考证与辨析。第一,唯物史观核心概念在西方的渊源与辨析。实际上,唯物史观的很多概念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存在,该著作力图从词源学的角度查考这些概念在西方语境中的渊源与演变,并重点阐发马克思对这些概念的继承、创新与发展。第二,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的中华文化渊源与考辨。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汉语中并没有现成的词汇去对译这些概念,很多概念的生成参照了日语,马克思主义进入日本的时间要早于中国,这些概念译名的确定都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该著作对中华文化渊源也作了较为充分的考辨。就此而论,唯物史观核心概念在中国的生成是“两个结合”的结果。第三,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的生成与演变源于时代的实践要求。这些概念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被用来分析中国社会,开启了中国化进程,并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唯物史观概念。这些研究带有研究范式创新意味,有助于学术界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

二、探讨了唯物史观核心概念从学术术语到政治话语的演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也从来不是纯粹学术思潮,它不仅注重“解释世界”,而且更加注重

“改造世界”。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转化为党的政治话语,唯物史观核心概念进入中国之后,也很快转化为了我们党的政治话语。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唯物史观核心概念主要的是学术术语,但随着我们党用唯物史观分析研究中国具体国情的时候,这些概念逐渐从学术术语转化为了阐明我党主张和立场的政治话语。

唯物史观“人民”概念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最早的时候,人民只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术语,用来阐发唯物史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理论,但随着“人民”概念被我党用来分析研究中国具体国情,这一概念逐渐成了党的政治话语。人民是党的初心之所在,在革命年代,我党逐渐形成“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主人地位用国家制度确定下来,政府是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是“人民法院”,还有“人民检察院”“人民军队”等等,这些都是人民话语的表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立场,将“坚持人民至上”提炼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强调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阐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等。“人民”已经从唯物史观的术语转化为了党的政治话语。

不只是人民概念,唯物史观诸多核心概念在中国都有一个从学术术语转化为政治话语的过程,《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研究》一书深入探究了这个很有价值的问题。

三、诠释和阐发了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的叙事功能与话语功能

《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研究》一书还探究了一个

很有意义的问题，那就是概念的叙事功能。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重要方面。唯物史观核心概念则是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基础。

所谓叙事就是讲故事，就是对所“叙”之事的“叙述”，但用不同的概念来叙述同一个故事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剩余价值”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它的所指是工人创造的但被资产阶级剥削走的那笔财富，同样是这笔财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称之为“利润”，“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两个概念，但这两个概念的所指是同一笔财富，不过这笔财富用“剩余价值”来解释，解释出来的是剥削，是阶级斗争，是革命。如果用“利润”概念来解释这笔财富，那这笔财富是资本投资所得来的回报，资本的回报自然应该归资本所有者所有，所解释的是这笔财富应该归资本家所有。同样一笔财富用不同的概念来解释能得出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所以概念本身就是叙事结构，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

中国故事只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适合中国的概念来阐释，西方媒体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其中的一种表现就是用他们的概念来阐释中国故事，这是我们时常被动挨骂的原因之所在。要改变这种被动挨骂的状况，就必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些新概念就是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的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比如《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研究》一书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渊源与话语创新，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结构，用“中国式现代化”概念讲中国故事就能把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是建构中国话语的重要叙事结构。该著作还探讨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概念的渊源考释与话语创新，强调“人与自然生命共

共同体”概念是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的叙事结构，这一概念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渊源，也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是适合中国、能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的叙事方式。

用中国化的唯物史观概念讲中国故事，才能把中国故事讲清楚，讲透彻，才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才能塑造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才有助于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与学理建构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名家谈》的学术 对话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
刘兴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在标注了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坐标的同时，也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从学理层面总结实践经验，形成系统性理论阐释，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近日出版的《中国式现代化名家谈》（福建人民出版社 2024 年版）立足“两个结合”，通过跨学科、多维度、全景式的理论阐释，系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创新和实践路径，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表达，也是其实践创新的思想引擎。

一、全面系统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名家谈》一书分上中下三编，以通论、价值、方略三个层面的学术架构，既自成

体系又相得益彰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研究范式，形成了理论阐释、价值建构与实践探索的学术闭环。

上编“中国式现代化通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经纬，用六篇文章编织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立体图景。这组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与中华文明演进规律有机融合，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唯物史观”基础；运用长时段比较方法，开展了“大历史视角下的现代化进程”研究；用“空间哲学话语分析”，为我们了解和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切入点。这些研究从本体论层面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坐标系。

中编“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天观’”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哲学突破，六篇文章以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在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中重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内核。这组文章从“文明观”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对“文明冲突论”的超越；从“民主观”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对西式民主的“数量—质量悖论”的破解；从“生态观”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对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这些成果不仅构建起现代化理论的“中国价值”，更在近年流行的新文化史、中共概念史研究方法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智慧的话语体系。

下编“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品格。四篇文章创新性阐释了“新质生产力”，开创“城乡社会生命体”分析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思路，以“国家竞争优势”研究重新定义发展动能等。这些研究运用空间政治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等跨学科方法，在实践维度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性和引领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建的范式创新与学术主体性

作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集成之作，《中国式现代化名家谈》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其理论阐释与学理建构既彰显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又精准对接了新时代新征程下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求；既深度呼应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命题，更系统响应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战略布局。这部由国内权威学者联袂打造的学术集萃，不仅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理论突破，更以鲜明的学术主体性推动着哲学社会科学的范式革新。

其次，这种兼具历史纵深与全球视野的学术考察启示我们，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来把握历史大势，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来透视解析发展基因，以改革实践为“标”来显示洞察发展规律。更为深刻的是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本质，只有从文明传承维度解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融合，方能书写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再次，这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精度的研究成果，不仅生动诠释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学术担当，也在研究方法上给青年学人以启发。“中国式现代化通论”突破了传统现代化研究的单线叙事；核心价值层面的研究有助于系统阐释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质对现代化价值体系的形塑机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华文明基因解码相结合的研究进路，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重构。

当学术研究真正扎根于文明传承的沃土，就能生长出解释中国道路的世界性话语。《中国式现代化名家谈》一书在理论贡献上，形成了具有标识性的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概念；在学科建设上，探索了跨学科交叉融合的范式研究路径。这种将学术追求与时代使命深度融合的理论创新，不仅为解读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学术“密码”，更在回应“世

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中，展现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建构。

三、学术出版视域下的政治担当与战略远见

《东南学术》杂志社作为学术出版的“国家队”与东南学术重镇，组织出版的这本《中国式现代化名家谈》，其战略远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国之大者”的站位把握理论热点，准确理解、完整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组织团队以“命题作文”与“自由探索”相结合的科研组织方式，组稿约稿、开设专栏，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工程”；二是以创新性思维组织策划，将散见于各学科的研究成果系统集成成为理论体系；三是以“建构性叙事”的方法，突破话语瓶颈，关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性概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哲学意蕴、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战略，将其以基础理论—价值内核—实践方略的理论分析框架集合成册，将理论探索转化为具有解释力、引领力的知识体系，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图谱增添中国坐标，使得该书的学术组织模式具有重要示范意义。这种将学术生命融入民族复兴征程的理论自觉，正是新时代构建中国话语的必由之路。这种将学术出版深度嵌入国家战略的实践，也彰显了新时代学术期刊的使命担当。

解锁闽西样本密码

全面推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评《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研究：以闽西革命老区为例》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邓翠华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宏大图景中，革命老区（以下简称“老区”）的乡村振兴议题，因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与红色基因，以及面临的复杂现实挑战，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中极具关键意义且不容忽视的重要领域。《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研究：以

闽西革命老区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一书，正是对这一重要议题的有力回应。该书由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吴雨星讲师撰写，于2024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者以原中央苏区核心组成部分、全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闽西老区为研究样本，不仅凸显了闽西的典型代表性，更彰显了其在推动老区乡村振兴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该书凭借大量翔实的研究资料和多维度的分析视角，全面立体地呈现了老区乡村振兴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与未来发展路径。对于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关心老区发展的各界人士而言，这本书为老区的乡村振兴实践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实证案例，兼具学术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在内容架构上，该书逻辑严谨、层次分明，全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阐述老区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为后续研究筑牢根基；第二章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老区乡村发展的历史进程，梳理其发展脉络；第三章聚焦老区乡村振兴的闽西实践，深入剖析地方案例；第四章对闽西老区乡村振兴存在问题的原因展开分析，直击痛点；第五章提出推进老区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给出解决方案。

在研究内容上，作者带着浓厚的问题意识，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上，深刻地回答了如何推进老区乡村振兴的问题。

一是辩证化解边远山区的发展障碍，将红绿特色资源与政策优势内化为发展的强势动力。老区乡村振兴与其他地区乡村振兴的不同点在哪里？如何破解老区乡村振兴个性化难题？作者明确提出，运用辩证思维化解老区乡村振兴个性化问题。其一，通过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强化科技赋能，跨越边远山区的发展障碍。作者尤为强调越是发展落后的地区越要依靠新科技赋能，在数字智能时代，老

区要善于利用数智技术,通过构建虚拟空间跨越物理空间的发展屏障。其二,科学推进“以红富民”“靠山富山”,高质量活化利用红绿特色优势资源。“以红富民”,须科学处理好红色资源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将文化效益放在首位,推动实现经济效益。“靠山富山”,将边远山区的发展障碍辩证地转化为绿色发展的优势,统筹处理好绿色发展质与量、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其三,更好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内生发展动力。国家对老区乡村发展予以政策倾斜与有力支持,但更要坚持乡村群众的主体地位,将外源动力有效转化为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是循序渐进地在城乡关系视野中全面推进老区乡村振兴。国家对老区及其乡村扶持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老区大多仍属于欠发达地区?老区发展基础本就薄弱,如何支撑与推动老区乡村振兴?对此,作者给予明确回答。其一,老区乡村振兴是动态向前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作者通过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老区乡村70余年的发展演变,用数据与经验告诉我们,老区乡村发展虽然历经一些挫折与困难,但总体是向前发展的。为此,我们应该坚定推进老区乡村振兴的信心与决心。同时,也要客观认识老区乡村振兴面临的突出困难与问题,遵循循序渐进的推进原则。其二,老区乡村振兴不能仅从乡村谈乡村,而应将其置于城乡关系的视野中考察。城乡融合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发展的基本判断。老区大多地处多省交界的边缘、边远地带,发展基础薄弱,城市发展受限,导致以城带乡动力不足。由此,作者提出,老区应将促进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作为重要着力点。尤其要重视对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规划,辩证转化其边缘区位优势,通过产业创新、区域合作等方式,寻找并培育省际交界处的经济新增长点,

辐射带动老区乡村振兴。其三,全面推进老区乡村振兴。老区乡村振兴虽然存在突出的困难与问题,但同样要善于把握老区的特色优势、转化老区的发展劣势为发展优势,推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方位的振兴。

三是因地制宜、分类推进老区乡村振兴。老区虽然大多仍属于欠发达地区,但有部分老区发展程度较高,这就导致不同发展水平的老区在带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呈现出较大差异;老区各个乡村因受限于地理位置、人才储备、资源禀赋等因素,振兴条件也有所不同。由此,作者提出,要根据红绿色资源禀赋差异分类推进红色主导型、绿色主导型、红绿色融入型产业发展;要根据内生力量差异分类发展本土能人引领型、乡贤带动型、群众自主型主体赋能模式;要根据区位条件分类探索近郊村、远郊村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近郊村易于受到城市发展的辐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远郊村则更需要挖掘特色亮点,尤其是探索吸引城市居民的“微生态游”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在研究方法上,实地调研法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作者深入福建省内外老区乡村,尤其是闽西老区乡村,与省、市、县、乡(镇)、村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基层群众展开面对面的交流访谈。调研时间跨度长达6年(2019-2024年),作者实地走访闽西老区下辖18个县(市、区),也几乎走遍了福建省其他老区所在的县(市、区),深入调研200余个乡村,并积极为老区及其乡村振兴出谋划策。如此长时间、全方位的跟踪调研,足以彰显作者对老区乡村振兴问题研究的脚踏实地和全身心地投入。此外,在研究过程中,作者特别针对五个跨省老区的34个主要地级市近10余年的发展数据展开统计论证,通过严谨的数据分析,挖掘数据背后的规律与趋势,为研究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

撑。这种实地调研、计量分析等多元方法的有机结合，从不同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剖析，相互印证、互为补充，有效保证了研究的科学性与可靠性，也使得本书的研究成果更具权威性和参考价值。

作为该书作者的硕士导师，我欣喜地看到作者在学术研究上的执着与成长。这本书脱胎于作者的博士论文，但作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基于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持续深耕乡村振兴领域，深入探索相关问题。近5年，她主持了国家、省(部)等各级纵向、横向课题10余项，其中，多项与乡村振兴密切相关。作为福建省乡村振兴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2024年，她较高质量地完成了福建省乡村振兴研究会的委托课题“福建省乡村振兴若干模式研究”，为福建省乡村振兴事业建言献策。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作者增进了对老区乡村振兴的真实了解，使其对老区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更富有针对性。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作者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在红色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2024年，作者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项目聚焦于“原中央苏区红色资源的数智化保护和利用研

究”。本书中对闽西老区乡村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深入论述，与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紧密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本书也是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它不仅反映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上的连贯性与深入性，也为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为老区乡村振兴提供了学术注解，更在于构建起红色基因与现代性转化的理论桥梁。阅读本书时，既能触摸到历史脉搏的深沉跳动，也能聆听到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正如作者在结语中所言：“老区乡村振兴并非静止、孤立、片面的过程”，“老区乡村振兴没有统一的、固守的模式”，老区乡村振兴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征程，始终在探索与前行的道路上。这种充满历史辩证法的学术立场，使本书超越了普通区域研究的局限，成为观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棱镜。为此，我特向广大读者，尤其是关心老区和乡村振兴问题的理论研究者 and 实际工作者，郑重推荐这本书。

责任编辑：陈琴容

一种反“独”促统的出版理念与实践

——以陈映真及其《人间》杂志为中心

刘 韬¹ 阎立峰²

(1.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000; 2. 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20世纪80年代初, 基于对杂志界“分离主义思潮”泛起的警觉, 陈映真在国民党当局与“台独”势力的夹缝中“另开战场”——创办《人间》杂志。受陈映真个人主观意愿和文学论战、副刊竞争、人际网络等外部客观因素影响, 《人间》结合纪实摄影与报导文学, 形成台湾出版史上独树一帜的编辑方针, 使杂志呈现融合两岸人文风情的“中国意象”, 以此抗衡“党外杂志”兜售的“台湾意识”。

关键词: 陈映真; 《人间》杂志; 出版理念

中图分类号: G23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3-0879-09

当前,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加紧推进“台独”分裂活动, 打压迫害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政党、团体、人士, 引发有识之士普遍不满。岛内多位学者联合声明, 指责当局压缩言论自由, 推动“思想审查”。回首20世纪80年代, 在当时“台独”思潮渐兴和当局白色恐怖即将崩解的背景下, 一些文化界人士为反分裂、促统一而投身出版事业, 陈映真便是其中的一面旗帜。究其原因, 不仅在于陈映真的文学成就, 更离不开他的爱国热忱及其创办的《人间》杂志。就前者说, 人间出版社“编辑会议”认为: “在战后台湾思想史上, 文学家的陈映真成为备受争议、无法忽视的存在。”^[1]此判断为两岸持不同立场研究者共同认可。中国作家协会称其为“忠诚的爱国主义

者”“台湾同胞的杰出代表”“著名的文学家”。就后者言, 陈映真两次遭国民党当局逮捕依旧表示: “我要把这只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和人民。”而后他便以出版为志业, 创办《人间》杂志。《人间》杂志的创刊、发展与休刊初心、编辑方针及其成就与限制, 呈现20世纪80年代岛内一种反“独”促统的出版理念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既可求索“解严”前后岛内杂志出版业状况的一个侧面, 也能为我们继续挖掘台湾出版文化历史资源、探求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寻找新的入口。

一、“另开战场”: 为反“独”促统创办《人间》杂志

作为台湾文化界的一面旗帜, 陈映真参与出版是文学主业外的兼顾, 但《人间》却与其文学成就

基金项目: 202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台湾新闻传播研究关键词”(24FXWB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韬, 博士,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讲师, 研究方向: 闽台文化传播、台湾出版传媒;

阎立峰,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对台传播, 新闻理论。

一道为两岸瞩目。他参与出版的最早记录,来自《回忆剧场杂志》^[2]和《后街》^[3]两篇回忆文章。1965年他参与《剧场》创刊,后因观念不同退出。1976年2月,陈映真主导了集结“泛左翼”知识分子的《夏潮》创刊与编务。1979年《夏潮》被禁,受胡秋原邀请,他加入《中华杂志》并参加例行编辑会议。^[4]进入20世纪80年代,陈映真参与《文季》《夏潮论坛》工作。1983年4月至1985年6月,陈映真承担《文季》(双月刊)编辑事务。此外,他与陈映朝、陈映和合办汉升出版社,经营刊物《立达杏苑》《氰胺牧苑》。

陈映真完全投入出版,应从《人间》说起。1985年11月1日,一场备受关注的讲演会在台北耕莘文教院举行。陈映真身兼三职——召集人、发行人(署名陈永善)、文字编辑(署名许南村),宣布《人间》诞生。此后,除1987年发表小说《赵南栋》外,他将主要精力投入编辑事务。陈映真乐此不疲,“出刊之后,我忽然跳入不可思议的忙碌里……然而,我却有这时代中难有的希望和幸福感。”^[5]与此同期,陈映真创办人间出版社。回溯其小说创作,此时《将军族》《夜行货车》《山路》等代表作均已发表。从这意义上,《人间》是陈映真从文学转向出版的标志。《人间》究竟为何而办?陈映真在发刊辞中开宗明义地答道:

我们盼望透过《人间》,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与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6]

这段文字常被引述,对人们了解《人间》创刊有一定影响。以往讨论也大多囿于发刊辞字里行间的理想主义性格与人道主义关怀。但此番略有宗教色彩的宣示,尚不足解释陈映真抵押房产创办《人

间》。直至十年后,陈映真表示:

进入80年代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海外的分离运动回到台湾后,充满了悲情,许多熟悉的朋友在高雄事件后改变了立场,台湾文学从此分裂了,以前的乡土文学以“外国”作为针对面转变成以“中国”为针对面的论述,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创办了《人间》杂志。^[7]

所谓“高雄事件”是以《美丽岛》杂志社为核心的“党外”异议势力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一次冲突。此前,有人基于对台湾持续“西化”的反思,提出“乡土文学”中的“台湾意识”,虽与“中国意识”存在张力,但并未浮上台面。此后,以“党外人士”为编辑班底的杂志,如《亚洲人》《暖流》《政治家》《纵横》《新潮流》等,开始鼓吹与“中国意识”对立的“台湾意识”。陈映真没有袖手旁观。他坦言:

我们当然反对“台独”,可是又不能在这种高压下去指责“台独”……眼看着“党外运动”的理论不断、不断地向“台独”发展,但不能出手,被动得不得了!这个时候,我就想,不如另开战场吧,就想到了另办一本杂志,就是《人间》。^{[8][29]}

之所以“被动”,是因所在“夏潮集团”与其他“党外”运动者曾于70年代一道参与社会运动。二者虽因“统独”之争分道扬镳,如苏庆黎、陈鼓应、王拓等成员转投《美丽岛》,但共同面临当局打压。陈映真不便直指其“台独”倾向,但须思考如何与“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于是,他在杂志界“另开战场”,创办《人间》。与其说是陈映真呼唤“发刊辞”中那种左翼常向往的新世界,毋宁说,在20世纪80年代岛内的特殊历史课题与媒介环境下,他有意隐晦更重要的意图——反“独”促统。这是历来《人间》研究未见厘清之处。

将反“独”促统视为《人间》诞生的缘由,仅凭陈映真于休刊后的回忆还不够,关键在于分析创刊前他对岛内杂志出版界及其社会思潮的判断。创

办《人间》杂志之前（1985年8月20日），陈映真在《四十年来台湾文艺思潮之演变》（后发表在1987年6月总第287期的《中华杂志》）一文中指出：

一时代的思潮，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内外政治形势所制约。人和杂志，只不过是一时代社会、经济等条件上建立的上层结构的表现工具而已。

因冷战结构之再编，“民族分离主义”言论和运动做历史最后的冲刺，“台湾自决独立论”在岛内达到战后的高点……“党外杂志”大量出现，但迅速商品化，失去社会指导性格……1984年下半年开始，“党外杂志”企图冲破国民党的言论禁区，大量报道“政治内幕”，一时蔚为风尚，各种政治“周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首先，杂志缘何成为陈映真解读社会思潮的入口，进而对“党外杂志”及其分离言论产生警觉？在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杂志在大多数时间较报纸更易取得出版登记许可。细言之，自当局于1951年实施报纸“从严限制登记”，除1978年3月1日至1979年2月28日“行政院新闻局”以“遏止少数人图以杂志敛财”为由停办杂志登记，岛内长期施行“报禁”而未展开“杂志禁”。^[9]1980年至1985年，岛内杂志数量分别为1982家、2244家、2332家、2543家、2869家。^[10]1986年之后，增长率虽下降，但保持在3000家以上^[11]，一度出现“党外杂志”的风行。至于报纸，数量和内容均受严格限制。直至1987年12月“报禁”解除，岛内报纸维持在31家，除副刊稍显多样，岛内报纸内容大都略显单一。而《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台湾政论》等杂志却不乏异议言论，直至“党外杂志”冲言论禁区，“本土意识”“本土人夺权的必要”等分裂主张出现。当局也曾设法查禁“非法”杂志出版物，但无论是“党外势力”中的自由民主派人士，还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左翼人士，都曾创办各色杂志，鼓吹不同主张。

其次，舆论之争也非关键，要害是杂志成为“分

裂势力”组织动员及其“台独”思想蔓延的温床。事件以前，“台湾意识论战”仅在部分“党外杂志”之间小规模开展，“分离主义”也非主流。用陈映真的话说，“它在一小撮轻狂的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中蔓延”^[12]。1984年开始，部分“党外杂志”吸收一批持激进“分离主义”和“台湾意识”的知识分子加入编辑队伍。《台湾文化》标榜“文化的深根入土，台湾人才有前途”，《台湾新文化》鼓吹“冲破中国文化的家长权威”，还有《前进》《生根》等攻击“中国意识左翼路线”。《八十年代》总编辑自称：“党外杂志不论什么思想流派或什么传统渊源，无一不以关心台湾、认同台湾、讨论台湾为基调。”^[13]说到底，“党外”势力利用杂志宣扬形形色色的“本土”论说，借所谓“台湾意识”操弄“省籍”问题，进而煽动“台独”。按许倬云之说：“本土的艺术、手工业、甚至宗教活动，都成为‘党外’运动者掌握的重要工具。”^[14]事实证明，办刊确为“党外”组织动员提供了方便：康宁祥等创办《台湾政论》形成“康系”，《美丽岛》杂志形成所谓“美丽岛系”，“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创立《新潮流》并形成激进“台独”组织“新潮流系”，并曾与“夏潮集团”展开“台湾意识论战”。它们共同构成早期民进党的主要派系。

再次，岛内杂志出版界的“分离主义思潮”引起当局警惕，陈映真既要撇清与“党外杂志”的关联，继续与“分裂势力”斗争，又要区别于左翼意识形态的“夏潮”系杂志，避免被当局视为“异议分子”再遭查禁。1984年10月17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召开“现阶段加强文化审检措施暨现存问题座谈会”，强化出版物严查严扣。1985年4月，整合“党外”势力的《台湾年代》停刊。同年8月，《薪火》《太阳》《前进》《新路线》《民主天地》等因“淆乱视听”被禁。部分自诩自由主义的杂志遭查扣。此间，陈映真曾赖以批驳“分离主义”言论的《夏潮论坛》被勒令停刊一年。如此境遇，陈

映真只能另办一本由自己主导的刊物。从刊物命名到创刊号封面故事《在内湖垃圾山上讨生活的人们》^[15]，再到初期刊载文章，可以发现：“夏潮”系杂志那种强烈左翼色彩被淡化，“党外杂志”那般偏激政治论述和内幕报道鲜有出现，只有陷入生态破坏、人道危机、民族压迫等重重矛盾中的“人”，才是杂志报道的重心。“党禁”开放、“报禁”解除后，公然主张“台独”的言论大量出现，《人间》反“独”促统的出版理念愈加明显，且始终围绕“人”展开。譬如：18期“二二八的民众史”^[16]，驳斥“中国人杀台湾人”谬论，反思中华民族的“损害与创伤”；37期“再编组与转变的时代”^[17]，回顾“重大历史转折”，呼吁两岸民众团结；38期“70师的台湾兵”^[18]，反对国土分裂，关爱“外省人老兵”。

一言以蔽之，陈映真基于对20世纪80年代台湾杂志界“分离主义思潮”的警觉，在“台独”思潮膨胀和当局白色恐怖面临崩解的背景下，于国民党与其反对势力纠缠的夹缝中“另开战场”，为反“独”促统创办《人间》。杂志中的“人”，是陈映真关怀台湾、反对“台独”的基点，也是心怀祖国、促进统一的起点。他将出版视为战场，至于如何将作为武器的杂志办出特色，则是创刊后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二、“中国意象”：纪实摄影与报导文学相结合

《人间》是什么样的杂志？“《人间》是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道、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的杂志。”^[6]20世纪80年代中期，岛内有《南方》《当代》《文星》等不少文化刊物。《人间》之所以能成为其中最具特色的一种，是因陈映真提出纪实摄影与报导文学相结合的编辑方针。表面上，《人间》讲述了不少台湾弱势族群遭受的社会现实，意在重建两岸中国人期盼的理想世界。实质上，《人间》所要呈现的是一种融合两岸人文风情的“中国意象”，以此与“党外杂志”那种仅靠文字展开“分离主义”论述和流于粗滥的“秘闻内幕”报道形成

鲜明对照。

细察《人间》摄影记者关晓荣、李文吉、柯锡杰等人的镜头，未曾对准达官显贵，始终聚焦底层民众及其所处环境。镜头中的民众，既有“在台湾的中国人”，还有“在大陆的中国人”；镜头中的环境，既有“啊！美丽的台湾”“呜咽的二仁溪”“抢救台湾森林”等呈现岛内生态，也有“大陆中国”“人间山河”“神州人间”等展示大陆风情。

《人间》绝非所谓宣扬“人道主义”而已，关键是以“中国意象”抗衡“党外杂志”兜售的“台湾意识”。对此，陈映真常在“发行人的话”或“编辑室手札”中对其解读，编辑部也会借“读者投书”予以强化。

一方面，纪实摄影与报导文学结合，既是陈映真个人主观愿望，也是文学论战、副刊竞争、人际网络等客观因素使然。20世纪30年代，吴希圣的《杨兆佳其人其事——纪念的螺旋桨》、杨逵的《台湾震灾地慰问踏查记》成为台湾报导文学开篇之作。受益于杨逵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报导文学成为新生的文学概念。然而，《台湾新文学》停刊使其受挫，又经日据末期“皇民化”运动与“戒严”初期“反共文艺”肃清，报导文学几近沉寂。直至1975年，报导文学因高信疆在《中国时报》副刊开辟台湾首个报导文学专栏“现实的边缘”重回大众视野。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联合报》副刊与现代派作家结盟，《中国时报》副刊则支持陈映真等乡土论者。明争暗斗的各色副刊，藉由各种文学奖项笼络作家、编辑和出版商。高信疆将报导文学作品纳入“时报文学奖”时，曾邀陈映真评审。陈映真主导《夏潮》时，也曾响应高信疆号召，提出建设报导文学新园地。^[19]

相较于报导文学，纪实摄影进入台湾晚四十余年，虽有“社会见证者”的美誉，却以“沙龙摄影”形式为当局利用，沦为鼓吹“反共复国”的文宣工具。1983年，陈映真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

在爱荷华大学看到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的纪实摄影作品时感慨:“原来照片可以这样拍,有这样强烈的效果。”^[20]¹⁵⁷此时,纪实摄影在《时代周刊》等欧美杂志广为流行,而“夏潮”系杂志《生活与环境》却受制于摄影水准而几近休刊。此行结束,陈映真便表示要创办一本图文结合的杂志,也就是《人间》。^[21]

另一方面,纪实摄影与报导文学结合所遭遇的挑战,主要来自纪实摄影,而非报导文学。陈映真熟谙文学,对纪实摄影却较为生疏。发刊之前,岛内颇有名气的摄影师,如王信、阮忠义、梁正居、张照堂等均受邀参与筹备。发刊之后,陈映真给予摄影记者和美术编辑较多自主性,他们既可直接选择图片,也能独立策划主题。此外,编辑部于1987年两次举办“人间摄影夏令营”,出版“人间摄影”系列图书。但这只能应付摄影作品来源方面的困难,“整体环境的不佳,人才与题材都积累得不够”^[22],才是陈映真眼中的难处。

其一,聚焦陈映真个人,他如何认识并运用纪实摄影?《人间》创刊号刊登的纪实摄影讨论文章中,陈映真提出:“摄影有很强的说服力,也有很大的恶用和歪曲的可能性。因此,伦理上,摄影报道的人要冷静客观。”^[23]为此,《人间》方法可概括为:杜绝虚构、保留结构。“杜绝虚构”,意思是禁止变造或修饰影像,避免歪曲事实。按陈映真为《纪实摄影》一书所作的序,“保留结构”指“纪实摄影与一般、单张的新闻摄影之不同在于它的有结构的叙述性”。“叙述性”可以理解为故事性,“结构”则与编者意图有关。换言之,新闻摄影只记录事实片段,而纪实摄影则与文学铺陈更相似,需讲述来龙去脉。不难发现,多篇幅、成系列的图片本身,便能构成杂志主体内容。这一点在《人间》封面故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每篇封面文章使用图片16幅左右,最多的近40幅。从整体看,多幅图片起、承、转、合,像小说一样呈现概况;从细节

看,单张照片也能独立展现瞬间片段或具体事实。此做法与鲁迅的意见相契合,“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有不期之果”^[24]。“杜绝虚构”是求“真”,“保留结构”是求“美”,《人间》影像意在“人情”,即不以美化版面或补充文字为目的,也不单以呈现事实为满足,而是主张拍摄者立场、彰显杂志批判性格。这一编辑方式源于陈映真主张报导文学“姓文(文学)不姓新(新闻)”的观点,不仅暗合纪实摄影强调客观、注重真实的特性,也使其与报导文学更好融合。陈映真说得很清楚:“透过照相机来探讨人的处境、环境、生活,并且传达出作者的爱、抗议和批判。”^[25]

其二,放眼整个编辑部,杂志最大程度给予纪实摄影版面空间,但编排方式却遭到质疑。“图像全面取代语言和文字,成为思想表达的主要符号”^[26],陈映真此言不虚,关键在编辑部如何落实。一是杂志页面大量彩印,数量超整本杂志的四分之一。二是印刷用纸标准高,起初用高级铜版纸,从第6期起,换为视觉柔和、不反光、有雾面效果的雪面铜版纸。三是图片数量多、幅面大,且常用整版呈现,跨页比例很大;一个页面能容纳的照片,编辑常刻意越过装订线,使之横跨整个版面,甚至超出血线。这种视觉修辞有合理性,但受众是否有能力接受?有普通读者表示“摄影及印刷超出了一般杂志水平”;有专业人士评论“摄影作品本身都有独立真实的面貌,不是文字配角或版面填充”。^[27]也有质疑认为“太多跨页照片安排,令人有视觉受虐待乃至受侮辱的感觉”,“近乎浮滥的跨页照片,终使得许多照片中的主体受到无情切割的命运,形成读者难以忍受的视觉苛待”。^[28]显然,《人间》追求影像内容的“真”和“美”,也力图创新编排方式,但超越了大多读者的接受经验和审美能力。

总之,若文学是陈映真“给绝望的人一点希望的火星”^{[8]37},那《人间》则是编辑部同仁共同高举的

火把，以独树一帜的编辑方针聚合纪实影像与报导文学的光芒，照亮岛内读者视野中被“党外杂志”扭曲遮蔽的“中国意象”。要追问的是，这份个人出版理念和编辑风格显著的杂志，能否为市场接受。

三、“文人办刊”：反“独”促统的出版理念一以贯之

长久以来，在台湾办杂志可谓“本小利微名气大，劳神伤财麻烦多”。创刊时大张旗鼓，结果却无声消亡。《人间》未脱此窘境。1989年9月，刊行3年11个月的《人间》休刊。

关于近现代报刊，李金铨提出商人、文人和政党办报三种范式。^[29]《人间》不完全等同于“文人办报（刊）”，但最为接近。一方面，《人间》主张“为弱势群体讲话”，但未居高临下启蒙民众，只寄望召唤或改造一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民众联合。毕竟，《人间》受众主要为中产阶级，而非底层民众，这是客观因素使然，并非《人间》本意。陈映真常强调：编辑记者应进入“现场”，接受民众的教育，推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觉醒。这有别于“文人办刊”的精英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与“文人办刊”类似，陈映真力图避免权力机制制约和商业利益掣肘。即便《人间》常与国民党立场相左，但当局止于“关切”，未曾封禁。^{[20]171}以致编辑部“真正自觉的压力”来自市场而非政治。^{[30]410}有研究将其休刊归咎于商业转型失败，有人则认为“台湾意识”匮乏是主因。也有人称《人间》有广告收入，且“解禁”后的媒体曾予陈映真支持。^[31]此类说法固然有理，但因“解严”遽变的媒体环境如何影响《人间》？陈映真怎样应变并坚守反“独”促统的出版理念？不将其置于台湾杂志出版的整体脉络，无法阐释上述问题。

《人间》休刊与出版制度及市场变动密不可分。其一，数量激增，竞争加剧。1987年7月15日，“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随“戒严令”一道废止。“台湾警备司令总部”不再检查

出版物，改由“行政院新闻局出版事业处”负责。后者对申办杂志者皆予登记，除色情出版物外亦鲜有查处。1987年台湾新增杂志出版机构339家，1988年增长614家，《人间》休刊时已达4241家。^[32]这对既有杂志的销售和广告冲击不小。其二，报业扩张，挤压市场。同杂志业一样，报业规模也快速扩大。1987年前，受制于“限证、限张、限印”，报社只有29家，但“报禁”开放当年就增至120家，且多以6大张为目标，版面随之增多，内容逐渐丰富。^[33]凭借周期短、时效强、渠道广、价格低等优势，报纸重新赢回曾因“报禁”流失的受众，读者也不再为触碰政治禁忌的杂志买单。其三，杂志失去读者，继而失去广告商。当时约70%的广告市场份额被中时、联合两大报团占据。相较“时报系”支持的《时报周刊》《时报杂志》及“联合报系”支持的《野外》《女性》^[34]，《人间》没有实力机构支撑，只倚赖订阅维系经营。

市场竞争加剧背景下，维持读者阅读率和忠诚度已然不易，提升广告份额更无可能。20世纪80年代后期，岛内威权体制走向解体，环保、劳工、校园民主等潜在矛盾持续引发社会运动。媒体大都防止涉事选题“出格”，以免触动当局、企业相关广告主利益。《人间》则相反，编辑部坚持批评与建设相统一，坚持深入现场，激浊扬清、针砭时弊。诸如《八尺门摄影连作》揭露基隆人居环境问题，《杨医师，谢谢您！》关注血癌患者医疗补助与社会救助，《悲剧的背后》掀起少数民族问题大讨论，等等。此类报道遭部分企业以撤销广告施压；遇读者反对刊登涉污企业广告，编辑部也终止合约，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如何应对困局？分析陈映真创刊后接受媒体访谈时的公开表态，再考察同时期编辑部实际做法，或可得出答案。《人间》优势在于声誉高，出刊被列入“台湾十大出版文化新闻”，不少名人投放广告帮助宣传，^[35]但渠道开拓与经营不足，在中

南部地区发行成本高。出刊前,台湾首家上市出版机构、中时报集团旗下出版企业、拥有遍及全台发行网络的“中国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提议支持经销,但被陈映真拒绝。《自立晚报》访及缘由,陈映真避重就轻地答:“一个杂志只能靠社会支持……《人间》很穷,只剩下一点自尊,这自尊卖了,《人间》的理想岂非粪土?”^[36]简单回应后,旋即致谢叶石涛、白先勇、黄春明、三毛、蒋勋等公开支持《人间》的文化界人士。直至杂志投入市场,陈映真才意识到不能将杂志销售寄望于社会声誉。1986年12月,接受《两岸》诗丛刊专访时,陈映真透露对杂志销售的忧虑:

《人间》虽然在文化圈中享有极高的评价。然而,实际上却仍有许多人认为,《人间》杂志是苦闷、阴暗、看起来会让人感到难过的杂志。因此,他们宁可选择那种花花绿绿的消费性杂志。即便是沉溺于虚构的幸福中也能自得其乐,反而不愿阅读《人间》这种让人感到沉重的杂志。^[37]

陈映真似将问题归咎于读者,事实上,他对杂志市场的认识已逐渐清晰,表现在同时间(1986年12月)发表于《中国时报》的文章。他认为:

这再生于八十年代台湾的人文、思想性杂志,面对着这些严苛的考验:资金的单薄;台湾出版气候和环境的全面庸俗化和官能化;制作、印刷和装帧的成本提高;造纸工业独占下,文化用纸过分昂贵;厂商对人文、思想性杂志的广告投资态度犹豫;杂志流通体系的后进性格,等等。^[38]

此时陈映真已觉市场不利,他在《中国时报》开设“陈映真专栏”,以借中时报团主流地位扩大《人间》影响。耐人寻味的是,同期中时报集团旗下《时报周刊》,靠美女照片封面,销售破18万份,成为当时台湾第一大杂志。反观《人间》,文字反映社会阴暗面,长于批判、少有方案;图片多为黑白复色,呈现退伍老兵、白化病患者、艾滋病人等“没有脸的人”。甚至社内记者也认为“内容忧苦”,

令人“心情沉重”。^[39]

1987年,广告份额与订户数量不佳,《人间》更加困顿。同年11月,陈映真接受《台北评论》采访,一改对杂志商品化的拒斥,开门见山地声明市场之重要:“我们具体地感觉到‘市场性’这个无形而强大的挑战”,“作为文化性商品,《人间》有各种成本等待从市场中取回,需要一些‘利润’来从事再生产”。^[40]将获取“利润”视为拒斥市场制约的办法,陈映真略显矛盾的论述背后,是他明白出版是反“独”促统的舆论“战场”,也是媒体竞争的“市场”。但他不愿就此妥协,“编辑室手札”显示:

它不愿刊登哗众取宠、铜臭媚俗、偷窥丑闻内幕的报导来创造无人味的扩大销售量。它又不愿媚向广告客户——刊登推销洋烟、辅药、升学补习班、奢侈品的广告。作为一个高度人文文化杂志,《人间》,在这商品化的经济中,是商品;但是它反对剥削读者的感官世界来创造利润,也力求避免自己的哲学一下子就垮在现有的商业框架的手中。我们在读者中寻找认同我们的同志的同时,我们也在广告客户中寻找欣赏我们的同志。^[41]

陈映真警惕杂志极端商业化,迎合大众偏好、谋求商业成功亦非本意。《人间》出刊时,前景尚不明朗,40余位文化名人捐资在《中国时报》刊登广告予以宣传,大抵因创办者是陈映真而非他人。陈映真像《人间》的太阳,众人因其魅力围绕着他,此为编辑部的共识。《人间》中期时,陈映真常大幅修改甚至重写稿件,独行其是的作风引来争议。在文字记者看来,杂志属于陈映真而非任何人,“大陈的理念、文字的美学观强烈渗透和主导,这无可厚非”;美术编辑亦认为“杂志从头到尾就是陈映真在表演”。进入中后阶段,高信疆主导编务两年,扩展报导题材,延揽廖嘉展、李瑞月等加入编辑部,但杂志风格始终稳健。他表示“这是陈先生的杂志,我是他的总编辑”。^{[20]165}直至1989年初,杨宪宏

接任总编辑，封面设计、影像编排、文字风格才有较大变化，杂志价格亦上调20%。1988年岛内杂志售价普遍上涨，1989年《人间》提价20%，增至178元新台币。此价格上涨幅度，低于同时期的《天下》（47%）、《远见》（38%）、《钱》（27%）等杂志，但未待市场反馈，杂志便已休刊。此后多年，陈映真未曾正面评价此番变化，只感叹“《人间》杂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风格、思想，我自己对人、对社会的观察和看法”^[20]165-166。曾主导编辑的高信疆、王拓、杨宪宏、张志贤等，或有深厚编辑经验，或熟谙营销手法；招聘营销人才、增设广告部、设奖促销、售卖合订本、邀名人撰写推荐语（第29期《台湾文化和舆论重镇是这样看〈人间〉的……》，第43期《他们都推荐杂志》），举措不可谓不多，但直至停刊，未见起色。

实际上，编辑部无一人能替代陈映真在编辑工作中乾纲独断。这显示着陈映真对出版文化性的固守，也表明他一度低估出版经济性的必要，直至休刊才意识到——“编辑自主性和商业社会规律结合”^[30]420-422这一朴素出版规律。我们需认识到：“文人办刊”的衰微，未曾改变陈映真一以贯之的反“独”促统的出版理念；他坚守杂志出版这一反“独”促统的舆论“战场”，坚信“社会、读者对于良好、高尚的出版品的认识力和饥饿感”^[36]，坚定办《人间》是为反“独”促统而“有话要说”。

结语

《人间》杂志存续不足四年，却集中体现20世纪80年代岛内一种反“独”促统的出版理念及其实践状况。陈映真之所以在国民党当局与“台独”势力夹缝中“另开战场”，首因是在当时出版制度与市场环境下，杂志确可成为激荡社会思潮的阵地与介入社会现实的桥梁；更关键因素，则是陈映真基于反“独”促统的历史责任感，藉由新办刊物应对杂志界泛起的“分离意识”，迎战背后日益壮大的分裂势力。他力求结合纪实摄影与报导文学，为

向岛内读者呈现被“党外杂志”遮蔽的“中国意象”。其间，时值国民党当局对出版的干预日渐松弛，《人间》虽未受威权主义的政治压迫，但“市场”作为另一种审查力量取而代之。面对生存困境，陈映真始终拒绝孱杂商业意图，反“独”促统的出版理念一以贯之。伴随民进党合法化及“党外运动”落幕，一些分裂势力将鼓吹“台独”的渠道从杂志转向报纸和电台。《人间》编辑队伍则坚守出版战线，通过人间出版社发行“人间台湾政治经济丛刊”“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等出版物，更加旗帜鲜明地发出反“独”促统的声音。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着眼台湾“解严”前后的出版环境，以及当下尚未偃旗息鼓的“台独”思潮，我们既可清楚这一反“独”促统的出版理念与实践的时代价值，也更能体悟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理解《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所内蕴的强烈问题意识和鲜明问题导向。我们要继续“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持续扩大两岸尤其是闽台之间的社会人文交流合作，在出版这一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播领域，探索新时代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

参考文献：

- [1] 陈映真作品集编辑会议. 陈映真作品集出版缘起[M]//陈映真作品集(卷一). 台北: 人间出版社, 1988: 3.
- [2] 陈映真. 回忆剧场杂志[J]. 幼师文艺, 1990, 71(5): 28-31.
- [3] 许南村(陈映真). 后街: 陈映真的创作历程[N].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台北), 1993-12-19(39).
- [4] 毛铸伦. 一个清醒但痛楚活在台湾的高贵心灵[J]. 海峡评论, 2017(313): 64-67.
- [5] 陈映真. 两鬓开始布霜[N]. 中国时报(台北), 1986-02-09(03).
- [6] 陈映真.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希望, 我们爱……[J].

- 人间, 1985(1):2.
- [7] 陈映真:历史偶然的遭遇[N]. 破周报, 1995-12-15(12).
- [8] 张文中.《人间杂志》: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追求和理想——陈映真访谈[M]//两岸三地名家访谈.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4.
- [9] 辅导清理效果良好杂志办理登记下月恢复受理[N].“中央日报”(台北), 1979-02-28(03).
- [10] 杂志事业之发展与现况[J].“中华民国”新闻年鉴(台北), 1991:372-373.
- [11] 杂志出版业家数[J].“中华民国”出版年鉴(台北), 1994:851.
- [12] 陈映真.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M]//陈映真文集:杂文卷.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230.
- [13] 李旺台.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党外杂志发展史略[J]. 八十年代, 1984(33):12-16.
- [14] 许倬云.台湾四百年[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110.
- [15] 蔡明德, 潘庭松.台北内湖垃圾山上的小世界[J]. 人间, 1985(01):1-31.
- [16] 陈映真.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写在《2·28事件:台中风雷》特集卷首[J]. 人间, 1987(18):64-67.
- [17] 再编组和转变的时代[J]. 人间, 1988(37): 117-119.
- [18] 陈映真, 林育德, 陆传杰.望断乡关盼征人系列[J]. 人间, 1988(38):64-103.
- [19] 我们的话[J]. 夏潮, 1976, 1(05):2.
- [20] 刘依洁.附录:陈映真访问稿[M]//《人间》杂志研究. 台中:印书小铺, 2010.
- [21] 蔡明德.人间现场:八〇年代纪实摄影[M]. 台北:南方家园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6: 22.
- [22] 蔡珠儿, 朱恩伶, 张娟采访.人间灯火未熄[N]. 中国时报(台北), 1993-05-14(31).
- [23] 陈映真.记录一个大规模的静默的持续的民族大迁徙[J]. 人间, 1985(01):30-31.
- [24] 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M]//鲁迅全集(卷一).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251.
- [25] 陈映真.关于摄影和文字的一些随想[M]//陈映真全集(卷七). 台北:人间出版社, 2017: 395.
- [26] 陈映真.日本接触:实相与虚相[N]. 中国时报(台北), 1987-01-02(08).
- [27] 王以任, 钟郁美.读者信箱[J]. 人间, 1986(6):4.
- [28] 林世光.读者信箱[J]. 人间, 1986(14):8.
- [29] 李金铨, 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5.
- [30] 陈映真: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M]//陈映真文集:杂文卷.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 [31] 张诵圣.台湾文学生态:从戒严法则到市场规律[M]. 刘俊, 冯雪峰, 等译,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6: 209.
- [32] 杂志出版业核准登记总数按县市别分(1976-1994)[J]. 出版年鉴(台北), 1994:852.
- [33] 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M]. 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 2002: 396-397.
- [34] 陈扬明, 陈飞宝, 吴永长.台湾新闻事业史[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133.
- [35] 陈映真.两鬓开始布霜[N].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台北), 1986-02-09(03).
- [36] 姜郁华.拥抱生活, 关爱人间:访陈映真谈《人间》杂志[N]. 自立晚报·副刊, 1985-11-03(10).
- [37] 钟乔.文学、政治、意识形态:专访陈映真先生[M]//陈映真文集:文论卷.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60.
- [38] 陈映真.人文思想杂志的再生[N].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台北), 1986-12-06(08).
- [39] 陈映真.我们爱森林的朋友阿标[N]. 自立晚报·副刊, 1988-03-03(10).
- [40] 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M]//陈映真文集:文论卷.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107-108.
- [41] 编辑室手札[J]. 人间, 1987(22):7.

责任编辑: 兰丰丰

《福州党校学报》2025 年征稿启事

《福州党校学报》是由中共福州市委主管、中共福州市委党校主办的社科类综合性期刊。2025 年本刊辟有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研究、党的建设、治理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研究、社会与文化研究、党校教育研究、福州发展研究等栏目。2025 年本刊重点选题如下：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2.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3. 习近平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福州的孕育与实践研究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6.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7. 党的建设与群众路线研究
8. 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
9.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研究
10. 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研究
11. 人工智能及其社会化应用研究
12. 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路径研究
13. 榕台两岸融合发展研究

欢迎广大读者、作者来稿，来稿要求如下：

1. 来稿内容包括：题名、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作者简介。另附题名的英译。如属基金项目成果，应在篇首地脚标注项目名称和编号。
2. 题名应简明、具体、恰当，一般不超过 20 个汉字，必要时可加副题名；摘要一般不超过 300 字；关键词选取 3-5 个能反映文章主题内容的词或词组。
3. 作者简介主要包括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学位和研究方向。在论文末尾注明：单位详细地址、邮编、电子邮箱、联系电话。
4. 正文一般以 6000—13000 字为宜。
5. 参考文献按引文先后在文中标出序号，并与文后参考文献序号一致。
6.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本刊电子邮箱：fzdxxb@163.com。作者来稿文责自负，请勿一稿多投；本刊不以任何形式向作者收取审稿费、版面费等。
7. 本刊有权对采用的稿件作适当编辑删改，作者若不同意删改请在稿件上注明。稿件自寄出或发送 2 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来稿一律不退。

《福州党校学报》编辑部

学术期刊改进文风倡议

为贯彻落实中宣部办公厅《关于推动理论刊物和党报理论版改进文风 提高宣传阐释质量的通知》要求，促进学术期刊文风改进工作，我们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发出如下倡议：

1. 把牢方向，服务大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引导学者聚焦中国式现代化重大问题展开研究，关注中国实际、提炼中国经验、传播中国话语，回应中国之间、世界之间、人民之间、时代之间，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2. 质量为本，优化生态。建立健全以质量为中心的审稿标准，破除“四唯”。抵制抄袭剽窃，善用AI技术，严守学术规范。建设青年学者友好型期刊，拓展青年学者发展空间，促进学术传承与创新。

3. 规范表达，锤炼文风。倡导严谨朴实的文风，力戒形式主义与“华而不实”，避免“重模型、轻思想”“重技术、轻问题”倾向，注重实证与学理结合，将文风纳入审稿考量。

4. 建强队伍，夯实保障。结合各期刊实际，制定可操作的文风改进措施，加强编辑流程中的文风把关。强化编辑人员“四力”建设，不断提高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恪守职业道德。

5. 协同联动，凝聚共识。搭建期刊、高校、评价机构、学者对话平台，构建文风改进共同体。组建文风评审专家库，定期开展“文风会诊”，发布“优良文风案例库”与“典型问题警示清单”，联合制定《学术论文文风规范指南》。

6. 创新传播，扩大影响。创新话语表达，运用多元技术手段，加强对优秀作品的推广。促进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有机融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见于行动。

让我们自觉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进一步改进文风，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出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应有的贡献。

改文风强作风学术期刊联盟

2025年6月

文章转载自[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